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聯蘇

著 柏爾 哈
譯 建曹 復馬

者編主
五雲王
翹 韋

行發館書印務商

528.3848

6214

次號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聯蘇

著 柏 爾 哈
譯 建 曹 復 馬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懋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106246

譯者序

最近二十年來，世界上最堪注意的國家，就是我們西北的鄰國——蘇聯。這個國家曾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以其驚天動地的大革命與綿延四年之久之國內戰爭，使全世界人士萬目炯炯地注意她的大破壞。但自一九二一年百業凋敝的最低點至一九二六年，僅在五年的短短期間，她的經濟狀況竟能恢復到戰前水準；隨後更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實施五年計劃，改造全國的生產機構，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爲目的。她的大建設便從此震驚全球。過去以破壞相垢病者，現在均一變其向來的態度，稱頌該國經濟的發展，爭相做效。各國人士對蘇聯建設的成功，初甚懷疑，繼而半信半疑，終而至於信其真實，且潛心研究，欲明其成功的原因，以作他山之助。美國哈爾伯教授 (Samuel N. Harper) 以客觀的科學方法，並作實地的探訪，著此『蘇聯公民教育』一書，實爲研究蘇聯者闢了一條捷徑。因爲蘇聯建設之所以成功的主因，不在物力，而在人力；人力的增進與利用，則全恃公民訓練的得法。

一九二九年爲本書初版的時候。從這一年起，世界其他各國均先後陷入經濟恐慌的旋渦中；蘇聯卻在此時非但沒有不景氣的現象，而且日趨繁榮。該國的計劃經濟正在這時候表現其獨異的優點，人民的情緒也非常興

奮，提出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口號。這口號終於一九三二年實現。一九三三年，該國政府繼續實施更繁重的第二屆五年計劃，以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及消滅階級和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爲其正鵠。據最近塔斯社消息，這第二屆五年計劃已於今年四月一日實現，即較原定計劃早九個月完成，且第三屆五年計劃亦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以前擬定。多數重要生產部門將於今年年底超過原定的計劃。重工業已於一九三六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九八。三。同年，棉花的收穫則已大量超過五年計劃，而鐵道方面的五年計劃亦已全部超過。這種驚人的成績，已使蘇聯能在十年之內從工業落後的農業國一躍而爲最先進的工業國，其工業生產量已居歐洲首位，而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這種突飛猛進的現象，決非偶然。因爲「公民」二字在蘇聯有特殊的了解，並因此公民訓練的方法亦有其獨到之處。這對於該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至鉅。

哈爾伯教授在本書第一章即已扼要地說明：正在組織、訓練、與教育中的蘇聯公民是「從事生產的公民」(the citizen in production)。蘇維埃的選舉制度，亦不像其他各國按照區域原則，而是按照生產原則，人民必須以某種工作人員的資格，於其工作所在地選舉職業代表。不生產者就沒有公民的資格，同時失卻一切公民的權利。這種公民觀念，確如哈氏所說，應於閱讀本書時「牢牢記在心中。」

「生產」二字，涵義十分廣泛。這不僅專指工業的生產或農業的生產而言，凡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均得稱爲生產。譬如在各機關服務的職員，他們的服務工作就是他們的生產。服務成績的好壞，就是他們生產成績的好

壞。學校的生產工作，就是教學的工作；教員的生產是授課，學生的生產便是學習。學校每學期中每一週都有預定的教學進程，視此教學進程爲學校的生產計劃，與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計劃同樣看待。其他一切教育的、文化的、與甚至政治的機關都是如此，經濟的機關更不必說。故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即指能作社會有益的勞動而非遊手好閒與剝削他人勞動的任何行業的人民。蘇聯以此種人民爲其合格的公民，足見其如何注重生產事業。這與其他各國一般的公民觀念絕不相同的。

雖是這樣一般地重視社會生產，但蘇聯政府與民衆對於工業生產尤爲重視，而產業工人則成爲該國公民中的中心人物。在經濟方面，以工業爲一切生產事業中之最重要的部份。工廠的組織與管理方法爲其他一切機關的模範，即蘇維埃政府機關亦不例外。農業生產發達的極點，就是要使之工業化，使農業與工業間的異點漸歸消滅。現在蘇維埃國營農場，已具有工廠性質。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天增加一天。該國人士的信念就是：工業爲百業的根本，必須使工業發達纔能有機器供給農業，纔能使運輸與交通的工具日益進步，纔能使一切教育與文化事業得到充分的物質基礎。工廠裏的組織，認爲是最合理的社會組織與生產技術的組織。工廠裏的生活能訓練出有勞動習慣，不自私，和堅決而爽直的工人。按該國當局的計劃，在未來的社會中，階級的分歧將漸歸完全消滅，因之政治的組織亦逐漸消失，社會上的經濟組織日益重要，而以工廠爲一切經濟組織的中心，工廠裏的生活就成爲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成份。所以在社會方面，以工人爲全體人民的模範，彷彿工人具有一種標

準的人格，而此種人格必須在現代的工廠中纔能訓練出來。因之，各級教育機關都有工廠實習，這種工廠實習，在蘇聯稱爲『生產實習』。不僅學習電機、機械、土木、應用化學等技術科的學生要到工廠裏實習，即學政治經濟與任何社會科學的學生亦必須有相當時間的工廠實習。凡派到工廠實習的學生，均完全過工人的生活，參加工人的各種會議與一切社會活動。他們所實習的，不僅在生產的技術方面，而尤其是在生活習慣方面，要使青年學子接近工人生活，並在實際的參加中了解工人生活。

工人在蘇聯固已一般地加以重視，而『在業工人』尤爲各界人士所推崇。這與上述一般的公民觀念有密切聯繫。因爲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如果脫離生產事業已久，則在生活上亦有腐化的可能，所以公民必須現在『從事』於生產。在業工人被認爲是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公民，以蘇聯最通行的術語來說，他就是站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前線的『戰士』。他在政治上與社會生活上都享有特殊的權利，其他團體或個人的錯誤，時常要請在業工人來糾正。這樣推崇在業工人與一般的工人份子，是蘇聯立國的基本原則，從這個基本原則上推演出種種公民組織、訓練、與教育的方法及其具體的形式。

蘇聯公民訓練的組織如蜘蛛網一樣，分佈得非常周密。每個公民至少參加二三種公民組織，有些公民參加到十餘種組織之多。加入一種組織，就領得一個會員證。公民本身亦須向政府機關註冊，領得公民證。無論到什麼機關，或參加集會，甚至進入遊戲場，均須攜帶本人的證件，方可入內。所以蘇聯沒有一個散漫而無組織的公民。公

民訓練工作之所以能夠深入並能獲得良好成績，端賴這樣周密的組織網。

蘇維埃政府機關本身即含有公民訓練的意義。「蘇維埃」意即代表會議，在這裏主持行政工作的人員無非是人民的代表。他們與其他各國的官吏不同，並認為「官吏」這一名詞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在蘇維埃機關裏時常作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若稱他們為官吏，等於說他們是官僚，就是說他們沒有代表民衆的資格。除了少數常駐的工作人員以外，蘇維埃的代表仍在繼續他們在工廠或農場裏的固有職業。這些代表時常改選，藉以吸收許多新的份子，可使民衆都有被選到蘇維埃，以作政治上實習的機會。蘇聯的政治領袖們常說：「勞動者應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意即他們應被選到政府機關作行政的實習。每次蘇維埃改選所標榜的政策，都是多提拔新的工作人員。往往知識很低而能盡職的勞動者被提拔到蘇維埃機關，成爲政府的行政人員，使她或她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所以說蘇維埃本身便是一種公民訓練的機關，並非虛語。

在本書中特別舉出而自成一章的職工會與合作社，可說是蘇聯國內最廣大與最基本的公民訓練的必需組織。若說蘇維埃是政治的組織，則職工會與合作社是經濟的和文化的組織。職工會所負的任務是：促進各機關的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水準，滿足會員的物質要求，保護他們各種切身的利益，等等。合作社所負的任務是：以集體的原則促進生產與節省耗費，調節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滿足勞動者的需要，等等。兩者都以集體主義訓練公民，使一般民衆在日常生活中心感到集體主義勝於個人主義，漸漸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

職工會，稱爲『共產主義的學校』，對於勞動者的生活領導無微不至；勞動者且以此監督本地的行政機關，並進而糾正政府的缺點。所以正確地說來，這兩種組織都具有政治性質，而職工會的政治性質更爲濃厚。蘇聯的職工會是職工國際組織的屬員，所以該會對於會員尙有國際主義的訓練。這兩種組織包羅羣衆最多，而與社員或會員的切身利益極有關係；以此種組織作公民訓練的場所，其收效之大，自在意料中。

蘇聯的城市居民，差不多全體是合作社的社員。除了幾處國營的大商場以外，自各大城市以至窮鄉僻壤所有的商業機關，可說完全是合作商店。合作社社員到商店裏購買物品，可以打折扣，而且有些物品非社員不能購買。工人社員則更爲優待，他們非但可以得到特別廉價的東西，且可購得大量生活必需品。在這種優待辦法裏，寓有很重要的公民訓練意義，使一般人民自然地趨向於集體主義，並願自己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人。

鄉村的農民向來經營其個人主義的小農經濟，他們的生產品很少到市場上出賣，而且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之仰給於市場者不像城市居民之多，所以集體主義很難爲他們所接受。當本書作者最後一次到蘇聯考察時（一九二六年），該國農民仍在過着很守舊的生活；所以本書對於鄉村的公民組織，祇能說些農民互助會與鄉村會議等組織，這類組織可以說是歷史上的陳跡了。自第一屆五年計劃完成以後，蘇聯的農村已起了根本的變化。集體主義已在鄉村獲得驚人的成績。現在鄉村農民的個人經濟幾近絕跡，百分之九十農民都已加入集體農場。集體農場運動（colhoz movement）成爲農村中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且可說是全國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之一。

集體農民（即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被認為是「鄉村社會主義的柱石」。他們有全國代表大會的組織，對於農產品的增加，農業的機器化，與全部國民經濟的進步，以及人民團結的鞏固，都有絕大的功績。

集體農場的原始形式是農民耕種互助社（Societie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Agriculture）。這是一種農民自動組織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因感自己耕種器具的不齊備，彼此互通有無，組成耕種互助社，把社員的牲畜與農具聚在一處，共同享用，共同耕耘，而所得農產品仍各自分開，不相混同。在起初時，互助社祇在農忙季節作這樣的合作，而平時則仍把牲畜與農具分開，歸原主保存，而依然各營其個人經濟。但自此種試驗見出成績之後，農民漸漸放棄其個人經濟，羣起加入耕種互助社，且不願再行分離。這些互助社因此日益鞏固而具永久性，遂蛻化而為集體農場。許多集體農場，非但農具有，而且農產品亦歸公有。此種組織依其成員的志願，可有很大的伸縮性，其最高度的發展形式，便是公社（commune），在這種組織裏集體農民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完全出於自願，如有不合意，隨時可以退出。當集體農場運動發展的初期（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農民的情緒游移不定，加入與退出的都是很多，有如潮水漲退一般。後來終為實際的利益所信服，退出的現象頓形消滅。至一九三一年，過半數農民已加入集體農場，農村經濟的集體化運動，成為普遍的公民活動。自此以後，鄉間舊有的農民組織漸歸消滅，而以集體農民的組織代替之。集體農場就成為鄉村一切經濟、文化與整個公民活動的中心。本書以根據較早時期的材料，對此極重要的農民集體化運動，未能與對職工運動及合

作運動同樣地加以充分敘述，不免稍有遺憾。

集體農場所以有今日的成績，可說是工農聯合的結果。城市工業以大量新式的機器供給集體農場，使牠們握有曳引機(tractor)與複式收穫機(combine)等最進步的生產工具，藉以提高農業生產率，並增加農民的收入至數倍之多。此等機器非個別農民所能置辦，要應用這些機器，必須有大規模的經濟組織。故農民雖富於保守性，終於見利而趨，願拋棄其向來的個人經濟，而進行集體的生產方法。但此種集體的經濟組織，農民素無經驗，若沒有城市工人的幫助，集體農場亦難見諸實行。所以隨着集體農場的發展，蘇聯有大批工人從城市裏派到鄉村，將他們在工廠裏所得的經驗搬到鄉村，而成爲農民的直接幫助者。集體農場在此物力與人力的援助之下，就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迅速成功（第一屆五年計劃在農村經濟集體化方面祇兩年即已完成）。自此以後，工農的聯合愈加鞏固，而且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放棄私產觀念，他與工人間的矛盾亦無形消滅。工農的聯合，因此愈加鞏固。

當革命的初期，蘇聯鄉村祇有幾個少數的國營農場，以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作爲農村經濟的模範。但農民本其平素的習慣，各營個人經濟，以致農村的階級分化依然難免，而農民對於國家的經濟建設亦無若何積極的幫助。曾有少數領袖認農民爲反動份子，主張加以壓迫。其他領袖則堅持聯合全體農民（意即聯合中農與貧農），而以審慎的態度對付農民羣衆，於是當局者內部發生劇烈的爭論。約當一九二四年，又有一番爭論，前者主張用

強迫的方法使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者則認為彼時客觀條件尚未成熟，不能組織集體農場，而強令農民加入。到了一九二八年，後者纔策進農村的集體化運動，但依然反對採取任何強迫的方法，當時仍有不少人員徒求速效，以致在實施中忽視教育方法，而趨於強迫之一途。其結果遂使許多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如潮漲一般地蜂擁而入，不久後又如潮退一般地相率而去。自當局改正一切強迫的方法並對農民作多方的教育後，集體農場纔得真正的發展，所以集體農場運動實含有重大的公民教育意義。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還有下列幾種特殊的公民團體：

第一，扶護社：這種組織是多方面的，有工人對農民的扶護，青年對幼童的扶護，行政機關對政治落後團體的扶護，教育機關對文化落後團體的扶護，等等。這種扶護的性質，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凡在任何方面較有能力的團體，都應組織扶護社來幫助在這方面較弱的團體。甚至工廠的工人可以組織扶護社來扶護蘇維埃政府機關，助其肅清官僚主義。這種扶護工作是蘇聯公民最重要的社會服務之一，對於該國的文化革命與經濟發展都有極大幫助。

第二，肅清文盲社：革命前的俄國，不識字的人民佔了很大的百分比；因此，肅清文盲成爲革命後特殊繁重的工作。凡學校的師生與各機關的職員，都隨處組織肅清文盲社，以本機關的識字者來教不識字的下級職員讀與寫。不論人數多少都可開班，每日於工作之暇，作一二小時的學習。這種公民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服務，教者

完全是義務職，社員的加入都是出於自願，且不繳納任何社費。但這種組織可說已成過去，現在蘇聯已沒有不識字的人民。

第三，工農婦女代表會：在革命前，俄國婦女與中國婦女相似，頗受壓迫，無論在知識與能力上都比男子弱得多。在蘇維埃制度下，認為勞動婦女有特別組織的必要，使她們可在這種組織中爲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鬥，設法提高她們的經濟地位，文化水準，以及政治的認識。這種婦女代表會完全是公民訓練的組織。代表於會議中討論自己切身問題以後，即組織政治常識班，各種研究組，參觀隊等等，以進行自身的教育工作。

第四，航空化學會：這是一種國防的民衆組織，在其會員的普遍與工作的性質上都與上述三種組織不同。在蘇聯一切機關裏都有這種組織。會員須繳納相當的會費，並領有會員證。該會的宗旨是：動員民衆的力量促進航空事業發展，並授會員以防空與防毒氣的知識。蘇聯城市居民，賴這種團體的活動，都已學得能運用防毒面具與避免飛機的轟炸。這種團體的設備與其指導的人才，得軍事機關的幫助甚多。蘇聯飛機的數目現居世界列強首位，成爲空軍實力最雄厚的國家，其得力於這種公民的組織者，實不在少。

第五，國際革命者互濟會：這又是另具一種特殊性質的公民組織。顧名思義，即知其爲範圍更廣的並含有政治與慈善性質的國際組織。這種團體也與航空化學會一樣地普遍設立於全國各工廠，學校，與一切經濟的與文化的機關。會員須繳相當會費，並於必要時舉行募捐以救濟各國的革命者。該會對各國革命的逃亡者招待得非

常懇勸會員時常與世界的革命事件及其參加者發生接觸，並對世界弱小民族與被壓迫者的革命運動表示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參加這種組織者有各國的老革命黨員，例如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亦有加入這個組織。

以上五種團體都是較重要的公民組織，使人民在這些團體裏的活動中養成自強不息的精神，互助的習慣，與團結的能力，而且對於國民經濟的建設，文化的發展，與國防的鞏固，都有莫大的輔助。本書對於這些組織都予以詳盡的敘述。其他還有不少次要的組織，如反宗教的團體等，則有時附帶述及，略而不詳。

一切這些團體都是自願的羣衆的，非政府與黨的組織。他們的組織完全獨立，但在思想上受該國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該黨黨員自稱是人民的先鋒，對公民羣衆的一切活動，或居倡導的地位，或出全力予以扶助。該黨在一切公民團體裏都派有重要的工作人員，以執行黨在各方面的政治路線。各種公民活動的領導與公民訓練的方針，都在黨內作經常的討論，並對各種工作成績加以檢討。所以該黨實爲蘇聯公民訓練的領導者。凡成年的積極工人與農民以及各界的先進份子都加入該黨。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及各機關的職員中之先進份子，則加入共產青年團。在同一系統之下的兒童組織，則爲兒童先鋒隊。更幼的兒童，則爲十月革命兒的成員。這是一個按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黨的組織。嚴格地說來，他們認爲祇有共產黨是政黨，自共產青年團以下都是羣衆的組織，說牠們是公民訓練的基本組織，亦無不可。不過這些組織與黨的關係更爲密切，而且彼此

在組織上有連續的關係。年齡較長的十月革命兒可同時加入兒童先鋒隊，較年長的兒童先鋒可同時加入共產青年團，而較年長的共產青年亦可同時加入共產黨。所以黨的政治影響可以直接由兼黨的團員傳達至青年團，並再經這個連續關係而一直傳達到兒童的組織。這些組織各在其年齡相似的全體人民中起領導的作用。本書共有三章專述這些團體的組織狀況、發展情形與領導方式。這在本書中所佔的篇幅與牠們在蘇聯公民訓練上所站的地位頗相適合。

蘇聯公民訓練，除上述各種組織以外，還有種種工具與方法。

各種定期刊物、報紙與小冊，都是公民訓練的無上工具。黨與政府的中央機關報，除登載國內外的重要消息外，把日常重要的經濟建設問題與政治問題，以很大的篇幅提示於讀者面前。各機關工作的優劣點之具普遍意義者，都按實際情形在報上批露，分別加以言論上的獎勵與警誡。這對於民衆起很大的教育作用。各省市另有其地方的報紙，對於本地的經濟與政治等消息多加記載，但其一般方針仍與中央機關報一致，此外，工人有工人報，農民有農民報，紅軍有紅星報；這些是適應每一種公民範疇的需要之日報。其他局部的小報，種數甚多，每一大工廠，或蘇維埃國營農場，都出版一種報紙。其他較小的工廠農村與一切機關，都定期出版一種壁報。這些小報或壁報都能把本機關或本地方的生活反映出來，並為這部份公民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蘇聯的報紙都沒有營業性質，而是民衆的宣傳者與組織者。該國報紙種類的繁多與銷數的廣大，為世界各國所未有。其在公民訓練上所起作

之偉大，於此可想而知，本書對於這種蘇維埃的出版物，亦有專章論述。

在文化與思想方面的公民訓練，時常寓於娛樂中；因此，文藝、戲劇、電影、音樂、無線電等，均成爲公民訓練的工具。聽戲、看電影、遊公園等娛樂，在蘇聯認爲是勞動者應有的文化生活，與其物質生活有同樣的重要性。政府不惜以鉅資建立很多劇場、電影院、博物館、文化公園、俱樂部等娛樂場所，以滿足勞動大衆的需要（據一九三七年度計劃，應開辦新劇場九所，電影院五十六所，裝設電影機五九四一架）。常有各工廠的工人，或鄉村的農民，組織集團的參觀、遊覽、聽戲、看電影等等。這些工作的組織者是各機關的俱樂部管理員或在本地任文化工作的人員。

俱樂部在蘇聯起很大的作用，其設立的普遍，亦爲世界上所罕見。牠不僅是娛樂的場所，而且是領導文化生活的機關。每一工廠或其他機關，凡人數在幾百以上的，都有一個俱樂部，負組織本機關勞動者的文化生活之責。或出外參觀、看戲、看電影等等，或自行組織晚會、音樂會、體育表演等等。較小的機關，則設立同樣性質而規模較小的紅色處（The Red Corner），在這裏設備一些有益身心的消遣東西，如運動器具、樂器、小說、詩歌之類。蘇聯每一機關、村莊、軍營、船艘，都至少有這樣的設備。

附設於各機關內而成爲最普遍的公民教育方式的，則爲各種研究組。有戲劇、音樂、文藝、繪畫、無線電、政治現勢、社會科學、軍事常識等研究組，均由當地的勞動者自由加入，聘請專家指導。這些專家亦以指導研究組爲他們應盡的公民義務。學校學生、機關職員、工廠工人、集體農民等，都興高彩烈地於其正常工作之暇加入這些研究組。

以作業餘的研究。這些組織成爲人民提高文化水準與增進科學、軍事、政治等常識之有力的工具。

一切這些公民教育的方法與其所採取的形式，都是在學校的正常教育以外於全國最廣大的民衆間進行。至於蘇聯的學校，則更是計劃周詳並具有一元系統的組織。該國教育制度的特點，首先爲一切學校都是勞動者的學校，而工人與貧農的子弟特別得到優待。其第二特點爲對於政治教育的重視，任何學校都有其最低限度的政治課程，並時常舉行政治講演，而學生對於政治的認識亦爲學校當局經常關心的一點。其第三特點爲在學科上重視應用科學及各種生產技術的訓練，除了專門的政治學校（即所謂蘇維埃黨校及共產主義大學）外，大多數學校都是技術的學校，而中小學的課程分配亦以自然科學的比數居多。在該國內部階級矛盾逐漸消滅的過程中，自然科學的比重日益增加。其最後特點則爲學校教育與實際的生產過程密切聯繫，此點已在上面敘述工廠實習時言及。學校與學生的數量及其增多的趨勢，尤足驚人。計去年（一九三六年）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共達二七、四一八、〇〇〇，今年且要增至三〇、〇三三、〇〇〇名。幼稚園兒童人數去年爲一、〇三〇、〇〇〇，今年將增至一、二七九、〇〇〇名。又在今年的計劃中，要在各城市增設新辦學校九百三十所，添收學生五二八、〇〇〇名。讀者若能以這些數字與本書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得的相當數字作一比較，則對其進展的迅速便可一目瞭然。

圖書館與讀書室亦隨着民衆文化水準的提高有加無已。每一學校，每一工廠，每一集體農場，每一政治的、經

濟的、或軍事的機關，以及公衆的場所（如公園）都有這種設備，即在偏僻的鄉村裏亦至少有一個讀書室。這些設備使肅清文盲的工作易於進行，並使黨與政府的宣傳品及報告易於深入民間。各種研究組的實行，亦非先有這些圖書的設備不可。圖書館與讀書室在蘇聯已不是學校及其他學術機關的專用品，而是一般公民的文化必需品。讀書室與俱樂部是該國最重要而普遍的兩種文化設備，成爲人民煅煉心身的有力工具。在較簡陋的處所，有時這兩種設備混在一處，往往鄉村讀書室就是代表這種混合的組織。本書作者時常把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相提並論，但實際上並不是說：在城市的稱俱樂部，在鄉村的稱讀書室。凡在城市的大工廠裏，除俱樂部的設備外，另有讀書室，且甚至有單獨的圖書館；在鄉村裏亦有俱樂部存在。讀者幸勿誤會。

蘇聯公民訓練的組織和方法大致如此，但其所採取的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正隨着該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多種新的方法，並採取新的形式。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競賽（the socialistic competition）與突擊隊（the stroke brigades）的組織。這是最近發展出來的公民訓練形式，作者所收集的材料限於一九一九年以前，對於這兩種重要的組織，未能予以敘述。

社會主義競賽這一名詞並非最近纔發生的。當列寧在世時，曾指示應如何在勞動者中間舉行社會主義競賽，不過當時祇是作思想上與原則上的宣傳，沒有成爲廣大羣衆間的實際行動。等到實施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民衆高喊以四年完成這計劃的口號，於是列寧關於社會主義競賽的言論就爲當局者乘機提起而成爲實際行動。

的南針。

這種競賽的策源地是工廠。各工廠的工人本來有其每間的個別生產計劃，各間的工人爲保證其自身能按期執行生產計劃起見，與他間的工人彼此互訂條約，定出每週或每月的生產總量應該多少，勞動生產率應提高到百分之幾，每日按時到工，不遲到，不浪費材料等等，期滿後，彼此互按條約上各點來審查：那些是超過條約所規定的，那些是剛剛如約執行的，那些是沒有執行的，然後作一總評。凡能如期執行條約的，都認爲完成他的義務；超過條約的，認爲是優等；沒有履行條約的，認爲是劣等。優等者的名字寫在紅色板上，劣等者的名字則寫在黑色板上，懸示大衆。以同樣的辦法，舉行各工廠間的競賽，一工廠以內的各部門間的競賽，以至各個人間的競賽。自這種辦法定出後，人人都不願成爲上黑板的落伍者，各努力於其自身的工作；於是生產的速度日益增加，且達到驚人的成績。這種競賽的辦法，從工廠推行到一切經濟機關以及全國的政治、軍事、教育、文化與任何公民的團體。

與社會主義競賽同時發生的羣衆運動，是突擊隊的組織。後者與前者有密切的聯繫，凡在社會主義競賽中能時常上紅板的勞動者往往是突擊隊的隊員。所謂突擊隊，即是各機關中能力較強而且較能負責者的組織。凡自信能出類拔萃地定出普通勞動者所不能執行的生產計劃者，都可宣佈自己是突擊隊員，由這些人員於每個機關內組成一個或數個突擊隊，以爲大衆的模範。突擊隊員在社會上享有特殊的榮譽與物質上的優待，他們時常被人稱爲勞動的英雄，但是突擊隊員並非以超人自居的自高自傲者，在他們的突擊工作中尚有領導與幫助

大眾的成份。突擊隊的存在，無形中提高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標準，勞動生產率因此逐年增高。蘇聯近十年來經濟上的迅速發展與各方面的進步，受這種組織的影響甚大。

這兩種組織是世界上最特別的勞動組織，與其他各國所進行的生產合理化完全不同。這是勞動者自動與自願的組織，亦即是公民活動的一種。社會主義競賽的參加，是不能強迫的；所以仍有少數的消極份子沒有參加競賽。但十之八九的勞動者都已加入這種競賽，而且當局往往以勞動者參加這種活動的百分比增加為民衆積極性的表徵。

社會主義競賽又與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絕對相反。這非但沒有個人主義的競爭成份，而且含有扶助弱者的意義。訂約競賽的兩方不是互相猜忌，互相傾軋，而是互相督促，互相幫助。有時能力較低的人可在守時間守紀律等條款上勝過能力較強的人，並因此在執行整個條約的總成績上獲得優勝。訂約競賽的目的，並不在於賭勝負，而在互相監督條約的履行。

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發展的結果，產生了最近的史達漢諾夫運動，這就是突擊運動的最高形式。史達漢諾夫本是礦工中的一個突擊隊員，他以自己的天才與熱情發明一種新的勞動組織，能使礦工的勞動生產率增至數倍之多。各地勞動者爭相模仿，亦得到新的驚人成績。於是這種工人自動改良勞動組織以創造勞動生產率的新紀錄之運動，就稱為史達漢諾夫運動。這是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力的表現，是蘇聯公民活動的最新形式。

茲再重複一句：蘇聯公民訓練的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讀者欲了解該國公民訓練的狀況，不要專在形式上追求，以致覺得五花八門難以捉摸，應在原則上與方法上找到線索，並以動的邏輯把握其發展的趨勢。本書的價值即在供給豐富材料，使讀者能有系統地了解該國公民訓練的一般狀況及其特殊的方法。有些材料或已陳舊而與目前的狀況不合，但若讀者能從大處着眼，則於大體上仍無妨礙。本書的價值斷不因此稍減。

本書原爲美國芝加哥大學所出版的各國公民教育叢書之一，計有蘇聯、意大利、德國，以及英、法、美、奧、匈、瑞士等國的公民教育研究。蘇聯公民教育是一種新的試驗，且其重要性隨着這種試驗的成功與日俱進。哈爾伯教授在著作這本「蘇聯公民教育」以前，曾對於俄國的語言、歷史與政治制度作多年的研究。他初次至俄國時（一九〇四年），該國現握政權的「布爾塞維克派」尚在萌芽時期，正在社會民主黨內與「孟塞維克派」作劇烈的鬭爭。此後他又多次赴俄考察，並於大戰方酣的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以及一九一七年的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均居留俄國，這些革命前時期的考察，使他能洞悉俄國革命的背景及其醞釀情形，得於革命後探訪蘇維埃制度下的公民訓練方法時作一比較。本書的材料都是根據作者親身的考察，同俄人直接的談話，與在俄文出版物上直接閱讀所得的實際情形。作者撰述本書的目的是在研究蘇聯公民團結力怎樣造成，並指示其發展的動向。

序言

在目前要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蘇俄）著一本書，不免受到某種限制。這首先必須提出革命時期的特殊時候來研究，認為這是過渡的階段。這階段是比較綿長的，這確是如此；革命的領袖提到這本書研究範圍內各種制度的多種目的之實現時期，總是說需要「一代」之久。

因為截至一九二一年止的革命初期所有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與防禦此種制度之受國內外武裝襲擊，教育的問題與非軍事的公民活動的組織問題鮮能注意到。這最初的幾年組成一種嚴格苟暫時期，並主要的是破壞與鬭爭的時期。這最初幾年的有些制度與設施是要持續並予以發展的，有時祇須加以微小變更。在另一方面，有許多設施與方法，在過去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曾覺得是必要與便利的，都要於握得政權之後從速加以廢止。最後，有許多制度雖自革命初起時即已予以討論與籌劃，但直至目前這較晚時期未能予以實行。所以，本書要研究的制度是很晚近的，且甚至在其許多組織形態上還正在草創的過程。

這些公民教育與訓練的綱領與組織所包括的區域，是蘇聯所領有的地球表面上六分之一的大地。這是除了芬蘭，巴羅的海各小國，舊俄的波蘭領土，與卑沙拉比亞（Bessarabia）以外的舊俄羅斯帝國。這是各部分連接鬆懈的一塊大地。離莫斯科僅數百英里以內的地方，還有全體居民不曾看見過汽車（舉例說）的村莊，且此等

村莊距鐵道之遠，以未加平舖的小路計算，亦不過三十英里。無線電的發展，正開始打破這樣多的俄國人口之孤立的冷酷生活。必須時常記着這塊廣大地面的土地遼遠與交通不便。若要在本書中涉及當局欲使其政治宣傳與公民活動的綱領甚至及到最偏僻的邊疆之努力的成績已達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或把目前各區域的成績作一比較，則這是不可能的。蘇聯境內有許多不同的種族集團，蘇維埃制度對多種此等集團定出變通或特別待遇的辦法，我們對這種現象祇能作最廣泛的敘述。在時間與本書所能利用的材料範圍內，特別注重於中央的機體來敘述，蓋往後可以看到：這種中央的機體所指導與欲加以控制的，不僅是用以促進公民興趣的材料內容，而且是所發展的一切公民活動。

本書所用統計材料必須以保留的性質採用。蘇維埃制度的第一次戶口調查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舉行，而且這是該國自一八九七年以來的第一次完全的與澈底的調查。一般地說來，這些晚近幾年的統計估量是對革命各種制度與各種觀念的進步抱樂觀主義的。各機關樂觀主義的程度不同，引起了官方統計的矛盾。但是，極大多數的統計都能給予多少正確的數字，以示明所描寫的特殊制度之規模。

蘇聯的公民教育方法之研究雖因此有這些顯然的限制，但蘇聯亦有種種條件與其政治經濟制度的特點，可認為是對本書的研究特別便利的。第一，一般教育的與文化的發展，與特殊的公民訓練與政治教育，最近纔稱為革命的「第三戰線。」據革命的領袖估計，其他兩個戰線——軍事的與政治的——已在一九二一年於三年

多不斷的與劇烈的戰爭之後獲得最後的勝利。爲要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即建設的階段，必須給過去的活動形式以新的方針並促進羣衆間更普及的活動。此種任務的完成，舉例來說，必須藉「蘇維埃的公民活動」與「蘇維埃德謨克拉克西」來達到。其次，爲準備後輩的人執行革命的原則起見，特別注意於兒童的教育，尤其注意他們的公民訓練。在這件事情上所以不得不特別努力，因爲敵對的經濟勢力已許其發展以策勵在革命初期所破壞的生產過程之復活。

公民訓練已成爲緊迫的政治後果。敵對的思想以這些暫時被解放的敵對的經濟勢力爲根據而滋長的危險，使公民訓練問題成爲急切與重要的問題。一切可能的捷徑與工具都被利用以達政治宣傳與公民的教育與訓練之目的。

自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中，蘇聯的公民在其生活的每一階段與每一形態中都處處正面遇到他的「公民義務」。爲促進與指導公民活動起見，發展了一種最深思遠慮與規模宏大的努力。這本書將企圖把用以吸引羣衆積極參加公衆事務的一切種類的無數機關一一述出。「鼓動、宣傳、組織員」與「政治、教育、工作人員」之全體的幹部人才都訓練與組織起來了。不僅「公民科」須在從幼稚園以至大學的醫科爲止的一切教育機關的課程表裏予以重視，而且各種「政治訓練學校」亦設立起來。列寧曾對一般的教育說道：「我們並不以爲教育是我們政治以外的東西，而且要很坦白地把它隸屬於我們的政治目的之下。」

同樣的，司法上的行政亦與政治宣傳密切地聯繫起來，而且在每一機關的活動中，都注重於革命的「政治學」，藉以一步一步地把羣衆從被推翻的所謂「資產階級」制度的舊思想影響之下奪取過來。該國的全部生活已爲政治學所深入；在憲法裏，在法庭所交下的判決書裏，在自來火盒的招紙裏，在街道的新名稱裏，與在電影片裏，都有政治學寓在其中。

在蘇聯，「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府，是高度集權的，且政治領導權亦集中於一個「統治的黨」裏。這個統治的團體——全聯邦共產黨——已製出一種確定的與詳細的公民訓練計劃，且以此種計劃訓練一萬四千七百萬人民。大多數人民都在不久前纔有政治活動的覺醒。在革命以前，俄羅斯的農民在他們的鄉村機關裏與藉參與選立的地方議會的政務，已獲得相當的政治經驗。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他們對帝國的國會（Duma）有選舉權。工人在舊制度之下比較少獲組織的與階級表示的機會。在工農兩方面，受另一階級的官吏之約束的成分是很多的，以致這些受限制的政治權利還要時常在一種監視之下來執行的。在現制度之下，我們往後可以看到，仍有一種監視性質的約束。

但是這戰爭與革命的最後幾年，已在工人與農民的羣衆間，尤其在青年中，引起積極性的顯然增進。積極性的表現，現在有更多的可能性，並且視此爲革命的特點，加以鼓勵與促進。但是所鼓勵的祇是特種的活動，而某些活動形式是不受鼓勵而且甚至被強力制止的。其目的是在造就一種特別的公民，並且這種目的常能大半決定。

一個機關的性質，一個集團的可能活動中之着重點，或者一種綱領所需要的主要內容。本書第一章將論述這種特殊的公民觀念，這是蘇聯公民訓練方法的基礎。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一種確定的公民觀念更易於實施。政府因為是革命的機關，能立即蔑視或直然攻擊傳統的觀念或習慣，並自由採用新的制度與觀念。現在要造就一種新式的公民，而且對公民訓練的工作與對公民活動的參加之熱情的來源之一，是經常稱在這裏，這方面的努力中要創造某些新奇的事情。

蘇聯的政治領袖直然反對過傳統，並時常承認他們的努力是試驗性質的；不論何時與何處，若遇所希望的結果已為經驗所證明顯然不能得到，則他們隨時預備變換他們的方法，公民訓練制度的本身規定對其進步與具體的成績應作常常的核査。這種定期的核査使搜集材料大感便利，並且本身亦足以代表此種制度之饒有趣味的特點。差不多在每個機關裏都可看到種種實施的辦法之遭廢棄；有些時候，整個觀念是否妥當，亦起了嚴重的懷疑。這種坦白的試驗，在這裏與在其他凡是為革命的要點之活動場合裏都是一樣的，使蘇聯成為研究公民訓練方法之饒有趣味的區域。稱蘇俄為大實驗室，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了。

領導權的發展是蘇維埃制度特別供給有價值材料的各種公民訓練問題中之一。對領導權有特殊的規定，這不僅是特種集團所掌握，而且是法律上對這集團所保障的。蘇聯有無可爭辯的領袖——列寧；並有這一個人生活與箴言可作極廣大的利用，以激發與增進公民的觀念及其活動。

所以雖在這初期的發展階段中研究蘇聯公民訓練方法之受限制，是顯然與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對現在已經演進到了的一切述其概要，並指明已經以實驗的非常自由條件為基礎而起的變化，這不僅是可能，而且似乎是特別值得的。這樣的概要不得不在大體上限於中央指導的團體與軍隊，因為除了少數事例得隨便選述外，若要循着這些中央團體發出影響的途徑以對一切枝節的瑣事加以詳述，實不可能。若要斷定其所用的各種方法效果如何，為時未免過早，但某種結論是可以做出的，並對所採用的某些方法之實效亦有懷疑。

俄文的繙譯是特別困難的。為要加重表明新觀念與新制度起見，共產黨人造成各種新的混合字，並時常給一個字以特殊的意義。新觀念的宣傳技術之一部分，即是對某些字句的不斷重複。為要標明附着於某一特定辭句的一定意義起見，不僅有依照其慣例對同一辭句作不斷重複的必要，而且須盡可能地直譯原文。「勞動者」(toiler)、「工作人員」(worker)與「工人」(workman)等字是時常遇到的，這些字須加仔細的區分。「工人」一字用在本書裏是指產業工人，而「工作人員」一字則保留之以用於各「黨的工作人員」一類的文句中。「勞動者」一字是從俄文譯出的，這原文的意義是包括一切恃自己的勞動謀生活而不剝削他人的勞動以榨取利潤者；所以這函義較廣的術語，可包括各機關的職員與農業勞動者以及產業工人。各種制度當被第一次採用時，都給以很長的名稱，以加重示明它們的新的與特殊的性質。因為這些名稱是用以博得某些階級的一定反應，所以用到它們時必須作不斷的重複。在某些文句中，俄文的 *aktivnost* 譯作 *activeness* (積極性) 以示

明一種心理的形態，而與具體的 activity (活動) 相反。Bureaucratism (官僚主義) 一字的採用，是依照俄文的慣例。poliigramota 一字是比較機械地譯成 political grammar (政治常識)；政治常識的學校或教科書把歷史與公民的學科與社會道德學混在一塊。

這本著作是根據於許多蘇聯的報紙與書籍，輔以一九二六年夏季與秋季間的三個月參觀。作者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在所謂「克倫斯基統治」的時期，並於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年，都住在俄國。自一九〇四年以來，因研究俄國的各種事務，還有多次的考察，這些較早的考察可作為比較用的廣大背景，尤其是對蘇維埃制度成立九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各種事態的比較。這本特殊著作裏所引的各種出版物材料，未能於引證每種事實或意見時處處加以註明；若欲於每次引證時都加附註，實無可能。至於較長的基本的引語來源，則時常於引用時隨手指明。在篇末的參考書目裏，包括與對該國革命有關的並為本書所特別參考的報紙與書籍。有兩種報紙是不間斷與細心閱讀的，選為對公民訓練問題特別重要的材料。第一種是「真理報」(Pravda)，這是共產黨之正式的「指導的」機關報，這同時是蘇聯最大的與銷數最多的日報。第二種定期刊物是「農民報」，這是由該黨每星期出版的。這週報的銷數超過真理報，且是「羣衆報紙」的最好例子。這兩種報紙都在論定期刊物的一章中加以敘述。一般的刊物與特別這兩種報紙的官方出版性質，使它們對本書的論著特別有權威。

Samuel N. Harper 於芝加哥大學一九二八年七月

目錄

第一章	蘇聯之公民	一
第二章	共產黨（布爾塞維克）	一七
第三章	共產青年團（康沙木爾）	四七
第四章	共產兒童先鋒	七〇
第五章	蘇維埃之定期出版物	一〇一
第六章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	一二七
第七章	蘇維埃職工聯合會	一六三
第八章	蘇聯的合作運動	一九七
第九章	蘇聯的公民團體	二二三
第十章	陳列館與參觀團	二四九
第十一章	蘇聯的紀念會與宣傳運動	二六七

第十二章	蘇聯的普通教育	二九〇
第十三章	蘇聯的政治教育機關	三二五
第十四章	文學藝術與劇場	三五九
第十五章	無線電電影與音樂	三八七
第十六章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四一
結論		四四〇
參考書目		四五八

蘇聯公民教育

第一章 蘇聯之公民

在蘇聯裏，有一確定的公民觀念，由此，公民團體分成爲種種截然不同的範疇。公民之主要區分，規定於憲法裏及見諸立法上。所以政治的及經濟的各集團，都是界限分明的對立起來。公民觀念更因某種社會集團及經濟集團的選舉權及其他權利之被剝奪而有進一步的規定。凡此種種都是革命鬪爭之一部，這鬪爭要綿續到很長時期，至少有一世紀，直待新制度獲得最後勝利，階級區分消滅爲止。但現在，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鬪爭，都在明顯的及普遍的應用，在蘇聯的體制中，階級原理是公民權的決定因素，這是選舉權及其他一切蘇維埃制度的基礎。本書各章將在探討每種制度時對這個根本原理加以說明。公民觀念的普通性質，乃是根據俄國業已採用的所謂「蘇維埃制度」而來的，對此可作扼要的敘述。我們必須時常把這普通的觀念，記在心中，與黨和其他組織的特殊題目作等量齊觀纔好。所以關於這大題目的初步探討，洵屬妥當。

正屆組織訓練與教育的蘇維埃公民是「在生產中的公民。」蘇維埃選舉法的原理之一是職業代表制，公

民要在其工作場所裏，並以某種工人的資格進行投票。大凡進入某種機關及取得他項職位的許可，須以「生產資格」為條件，再補益以其他資格，如普通教育，或技術知識，候選者必須表示他或她在工業上農業上參加實際生產。教育制度裏各級的教學方針與方法亦必須密切聯繫於生產行程，從幼年起，兒童在學理上應於其能力範圍以內，指導其作實際生產的活動，即是休息，能利用之，亦是教育目的，這個意思就是即頑耍也是屬於生產的。不論其為實際生產方面，或為生產訓練方面，務使一切活動為有目的的措定，這將在此書一再引證，僅能生產者纔是蘇維埃公民，而蘇維埃公民必在生產行程上，負有一定的職責。

此處注重生產，在一般說來是來自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學說，這是蘇維埃政治領袖思想的根據。至於現在的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後來再行討論。大凡是共產主義者必為馬克斯主義者，必經過馬克斯主義的考核。凡非共產主義者獲得某種職務亦必須表示得有馬克斯的學說及著作之知識。高級教育機關數學教師須成為馬克斯主義者，而已成為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及歷史家，在寫作上與教授上都站在領導的地位。青年與兒童受着馬克斯主義的教育，新教科書根據歷史的唯物論的解釋而編訂。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在學校裏廣泛採用，並視為治學方針的基礎之公式中的一個名詞，其目的是在於訓育唯物論者的羣殖。

革命的現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程序建設的開端，是踏上共產主義的階梯，這並不是說這第一階段現已完成。在蘇聯裏尚存着資本主義的環境，約二千四百萬的農家尚帶有敏銳的個人主義傾向，國內貿易，甚至於工業生

產，私人企業仍是存在，這些是敵對的經濟勢力而仍須加以鬪爭和克服的。在國內經濟生活因有二個成分，即社會主義的成分與資本主義的成分，還在競爭並要鬪爭到完全勝利為止，則階級鬪爭必致延續。雖然現在社會主義的部分步步超勝了資本主義的部分，但是持續與持常鬪爭的需要依然是政治口號中之一個。以此之故，組織的方式，日益發展與增進，鬪爭之一種方法，即是組織。公式裏第二個名詞是「組織者」，縱屬兒童也教以作有組織的行動，一如工人與農民因得扶助和甚至於受強迫而成爲各種組織的成員，至於各種組織的繁多與五花八門的名稱，將再述於下章。蘇維埃公民的義務之一即在參與各種組織，而各種組織亦足加強蘇維埃的公民觀念。

假使這兩個爭雄的原則鬪爭到了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則集體主義者的實施，必致發展。日常經濟活動中的集體努力，都用種種方法來獎勵，並有時授予特權。兒童在學校的作工與遊嬉，引導以集體活動的方法。蘇維埃式的身體鍛煉，似足以消除自私的個人主義。正在訓練中的未來蘇維埃公民必爲集體主義者。這是公式上第三個名詞。在經濟政策中，蘇維埃政府正以合作運動與私人營業鬪爭，在過去二三年間此種合作運動的復興與增長，便是在蘇維埃公民觀念上看重集體主義的很實際的效果。

社會主義程序的建設是革命的第二個目標，且是革命的偉業。現在所遇到的待決的問題是一般民衆每天作工與生產的實際問題。此種任務，不比奪取政權與鎮服或驅逐國內外敵人之饒有刺激性。革命轟轟烈烈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運動在進程上已到了更重要的階段了，雖然這運動不復那樣可歌可泣，但是熱忱及某種的英

俠主義都認爲是兩個相反觀念間的鬭爭所必需的要素。爲革命原理而戰，仍屬必要，不切實的憤慨是到處受人棄絕與斥責的。列寧有一次說道：「薄弱感情之在革命黨員，一如懦怯之在前線戰壕中之兵士身上。」要使其成爲或必使其成爲革命黨員的熱忱——有時稱爲無產階級之熱忱——纔克有濟，並須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保持其敏銳。一班後起的青年，未曾帶有沙皇時代的傷痕，未曾經過祕密革命工作時期，且未曾參加過革命初期的積極鬭爭，則須浸漬以革命史上英俠的事蹟，因他們亦必須做別一種之戰爭人員，應具有勞工的精神與熱忱。從事於恆常的和積極的鬭爭，有些訓練使其成爲「革命的職業家」，能鼓動，能指導。但是羣衆活動是最後目的，革命領袖主張任何活動成功的程度是以羣衆活動效果的大小爲比例，故民衆活動必須導入革命目標之指向。目前通行的公民觀念之第四個及最後的名詞，即「革命的活動家」是。

雖然信教自由仍存在於蘇維埃制度之下，而教堂已經與教育完全隔離。對於未成年者開班傳教，認爲犯罪行爲，宗教團體按法登記，但行政上權能的實施已在禁止之列，其意不外是宗教團體得爲信仰目的而存在，都不能從事於社會服務的活動，蘇維埃憲法上規定宗教與無神論宣傳的雙方自由，政府當局主張蘇維埃政府對於宗教信仰及無神論，宜取絕對中立的態度，在另一方面言之，握政權領導的共產黨黨員，必須爲積極的無神論者，且青年與兒童的組織在其產黨指導之下，亦必須爲好戰的無神論者。年輕的與年長的均已成爲唯物主義者了。同時，維持努力保守活躍的革命精神，革命的鬭爭積極性與英俠性是訓練公民及未來公民的基點。

爲了革命的積極性的發展，共產黨領袖亦利用蘇聯領土以外的革命目標，他們自己祇是一個國際集團共產國際的一分子，別種組織亦因之具有國際的基礎，其黨員亦自視爲世界的公民，在理論上，關於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本質與蘇維埃公民訓練方法之關於國際方面，以下各章幾乎都要述到。故此引論必須注意到，蘇聯領袖對於世界革命問題所取之態度。在十月革命的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希望即在最近的將來，關於此層列寧壯語的結果使吾人無可置疑，當大戰開始的接續幾年中，在各國的革命可能性都用以激成俄國革命運動。後則承認革命巨濤的衰落。但是蘇維埃領袖，革命同志們，仍主張世界資產階級的穩定是暫時的，世界革命是歷史性地不可避免。現在各國對於蘇聯雖予以正式的承認，及恢復外交上與商業上關係，但完全的正常關係卻未建立，這種情況維持兩個對壘的形勢，蘇俄在一端，其他世界各國仍在一端，這種對立是不能調和的仇視。因此，援助他國的罷工或革命的民族運動，成爲一個革命者的公民義務。

他們對於蘇聯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之意見既如此，勢必深信敵人將作直接干涉的威脅，並云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建設的成功將使這種干涉難以避免，因爲敵人不能允許蘇聯的成功，以此蘇維埃公民必須組織，而未來的公民亦必須訓練自己使足以保護「革命的戰利品」，一種民族主義的姿態就應運而生，並在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蘇聯公民的範疇，嚴格的與明晰的區分是直接的由於這種觀念。但是這種區分是革命時期的，暫時的，此須

記諸心中。要知現在社會革命的進展中，階級鬭爭還在繼續。經濟的集團已成爲社會羣衆分類的基礎。

在蘇維埃制度中及各集團的組織中，每個經濟集團有其特殊的地位，這些經濟集團在經濟落後，並以農業爲主的國家之較簡單的機構中可作較明晰的規定。「無產階級」本以產業工人爲主體，但是運輸工人亦在包括之列，有時我們看到「工人」一字，是指在實際生產中以手工的勞動者而言，或稱呼得精密些：某人是「做凳子的工人」。這工人選到蘇維埃或職工會裏任職時，還依舊是做凳子的工人。在另一方面言之，若他永久退出凳臺與機器的工作，他就進入另一階級，這另一階級以後再談。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數目，據一般的估計大概爲三百五十萬人。俄國工人過去的特點是密接於他所自來的階級，即農民階級，這種情形，即現在蘇維埃工人亦是如此，俄國雖相當近代工業化，而俄國工人仍接近他所自來的農村。在革命爆發的各年中，工業界發生危機，工人階級解體，各地工廠的許多工人，依然歸到他們從前的農村社會，現在大部分仍返至工廠工作。因爲現在農村裏缺乏工作，青年農民又掀起轉向城市與工業區域的新運動，這些人將使強有力的農民影響仍能及於工廠的工人。

農民可分成三個不同的集團，這種分化，是立法與行政實施的根據，最大的集團是「中農」，他間於「富農」——「古拉克」意即第一級農民——與「貧農」之間，農民分成於貧農、中農、富農三者是依據其合家耕植用畝的多少，和家畜的繁養，農具的設備，以及非農產品收入的補充而規定。概括言之，富農是雇傭他人勞力，以種植

其地上的所有物或作其他工作者，或從事於商業，或小工業生產者。富農被視爲資產階級，剝削分子，因此剝奪其一部分公民權。在另一方面說來，此種農民的資產階級分子其政治法律的身分，又異於其在城市區域裏的資產階級分子，因爲富農本身大部分也是土地的種植者，故亦當視爲生產者。

貧農則列在鄉間無產階級一端，最低限度亦當稱爲半無產階級，他是農民裏無產階級獨裁的柱石。但是他並不是毫無土地的人，他住居鄉村裏也有一點土地，只因爲他缺乏家畜和農具不能儘量地與適當地耕種。他可以出雇農作勞動者於鄰人，或者每年有相當時間於國家或私人之非農業性質的企業裏找一暫時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被稱爲農工，即農民中之日工工人，並以工資獲得階級，加入職工會。但是他的農村居民的法律地位和他的以農爲主的經濟活動，使他仍歸入農民的總範疇中，而成爲這整個階級中各集團之一。

至於中農，顧名思義是一個中心的集團，他在農民中佔有大多數，「農民」一字，時常用來單指中農，因爲就農業生產者的意思來說，富農還不止是一個農民，而貧農又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農業生產者，且在經濟上很多是同於工人階級。蘇維埃社會裏爲政治集團的配置，要表示中農如何能代表一個特別的階級，同時要表示他們是如何足以代表農民的一個經濟集團，在其經濟利益上一面與資產階級有別，一面又與無產階級不同。

至於農民內部分等級的決定，則有客觀的標準，例如有耕牛幾頭、馬幾匹、農具之性質與數量如何，所有及種植的土地幾何，都可作標準，家庭外之雇工亦可作爲分類之一種標準，雖然，這些固是具體的根據，此種分類在事

實上常有出入，而取決於統治團體，各村蘇維埃執行部與本地的共產黨人等。關於某一人是中農還是富農的分類問題時常發生辯論，如依凡諾夫出賣穀物，被人看見，他就要被列入商人一類，所以便視爲富農，雖其所賣的穀物是其剩餘的產品。某報曾報告一個人的轉入富農的原因，爲一張照片裏有他與一個華美衣服的同伴站在一塊，後來發現這個伴侶非爲商人，乃是蘇維埃高級官吏。

現在還不會找到一個簡明的字，相當於蘇維埃階級體系裏之第三個主要的經濟集團「勞動者」一字，常常遇見與「工人」一字，時用爲包括此第三個經濟集團，這個集團，即是能做「社會上有用的工作」者。這個集團亦常稱爲「勞動的知識分子」並且以其是勞苦軍之一部，得享有公民的權利。這集體之最重要分子之一爲男女的專門家，如教師及醫藥法律經濟以及其他技術的專門職業，在國有國家化的經濟企業中，其主任與經理都是「工人」。蘇維埃政府與經濟機關內的職員，即蘇維埃體制裏的官吏，亦稱爲蘇維埃的雇員，合作社與職工會裏的類似職員亦如國家的雇員一樣的有政治與社會的身分。黨裏的專任行政工作人員及同樣在其他政治及市政機關專任的工作人員，都歸入這一集團。他們的經濟利益即在公衆與市政機關的公務，而與私人商業機關的事業相對立。組織家宣傳家在黨裏，在職工會裏，在合作社裏，及在許多公民的組織裏都是專門的「勞動的知識分子」。「勞動者」一字此處用來包括這許多集團，這些都不做手工勞動，但以雇員的資格附屬於生產或某種專業，而沒有爲了個人利益而剝削他人勞動的可能性而已。

蘇維埃體制的第四種與最末的經濟集團是一切「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地主階級後來完全消滅了。遲至一九二五年尚發現這個階級，有千數或多於千數而擁有幾千英畝土地，而未歸國有的。最後這些土地也被沒收了，地主被逐出於舊有土地的所在地。一般人想來，從前一切工商企業的所有者，在革命初年，即已被沒收，舊有之資產階級亦已消滅。但在一九二七年尚發現約有十個小規模的製造業於莫斯科，每處雇用工人從四十人至六十人之間，經營其私人企業，而為政府所不及注意。若以經濟的階級來說，則老的資產階級在蘇聯境內可以說已經濟消滅，雖然在談話裏或在講壇上尚可聽見「未殺完的資產階級」是蘇維埃體制的社會集團之一。

在另一方面，所謂「蘇維埃資產階級」即新的資產階級復在長成中，一九二一年為求生產之復興，已准許資本主義的原則。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普通簡稱「納不」(Nep)，這個階級就是從此發生的，因此被稱為「納不滿」(Nepman)。小規模的製造業，以租讓的原則轉入私人手中而為個人的利潤而工作。有時從先物主收回他的小工廠，這不是為收回物權，乃是租讓的嚴格條件所規定的新基礎上而復歸營業。私人將從事於商業及組織商品公司，小店主常在新的與嚴格規定的章程之下，得重整舊業。聽說最近幾年，曾有幾個私人得「攢到百萬」。誰都到處可以找到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從小工廠、小工場及店鋪中都可以謀到利益，在農村裏如上述經營商業與小企業的富農，也是一種新興的資產階級，私人的飯店亦已開張，私人的店鋪與國家商店及合作商店爭相營業，農村裏情形如此，城市裏亦是如此。經過許可狀的發給與租稅的政策，這些資產階級的新代表就被

登記、監視與嚴密約束起來。他們必須遵照許多詳密的條規而行。關於選舉方面，他們必須另列一名單，而此類名單又須公開招揭。「階級鬭爭」的發動，就是反對這個經濟集團使這分子的存在，在經濟生活中成爲其他經濟集團的公民活動發展的基礎。

自力作工而不雇用助手的家庭工業勞動者，即手工業者，自非資產階級；他對於社會主義秩序的建設，是取輔助地位，他的製造品，得藉合作社助其推銷，我們可以相信他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他僅有他誠實的家屬人員助他從事家庭工業，但因常有隱名於家庭關係人之下，來實行雇工的事情，地方政府受命仔細監督手工業者，以防止這種弊端。

蘇維埃社會的政治集團，其明晰與確定不僅由於革命領袖所採取的政策，且由於蘇維埃的法律。在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之下，政治集團的劃分是遵循經濟集團劃分而來的，茲在——細論各種制度之前，亦須在大體上對此加以扼要的敘述。

第一步先說黨，在蘇維埃制度下，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下一章將究討黨的性質，並且標出其與歐美政黨如何之不同。黨員的數目在一九二七年末大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這些可稱爲自覺負責的公民。他們獨享合法的特權，蓋是能與政治組織與機關報的惟一團體。同時共產黨員負有公民的特殊義務，並時爲任何團體的領袖；共產黨員至少須參加一些公民活動，所以共產黨員足以代表一種超公民，這種特點將爲此書處處所加重指

示的一點。現在黨員的成分，百分之五十是工人，百分之二十是農民，百分之三十是勞動的知識分子，不論那一類的新興資產階級，都不能充當共產黨員，黨員若成爲新興資產階級，要被革退。他的政策是維持工人在黨內的優勢，所以智識分子想握得行政權，是很困難的。至於中農則可以與貧農等量加入，紅軍兵士入黨則與工人相同，入黨的條件須經黨內詳加討論。

雖然一切共產黨員都被望成爲活動的公民，活動的程度黨內也會注意到。茲有一個分類，將「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相對。我們可以看出「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的區分到處應用，而爲蘇維埃公民觀念之一個特色。黨的活動分子是黨的組織裏得到選任位置的黨員，在黨並有領導資格。但是二者都是黨員，黨員的身分都會記錄下來，以備不時的詢考。其他一切公民則稱爲「非黨員」。公民之黨員與非黨員嚴格的區別，是蘇維埃體制最重要的政治分化。

無黨籍或非共產黨的農民、工人與農工的勞動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都屬同一的集團，雖然我們往後將看見工人代表在蘇維埃中比較農民代表是有優先權。這些公民統名之爲「無黨籍的羣衆」。在這集團中，前已言及，亦可分爲工人農民及勞動的知識分子之活動與不活動的二個分類。「活動者」一字用於俄國係採自法國這類人就是被選到蘇維埃的，選到女工人女農民之代表大會的，選到職工會與合作社或俱樂部與農村讀書室之委員會的。所以對於一機關一組織之指導與管理的參加都可稱爲「活動者」。此舉之最後目的就是領導一切

工人農民及勞動的知識分子走上自動的政治與公民的生活。現在所常聽到的話，就是在革命的初年列寧所說：「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廚子亦應學得到政府裏辦事的能力。」舉凡政治的經濟的公民的性質之各種組織都是以發展這個活動爲目的。選舉次數的多少與在每次改選中提拔新人物的政策，都足以助成這「活動分子」的不斷增加，對於較活動分子的饒有趣味的「推進」辦法，是工人農人的刺激品。因此，祇須加以時日，不活動者都會活動起來，以達到革命的完成。

最後，在蘇維埃體制之下，關於政治集團的劃分，尚有一小集團須待究討的，雖然經理主任及技術專家正在工農羣衆間，訓練出來，以在行政機關與教育機關主持一切，但是尚有許多在舊制度訓練出來的職業的與技術的男女專門家，現在仍被雇用於國家的行政的與經濟的機關，並站在重要的位置。赤色主任，赤色教授，或赤色軍官各在工商業的大機關裏，大學裏，或軍團裏常常站在很高而有責任的位置，他們正如軍團裏的政治主任一樣，常是共產黨員，在這些「負責的共產黨人」之下是專門家，而這技術人材時常來自資產階級。現在通行的俄羅斯化的「專門家」一字，簡稱「專家」(Академик)，其任務之一即是將出自工人農民，尤其是被派至特殊機關裏工作的共產黨人，訓練成新的專門家。以後，這老的專家就不再用了。

當十月革命開始的幾個月中，許多這種專家與知識分子實行怠工，反對新制度，但是現仍需要他們服務，他們被動員了，並間接被迫將他的專門知識與幹練爲新制度服務，因此發生了一種腦力國有化的形態。幾年之後，

政府相信此類出自資產階級的專門人材，業已自覺的接受新制度，乃允其有公民權利，得許其參加蘇維埃選舉，並得參加職工會及合作社，在雜誌撰稿技術上的文章，及積極參加社會上的一般經濟的與文化的的生活。但是會受過舊制度教育的老些分子，和相當的較新的分子，在政治上多少仍是置於被動的地位。這些專家（*spetsy*）的政治行動之被抑制，或至少與一般無黨籍的羣衆一樣之被漠視，產生了一種雖有充分公民權而實際上任其或甚至迫其不活動的集團。在一九二六年一個會談裏曾聽到「被動的專門家」的名詞，即係指示那個流行一時的集團。蘇維埃政制的目的，就是要減少被動的羣衆，而同時創造此被動者的特別集團。

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黨內討論到技術人才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生的所謂煤礦案件引起了如何善後的問題。在這案內約有五十個在國有煤礦工業佔主要位置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均以「經濟的反革命」判罪。他們的罪名是搗亂與破壞礦場，毀壞機器，及不信任蘇維埃政府，並在工人心目中是對工人建立不利的和不堪忍受的作工條件。煤礦裏的陰謀似屬一個與外界無干的不法行爲，但是共產黨員分析其環境後，認爲那些人的活動是有一個「思想的」基礎。有幾個被告者否認罪過，有些承認了叛變。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冬天裏，又有別的地方的與特殊的情形均足以表明專家的立場。在莫斯科有許多醫生在勞工介紹所登記以爲失業者，但同時各省正在找醫藥的人員。此種不規則的情形，引起許多爭論，設法增長各省醫藥人員的物質條件，依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在介紹職業的名單與職工會的會員錄中取消那些拒絕

到各省任職的人外，尙未加以行政上的壓迫。關於專門人員方面之爲躊躇不定的被動者，這倒是一個較爲明白的例子。

在蘇維埃制度下，專門技術人員的政治態度恰在於此。希望「專家」做工不是形式的及純粹官僚方法的，而要能有技術的創造性。因此再須承允他們以實現創造工作的可能之保條障件，專門技術人員各視爲有不經濟的過失，及因此而受懲罰，必因他的行爲是有意妨害蘇維埃經濟政策，或由於自私的動機，再或是怠惰。工作之錯誤與失敗之遭逢如非出諸其有意，則僅足以影響對此專門家之評價，而不能視爲課罪的根據，這僅有威權可以解釋的，但是對這集團地位亦有同一的政治，在各機關或各團體內居負責的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團必須對「專家」抱健全的黨所應有之懷疑態度，以保障正當無產階級的管束，雖然，工程師與別的專家大會，也曾通過決議強硬反對煤礦工程師之叛變，並表示他們絕對忠實於蘇維埃的體制，蘇維埃的原則及黨的領導權。

最後，尙有一類特殊的人，不承認其一切政治權，而公民權利亦受了限制。這實在說來可以稱爲非公民。舊資產階級的代表屬於此類，特別如從前的地主及廠主皆是。他們如前「統治階級」一般失掉他的經濟地位以外，而且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從前官僚時代的高級官吏，及與警務有關係的各種人，以及各宗教的牧師，都與舊資產階級歸入一類。其數不多，但遇資產階級的代表被人發見時，則時時有公開的宣傳。一九二七年於列寧格勒有這類人六個試作投票，雜在一百三十萬選民中，而報紙對此即充滿記載，並作諷刺畫，其中有些人是以國家機關中

的技術家資格獲得蘇維埃公民權的。

在蘇維埃法律下滋長的新興資產階級，其公民權亦被剝奪，不僅大商人或製造家無選舉權，即村莊的小店主或從事於地方商業的農民亦不許投票，不許加入職工會或參加合作社。他們雖不能說為法律所不容的人，但在許多方面看來，他們是實際上立在法律之外邊。在一九二五年的選舉中，有許多這些新興資產階級者為地方政府允許得參加投票，故在一九二七年，關於選舉的新訓令就指出憲法條文須嚴格實行，並枚舉選舉權在法律上被剝奪的階級。這個訓令給憲法條文以較滿與較廣泛的解釋。因此得在蘇維埃制度下存在的這類非公民就受到一種壓力。共產黨領導任務之一部分，即在使這羣人在政治上仍處被動的地位，特別是當他們能達到某種經濟的地位，得藉此來發展政治的活動與影響時。不許參加選舉，不許加入合作團體，或至少不許在合作社裏作任何積極參加，這些辦法，都是要使他們站在被動地位的主要工具。經驗告訴我們要使這政策之完全實施，需要領導者時加壓力。

關於兒童及青年的政治的與公民的組織及教育制度之討論，乃是指示如何擴大階級原理之應用於未來公民，根據政治與經濟的分類而來的公民的類別也應用到青年與兒童，雖然不像那樣的嚴格。出自資產階級的少年，例如鄉村店主的兒子，得入共產青年團。兒童先鋒隊的組織則允許一切階級的兒童加入。雖然，蘇維埃制度階級性質仍是十分確定，階級原理對於青年與兒童們亦是合用。

本章至此所舉之蘇維埃公民觀念的要略，差不多包括至一九二六年年尾的情形。一九二七年的開端有幾個較小而重要的新設施，都是關於身分的階級權利問題了，當對資產階級分子剝奪公權的實施，在一九二七年選舉中正屆雷厲風行的時候，在別的方面對於這個階級更取寬慈的態度。在國家的勞工介紹所圖謀位置的人，已不復要他說出他或她過去的社會身分或階級。一九二六年黨的代表會議議決允許文字上的「涉獵者」即文學專家，得較自由選擇題材與自由作文學評判。末了，在工人報紙上曾有一種宣傳主張給技術專門家中的發明家以獎勵的刺激，即為早已實行於工人的發明家的那種辦法。這些事實指示階級原理之應用，漸趨放弛。但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間的冬季，在黨內領袖的爭論，經濟的困難，尤其在上述很有名的煤礦案件，又使階級的原理，更加主重。嚴正的階級區分的體系，實際在任何方面都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並因此而生出公民類別的體系。這個體系使一方面有超公民的類別與另一方面有非公民的類別。非公民視如一種活動的敵對勢力，他們的活動是須減削的。超公民則在職責之下，必須為其當為的公民活動。其目的就是指導羣衆作持常與有效的公民活動並藉以建設新的「蘇維埃民主政治」。凡毫無階級覺悟和對革命的原理與政策漠不關心的人都稱為簡單的住民，這就算是極大的侮蔑。公民的意像就是「勇敢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的戰士。」

第二章 共產黨（布爾塞維克）

共產黨不僅是在蘇維埃政府中惟一統治的黨，而且在蘇維埃體制之下是惟一合法的黨，獨享合法的特權。再則，共產黨都能維持其統一性，雖然，彼此領袖間曾有數度激烈的爭論。將來黨內或能分成派別與發生如他國一般之政黨體制，但是在現在，共產黨在蘇維埃中總是「惟一而僅有」的政治組織，且「惟一而統一的」革命領袖列寧圓滿無疑的成就就是共產黨的創造與建設；這個黨就是「列寧黨」，黨員即是「列寧主義者」，黨的主義與行動的規律稱爲「列寧主義」。自從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一般人對於這領袖的態度，將討論於本章章尾。依其創造者迫切的命令，共產黨堅持維護其合法內的特權與統一性。革命前一切之俄國社會主義黨中，只有它接受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此即在蘇維埃體制之下實現的那種獨裁制。此絕對統一的堅持是由於認革命尚在進程之中，革命的目的尚未達到的觀點而來的。

共產黨員因此享有特有的政治地位。他們在蘇維埃政府裏，主持一切負責的職務，實際上在一切國家經濟的企業中握着主持或經濟權，並在一切非政府的公民團體上站在支配的地位。他們藉這些公務的職位以控制一般印刷與出版的活動。該黨的特有地位同時使其負有相當的責任。在蘇維埃體制所生之公民範疇的敘說中，

我們已形容共產黨員真是一種自覺負責的公民，並在探討中業已提示共產黨員是一種超公民。在黨裏的黨員資格是不隱諱的，且在事實上時特予加重說明。當被告者或證人在法庭上時，先問其姓名、年齡、住所及階級身分以後，接下就是詢問「你是不是黨員？」至於日常生活的關係，亦常予以直接詢問，考核其是否與一個黨員談話。以後我們又可以看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Komsomol）亦是同樣地時予詢問及公開承認的事。共產黨的起源與發展，機構與組織，黨員所受的特殊訓練以及列寧在黨內的地位與職務都可以將共產黨人之身分在其他的公民方面區分出來。

俄國社會主義的傾向，接受之馬克斯學說，其最初具一般的與形式的組織的，是在一八九八年。在各代表秘密的小小會議中，成立了「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普通稱爲「社會民主黨」。該黨的領導權主要的是在俄國諸革命黨人的各集團之內，這些人都住居國外，是從俄國本地逃出，或從西伯利亞牢獄中逃出，或爲革命遭了放逐的。一九〇三年，該黨第二會議再於斯達哥爾摩（Stockholm）召集，旋即遷移並繼續於倫敦。在這些會議中以某種細小論點的激烈爭辯，致引起根本問題的分裂。這二派仍繼續以社會民主黨自稱，祇以在會議中由表決的結果，各名其派爲「多數派」與「少數派」。過後，二派人數的勢力倒換過來，但是名稱根據第一次分裂時仍繼續保留下來。多數派叫他自已爲「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少數派名爲「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門塞維克。」

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派關於組織及策略問題所取的主張確定了該集團的特質，現在共產黨的發即展由於此。在這次爭持中，布爾塞維克派的領袖是列寧，所以嚴格說來他實是黨的創造者。列寧主張俄國社會主義者審察俄國那時期的政治條件所形成的革命鬪爭，必須具有特殊方式的組織。列寧以爲一個革命黨必須以嚴格的紀律集中起來，結合起來，尤其黨員必須限定爲積極的工作者，不可僅爲同情者。惟積極的工作者祇是對其確定的指定的工作之完成能作經常報告者。所以對於黨員資格的限制與工作的必須積極，是這個政治團體從其即起時的顯著之特點。這些組織原則實是布爾塞維克派發展的基礎。至於策略問題，布爾塞維克派力主認真與嚴格地採用階級鬪爭的原理，同時對於別種政治傾向及集團應取不妥協的態度，尤其是對於非社會主義或非革命性質的。

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的革命時間，所謂布爾塞維克黨人與門塞維克黨人者時而合作，時而反對。從此又發生介乎這兩派之間的派別，其組織具有暫時的或局部的性質。二派後來決定參加國會的選舉，這就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間政治運動之一種收果；在國會中之社會民主黨人自一九〇七年以後時常公開自名爲「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派」與「社會民主黨——門塞維克派」。在被迫旅居國外的列寧領導下之布爾塞維克派仍一本其組織與策略的原則，雖該派在國會中的黨員亦無不時常與社會民主黨較大的門塞維克派共同工作及共同參加選舉。

世界大戰爆發時，布爾塞維克與門塞維克二派在國會裏及在其僑居外國的領袖之文字的與組織的活動上，其政策與策略的異點益形顯著。布爾塞維克派竭力反對戰爭，並不接受許多俄國社會黨人以這次戰爭爲自護戰爭之主張。關於這一點，列寧與其同志攻擊那同爲第二國際會員的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看見在戰爭時各國社會主義黨的政策與行動是背叛馬克斯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因之益信他所站的及所奮鬥的主義之真確。結果，他再增益其自己俄國布爾塞維克派的主義並在各國社會主義隊伍中得到其左翼分子的附護。列寧是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在齊謀瓦爾德（Zimmerwald）與克里塔爾（Kienthal）會議之主要發起人，在這些會議的決議案中，他得以發揮對於組織及策略的意見。

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一次革命後，列寧得歸故國，與其同志相斂，距其放逐已十年多了。他的初步工作之一是糾正與加強他同志們的策略路線。他發現他們大大地離棄了他在瑞士精心苦構的與在外指導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原則。他力主應當運用更嚴格的布爾塞維克組織原則的必要，而對此項工作他已專致多時，革命初起幾個月的言論與出版之絕對自由予以幫助不少。隨革命而躍出的新制度，即工人與兵士蘇維埃的代表制，給此種主義應用的場所比諸其實施於舊式沙皇政體的政治條件之下時，較爲實際與範圍較廣。

列寧認爲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僅是革命的第一階段，而再有第二階段爲其黨的組織工作之對象。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他視爲是十分重要的。他與他的同志時致爭論一如對於他的敵人一般。他反對在革命時期由於

羣衆對政治生活之驚醒所起的誘惑，且對於黨員資格並不離棄其原意，不專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違反黨員質的問題。在二月革命起初幾個月間，布爾塞維克黨員的數目不過三萬人。這些黨員是在革命前十年來於舊統治艱難條件之下訓練而成的，當時布爾塞維克黨人在同一時候是合法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的組織。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後，布爾塞維克黨人與其領袖們，連列寧自己，因為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阻撓其「深入與擴大革命」的策略，乃不得不再採取秘密方法。此種情形是使在這數月內黨員人數比較增加得慢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布爾塞維克黨員，在數量上較諸其他政治團體如門塞維克黨員與社會主義革命黨員很少增加的緣故，亦有由於布爾塞維克對於黨員資格的限制與管理取了審慎的政策。因此在十月，即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時候，全體黨員尚未超過二十萬人。當領導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時候，黨的名稱仍是以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派名之。

雖然，有僅在布爾塞維克革命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左翼也在參加之列，但在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政府裏惟一有組織的分子，卻是布爾塞維克黨人。一九一八年四月，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又退出一切政府裏的職位，同年七月，一切其他社會主義者團體即在蘇維埃實際上亦不許其參加。但是別的門塞維克黨人仍得繼續被選至蘇維埃中，並以門塞維克黨人資格參加爭論。一黨獨享合法的特權，事實上在第一年內即已成功，雖然在形式上尚未承認，直待後來始見實行。在第一年中黨的名號亦有更改，「社會民主黨的」名詞不再用了，一部理由是因為這個名詞被其敵人繼續應用，且在俄國以外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方法的社會主義黨也用這個

名稱，再則黨的性質與宗旨必須很明白地標出於黨的名稱上，所以新的名稱「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公開地採用了。在馬克斯著作中，有這個名稱的根據。「布爾塞維克」一詞用時，時常加一括弧，即在公文亦如此，因為這字不論俄國國內或國外都成通行的名詞了。見到「布爾塞維克主義」一詞，就知為表明一種特殊的組織方法及一種特殊的理論，並且時常有提到各國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成立以後，此名稱亦改為「全聯邦共產黨」(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通行的名詞縮寫為「Vay-Ka-Party」，由其整個名詞的三個起首字合成的。又因其在蘇維埃制下僅有一個黨，普通只稱為「黨」。奪取政權的成功，及革命新時期完全領導權的獲得，遂令正式黨員的人數得到增加。這兩要素又使許多人都想成為統治者集團中之黨員。在以後幾年中，新黨員比較容易進入，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即是內部激烈鬭爭最後的一年。那時黨員人數達到最高點，大約有六十二萬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時，黨內反對的空氣來了；並在大規模清黨與重行總登記以後，黨員人數約減少到四十萬人。各種分子凡以私人利益為目的而入黨或曾經加入而在戰爭年頭卻無適當證明的都被清出。既向敵對的經濟勢力讓步，該黨的政策乃在建立更有效力的共產黨統制於經濟領域中的「主腦部門」，要達到這個目的，對於共產黨員資格的限制自屬必要。再之，黨員的質量比數量實為重要。這個政策繼續採用到現在，在最近幾年尤為嚴格。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所謂「列寧特典」(Lenin Contingent)，纔開了例外，允許

二十萬在業工人加入黨裏，這是紀念纔死的領袖的，同時這特典是使黨內真正工人分子的比例增加。

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之後的冬季，黨內有反對傾向，主張工人可以比較自由加入，但是這種提議終被打消了。一九二六年年端，正式黨員共有六十三萬七千人，所謂「候補黨員」有三十八萬一千人，在這年中僅有十三萬三千新黨員進入。一九二七年全體黨員重登記後，大約有四萬六千人退出，或被開除。是年七月黨員人數連候補黨員在內約有一百一十萬人。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冬季，工人之另一特典又蒞臨了，爲的是紀念革命之十週年的；此時有一鮮明的運動制定了新黨員適當的選擇標準。選擇第一個標準是看其政治的積極性，再則看其生產的資格。候補黨員須無「小有產心理」或不擁有財產。在訓令中且特別說明候補黨員必須參加於大規模生產裏。新來自農村而爲產業工人的新分子之農民，以及各機關的職員和勞動的智識分子，均不在新特典所徵黨員之列，因爲這一部分人雖能忠實於黨及主義，但是缺乏無產階級的鍛煉，以其沒有經年參加無產階級鬪爭，不曾密接於工人的廣大羣衆。一九二八年年端，以有這批特別徵求來的新黨員和照常規介紹進來的幾個黨員之加入，連候補黨員都在內的黨員總數大約共一百三十萬人。

共產黨的起源與長成，粗略的敘述，這不過藉以明黨的組織之某種特色（如對於黨員的限制與管理），此種組織從其起源與經過其發展均能表出此種特性。凡須積極參加革命工作與「鐵的紀律」的實踐都是由入黨的條件，重登記的辦法，及開除出黨的規定種種方面得到的。這是須加注意的；黨內的紀律與其說由於強迫，不

如說其由於自覺——「無產階級的紀律」是視為無產階級團體的特性，乃依據其由組織中工作的表現使其自知明覺的。此種入黨的條件，使要求入黨的人，當他或她做了共產黨人之時，即必須預為準備認清其義務之所在。

入黨以前必須經過所謂「候補」時期，此種時期按照要求入黨者的階級身分而有差別。在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分子，除紅軍兵士以外，進入黨中只要經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即成。進入為候補黨員的手續可分別為三個範疇。第一個範疇是工人及工人與農民出力的紅軍兵士；這個範疇又可分為二類，第一類是經常作團體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必須有在黨一年以上的二個黨員作介紹人；第二類包括非產業工人的工人及服役於紅軍的農民與農業勞動者所謂農工（*ostrake*）是，這一類人須有在黨二年以上的二個黨員作介紹人；第一範疇之二類中，候補的時期必須至少六個月。第二個範疇包括不實際服役於紅軍內的農民及不雇傭別的勞動者的工匠，這些階級中的人必須有三個介紹人，而每人在黨資格須有二年，候補的時期至少需一年。第三個範疇僅為其他各種人（如雇員等）及上所謂「勞動的智識分子」，這些人須有入黨五年的五個介紹人，候補的時期需有二年。

對於工人的加入所以採用較容易的條件，為的是藉以維持這階級的優勢，因為他時常宣稱這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但是要維持這種優勢，由經驗所得到的頗覺困難。雖然實際從事於生產的在業工人僅百分之四十，黨員過半數都是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但是工人出身的黨員很多變成為永久的公務機關的雇員了，雖然他們不是時

常歸入這雇員的階級。介紹人對於他們的介紹應當負責，且有因介紹不謹慎而被開除黨籍。候補黨員必須學完特殊黨校——「政治訓練班」(Political Grammar)——所定的學習大綱，這層後當再論。他們在組織中的一切公開集會必須以候補黨員資格參加，亦可參加於黨內之會議，僅有建議權而無表決權。但在候補時期中他們須付經常黨費。

入黨並無任何儀式，不論要求入黨者成爲候補黨員時之第一階段，或在由候補期滿而進爲正式黨員時之第二階段。儀式的排場在共產黨人惟物的觀點上似不大合式的。關於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亦同樣地無任何儀式，然於兒童倒允許儀式的排場。當加入共產主義兒童團之際，則有淋漓盡致的表演，這層當再寫於後。象徵主義亦不適用於共產黨人，黨人沒有徽章或勳章。至爲宣傳起見地方的組織收入新黨員，有時得召集一公開的黨委員會，非黨員的工人與農民得以參觀人被邀入場。

黨的基礎組織是所謂「細胞」(cell)。這細胞的觀念不是以籌思可得想像的及合於實用的，這是由於自然程序發展出來的。不論在一個機關裏或一個地理上的單位裏，凡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黨員得組成一個細胞。在一個大機關裏，例如工廠，會有好幾個細胞，每個作場都有一個。在別一方面，全鄉區或全市區或者只有一個細胞。每個細胞要有一個辦事處及一書記。在一九二六年大約有三萬個細胞，其主要的分類如下：工廠共七千三百十五個，鄉區共一萬五千八百十九個，蘇維埃政府的及經濟的機關，共五千一百六十七個，紅軍共五百六十六

個，教育機關共五百七十三個。細胞的大小各有不同，有些工廠裏的細胞含有數百個黨員，而許多鄉區的細胞或僅有一打或多一些的黨員。僅僅約有四千黨員及候補黨員是「孤立的共產黨人」，他們因此在地的關係使其不能隸屬於特殊細胞。

若一鄉或一鎮裏有了三個以上的細胞，這幾個鄉村細胞就形成一個較高的團體，即是鄉委員會。在較大的城市裏這些細胞就組成坊執行委員會（Ward Committees）。各委員會按期召集，每二星期至少須一次。使這些委員會的工作得彼此連絡起見，定期的區大會議，因此召集，並選出區委員會，該會的工作至少須有三個黨員專任其事。區委員會的書記必須有三年的黨籍，他的選出須得其上級黨部批准。其上級的組織單位是省或是一個區域的單位叫做「特別區」（region），這裏也有定期的大會及永存的委員會，大會須定期召集，委員會裏亦有專任黨務的黨員。省委員會書記須為在黨至少有七年的黨員。省委員會是地方的委員會中最重要機關，它是組織與指導全省裏各方面的工作，例如任命省內之一切黨報及各種出版物的編輯人員等等。

凡黨的組織管轄一民族共和國土地或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的自治區，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內的獨立區，均以同樣的根據稱為特區或省的組織。因此，在黨內韃靼共和國、烏克蘭共和國的獨立身分無何歧異，雖然這些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均有全國代表大會的規定。這些全國代表大會等於上述的特別區代表大會。

一切地方的黨組織在大會、代表會議或全國代表大會指導之下，對於地方性質的各問題的解決有自主權。但是每一個組織單位均直接隸屬於其正在其上之一個。這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是黨組織機構的領導原則。民主的成分是有伸縮性的，可狹可廣，依照各種情形而決定。至在劇烈革命鬪爭的時期，民主的原則必被犧牲。

黨的中央機關，尤屬特別重要；其最高權力機關是每年召集的定期的全聯邦代表大會（Congress）。這大會又補足以由各地方的黨組織所選出的代表會議（Conference），這代表會議通常是在這全聯邦代表大會之前。「中央委員會」由這代表大會中產生出來，委員人數七十，且有很多候補委員以在兩個全聯邦代表大會間彌補缺額。中央委員會指導一切黨裏的活動，分配黨內的人力與財源，及管理中央的財政。該會每二個月至少須召集一次，候補委員得列席建議。關於政治工作方面中央委員會組織政治部、組織部、秘書處，處理日常組織工作及執行方面的工作。政治部現有九人，事實上是黨內最高的權力機關。最重要政策的制定，實際上都取決於此。

全聯邦代表大會又選出二個委員會，「即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更爲活動，更爲重要，雖然「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必須在黨有十年歷史纔能選上，換言之，他們必須在十月革命以前加入的。這二個委員會的職責是厲行黨員應有的義務與規律。「中央執行委員會」須與政府的「工農檢察機關」合流協作。

由於這一種機構，黨的組織根本三原則——一元的統一性，民主集權制與鐵的紀律——得以實施。任何黨

內派別均被嚴格地禁止。所謂派別者，是一種在組織機構之外，以其在黨的身分來組織，來集會，並擬具其自己的政綱與實行其自己內在的紀律之一種小組織。雖有幾個機會致成分派的傾向，但是，直至現在，一切組織派別的努力，甚至尚未形成的派別，均被嚴厲地處罰了。現在以托洛斯基及齊諾維夫爲主腦的新反對派領袖雖自行否認，現仍以他們在黨中試其組派的企圖而被治罪了。這種事情實表示大背列寧的原則，列寧對此站得非常固定而且爲此種原則而爭鬪亦不止一次。這種的原則的實施固不反對黨內的討論，此種討論實則加以鼓勵的。但是，一種政策既被採用了，則一切再要討論均嚴格禁止的，因爲容易弄到分派主義。這是說，假使沒有這樣來限制討論，則黨將成爲辯論會而已，不是一個革命行動的黨了。黨的統一受着最大的威脅，則爲新起的爭論，起自一九二六年，持續一年之久。對於幾個革命元始的領袖在蘇維埃中與在黨中權力位置的更動，實是黨的統一原則之偉大力量的最清晰的徵象。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已允不再作分派活動，但是因他們拒絕拋棄其既遭失敗的觀點，他們雖留存黨內，卻已降級了。後來，他們終致被開除驅逐出莫斯科。

黨內厲行的紀律之一種特色，當稱特別關於公民訓練的一方面。凡一個黨員可被分派至任何位置與在國內任何地方，他必須接受其指派。所以該黨得遣送新任的與訓練有素的工人於各種特殊工作，以提升其活動力。在革命初期爲了特殊任務實行了動員共產黨員是通常的事，現在這個方法不大多用了。但是爲應付當前的問題，亦常用此種方法，以運用一大羣有特殊訓練的與活動的分子，專從事於某地或某種的工作。在革命初期時共

產黨人星期六日組織成就，黨員利用星期六半天休息，來做些最切要的工作，藉以應付危機，及同時亦予羣衆以模範。這種特然的與偶然的努力之實際成績，常不甚大，但是共產黨人此種服務在道德上的效果是切實用的。在這方面，他們洵爲具體地實示其特殊的公民責任。

黨內紀律係藉處罰制而厲行。其最嚴重的處罰是開除黨籍。被開除黨員的名字必公布於黨報上爲一般所共知。至於一社會裏非黨員分子對於被開除的黨員的態度如何則不易判斷，但是這種人似乎是不會被選至蘇維埃裏或其他團體裏的負責地位。其他的處罰是黨的譴責，公衆的譴責，及暫時取消其黨裏或蘇維埃機關裏負責的位置。這個最後處罰的方式纔算真正的懲罰，因爲每個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紀律，且必須接受其任何所指派於他的細微工作。至開除黨籍及其他處罰的理由則甚多甚多，較普通的是黨的公共意見承認各種行爲，爲犯罪行爲的。因此形成一全組的視爲共產黨人失體的行爲。共產黨人道德的一種規範就此演變出來，在許多方面均現其特點。酣醉習慣與撻妻行爲可以使其開除出黨，常用種種步驟協助黨員改過。濫用法律以結婚及離婚亦須處罰。在職共產黨人威迫的或命令式的施政方法，現爲黨所積極反對，而黨的紀律又予以有效的制裁。如共產黨人在國家機關裏站在負責的位置發現有不忠實與腐化的罪過，他們必被較嚴厲的處分。至於共產黨人犯罪，司法機關課以較嚴厲的處罰，其根據何在，今尙未明瞭。當一個人帶至蘇維埃法官之前時，第一個問是問他或她是否爲黨員。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共產黨人，幾無例外，以此，他依革命良心所指示，得依照普通公民曾犯過的法

律的規定，課以較重的處罰，這藉以明一種自覺的責任心。凡黨員犯了特別的罪被黨開除，其事實必須公開地報告於行政的及司法的當局。

有幾種活動對於共產黨人須絕對禁止的。黨員不能從事於雇傭別的勞動以圖私人利益的活動；且明文規定並附以警告黨員不能在私人生活上太密接於資產階級分子。有些領袖並主張共產黨人須留心避免做敵對階級的服裝及態度。有一個作家這樣說：黨員的外表必不可表現出有似勞工的生活或致引起勞工的憤感；並說共產黨人的生活可能在可能中應似工人生活的方式，尤其不應妨害其自己因為精緻設備其住處而增加其經濟的負擔；他再說這又非謂共產黨人應穿污衣破服；最後說：共產黨人與別一階級的女人結婚洵為沒味的事。所以個人的生活不可離開黨的生活。革命的利益與黨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無節制的性生活與飲酒足以損弱革命的戰士。

黨員應有義務是至低須從事於公共事業的活動。每個黨員必須從事於幾種公民活動且將其活動報告於其隸屬的「細胞」並在此種活動中對黨的組織負責。我們將能看到，一個黨員對於一切活動與每一活動的領導權是黨的目的。「細胞」組織的體制，使實現這個目的成爲可能，在各選舉的機關中組有共產黨團，這實是該機關裏惟一的有組織的政治集團。除了蘇維埃裏，職工會裏，合作社裏，及其他機關的一般領導以外，還有其他無數的任務，如學校裏及工人俱樂部裏的演講，組織政治的紀念會等等，都可算作公民活動。凡黨員如被選至特別

黨校內或黨的研究院內作學習上的訓練，他們必須負擔較重的公民活動工作，至於共產黨員如何完成這特殊義務的詳情，則將見於各種不同公民團體的性質及工作之探討，與共產黨人對這些公民團體所起的作用之探討中。我們時常見到黨員在經常職業以外時負其過重的公民任務。且時常在一個「細胞」內，黨員工作的分配每不相等，每每三個或四個特殊活動的黨員負擔了指派在該「細胞」內的或該細胞所擔任的全部的工作。各種會議與各委員集會其為公民活動的，已佔了很多的時間。所以近來有了一種運動，想減少委員會的數目與委員會集會的次數，藉以確定公民活動的義務之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黨員必須許其晚上休息及每星期有一休息日。再則，現曾覺得義務的加緊施行已弄到這步田地，時將活動變成純粹機械式的。即是共產黨人亦僅計算消費時間的數量，而很少想到所做的工作的內容。有了這種趨向乃不得不改變方法，實行其特殊公民活動的理想。在慶祝革命十週年紀念日時，從「十月節特典」裏所吸收的新黨員得允許其在公共服務或社會服務中任其選擇活動的場所。

凡黨員與候補黨員必須繳納經常黨費，此種黨費按各人所得工資與薪水之多寡分為四個範疇：最低級範疇的黨費，是按月得工資付百分之二分之一；第二個範疇付百分之一；第三個範疇付百分之二；第四個範疇付百分之三。農民分子的經常黨費則由省委員會規定。失業的有疾病的與無工作能力的免費。三個月不付黨費且無相當理由的則停止其黨籍。至於入黨費則均按月資抽百分之三，沒有例外，須於進為候補黨員時繳納之。

黨裏每月最高工資或薪水在大城裏規定爲二百二十五盧布，在較小的城或省減少若干。假使一個黨員所指派的職位每月所得薪水超過此額的，他必須將其餘金充作黨的貯蓄。前已言及，共產黨人不許從事於圖利的事業。但是，工作於文學界及教育界的是受鼓勵的；黨員得允其保留由寫作及講演所得酬金之大部分，這種寫作與講演既非其經常工作又非含強迫性的公民活動。在這個場合上允許個人利益的因數存在亦可稱爲適宜而妥當的。由黨裏按百分法對此等收入抽來的資金則存貯爲黨員之特別補助金。

「黨的最高薪金 (party maximum)」現在似乎有變更了，這種變更雖然沒有經過廣大的討論，卻已在通令中規定了。在一九二六年地方的黨部已接受訓令對於生產中的熟練工人不必實施黨的最高薪金。一九二八年的開端，此種訓令又應用到工場技正及技術專門家方面。這個「黨的最高薪金」現似乎僅僅適用各經理及公務工作人員方面，即是對付官僚分子的。在這個原則仍應用於爲這類人員時，這實足以具體表明共產黨人自覺責任的觀念。共產黨人認購公債是所盼望的，這種公債大概具彩票性質，受獎的高額達二萬五千盧布。共產黨人如得中獎，僅可以保留其獎金之一部分，這是由黨部決定。

共產黨任職於某些行政職位得享受正當的徵貼費，如運輸費或旅行費，及有公務使命時的每天生活費等。然於黨嚴肅紀律之下，對此亦有濫用之可能；此種濫用揭破時，必須受嚴厲的處罰，雖許多這些實例似不爲人注意到的。無疑義的間亦有顯赫的共產黨人完全用了徵貼費沒有來干涉的。至於在外國有使命的人們曾有完全

利用一種口實謂在資本主義的環境與資本主義的使臣會晤中，必須予多用錢的允許，健康的設備與在外地及高加索的療養院，於社會保險制度之下，讓黨裏的領袖們與黨員羣衆，都可以儘量應使共產黨人享受，這種待遇比諸非黨員的工人或勞動者，孰多孰少，則非不能確定。

地方的黨部如費用超出了預算，則由黨員黨費、上級黨組織補助，及「別種財源」彌補之。其「別種財源」之性質則未明示。有由黨的出版工作所得的利益歸入於黨的財庫。黨須付專任黨工作之黨員及委員會的書記的薪水。在工廠裏黨細胞所選出的書記的薪水亦由黨付給。工廠裏及其他機關裏不論屬國家的或私人的，其黨細胞有他的辦事室，或幾間辦事室。各委員會都有其辦事處，中央委員會據有一最大的辦公的房子，正當克來林（Kremlin）皇宮的外邊。黨或不必付房金於其各部所佔用的房屋。有幾個蘇維埃黨校，其學生大多數是屬黨人的，亦是國家學校網之一部分，經費應列入教育經費方面的預算項下。在另一方面言之，凡嚴格的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均由黨裏供給經費的。黨對於各蘇維埃的統治的地位曾引起多方懷疑，黨絕對脫離公家財政是否可能。關於此點沒有詳細的報告，可資依考的。

民族性的成分，在蘇維埃國家機構中由於自治與自主的原則而得認可，且加扶植，而另一方面在黨的機構中則使他化爲最低度。如先前所指出，雖然地方的組織，例如烏克蘭，說起來是「民族的共產黨」有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但是其自主性質僅與一無民族性關係的區域內一般的地方的組織相當。黨是「全聯邦的共產黨」。

全聯邦的共產黨之「整個性」有略減這自治權，與聯邦中各單位的獨立性之傾向。黨內的著作固以各小民族的文字而出版，蓋此種文字的應用時受激勵。但是著作的內容則各版均須一致。對黨員作統計上的研究，可得各民族分佈情形的材料，尤足表示各民族領土裏黨細胞所含的當地民族性之強烈。當革命的初期，革命集中於及發展自俄國工業中心區之時，俄羅斯民族的分子有在共產黨組織裏佔優勢，且在非俄羅斯部分的蘇維埃機關裏亦佔優勢的傾向。例如在烏克蘭，此種情形尤為顯著，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烏克蘭戰爭來來往往經過了好幾次，同時在烏克蘭黨裏猶太分子也覺聲勢浩大。這些傾向在地方的集團裏即共產黨人亦會彼此衝突。民族主義雖受到反對與攻擊，但是推引的自治的與自主的共和國或特區裏，各小民族的共產黨人前進，亦是計之善者。對於民族原則雖作策略的與因此是暫時的特許，而黨仍使此種民族性成分屈服於黨的機構及組織以內的。

入黨時必須條件之一，是要做成一個武裝的無神論者。共產黨人之不作一切宗教的信仰或不接近教堂尚是不夠的，他必須積極反對宗教信仰，據他們的意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用以愚弄人民的。無神論是馬克斯主義者唯物論最主要的一部。黨員時因其參加宗教的儀式而被開除。凡家庭裏繼續宗教禮拜的農民黨員須接受一個條件，即要克服家人的宗教信仰。在反宗教的活動中，共產黨人曾受到嚴格的訓令，須採用一種應變的機智，以免增強信仰者的成見；早先直接攻擊一切宗教的方法已改爲用科學解釋之間接方法，以除其所謂成見。

除了這個爲方便起見的訓令以外，更希望一切黨員都能作反宗教的宣傳。

共產黨領袖們主張：雖然黨的機構內有高度的集中原則及實施嚴格的紀律，而黨內真正與不可缺的民主制，仍是具有的。黨內的民主制在以下三形式表現出來：

第一、黨的組織從最下層以達最上層現在都是選舉出來的。從先由高級指任其下級的書記的辦法已完全廢止了。再則，現行的政策是在改善選舉者的地位以增加黨員的活動力及自覺心，並有系統的使黨員羣衆不僅參加討論問題而且參加實際的領導工作的。

時常舉行選舉，欲藉以防止黨內官僚主義的發展及黨員之上層與下層羣衆的割開。雖然，黨內之常任執行人材多少是存在的，即所謂「負責的黨務人員」、「技術的黨務人員」與「細胞」及各委員會內的有薪書記。在一九二六年際，此種人材全數共有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人。同時，每個黨員入黨的日子是要精密記載的，因在黨的歷史，就是在黨內站着某負責職位的資格。革命以前的黨員稱爲「老先鋒」。最初凡一九一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在黨裏都得有高崇的位置。凡革命以前已得黨的中央委員者，在過去都有重選的權利，這在實際上已成常規。這種實效曾經公開的宣佈。近來領袖間起了爭論，革命以前的黨員，如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排出於中央委員會的問題發生了，在辯論會上，有一發言人宣稱黨不會需要且不應承認其隊伍中尚有「貴族」。

第二個民主的原則，是被選的一羣人對於其所選出的集團應作經常的與屢常的報告，這是黨機構的基礎。

任何特別集團的「活動分子」均視爲事實，但是這種分子不是可以替代該總集團裏的大會的。

第三、充分自由的討論，不僅允許，而且有系統的加以組織，這是該黨所主張的。但是關於討論須有一種限制，卽是，一種特殊的政策，如已爲中央委員會明確決定，必須接受，一切對此題目之繼續討論均被禁止。但在每個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所印發的大會議題，得在一切「細胞」內與各委員會內於大會的籌備時作自由的與有組織的討論。如此討論，必不致分裂成派別或集團。

因爲他們自己已經規定與實行領導者之負責，致在初起時共產黨人中曾發生傲慢與居上凌下的危險。列寧時常責備「共產黨人居上凌下」的表現。晚近，關於這個問題則很少討論，不過在各個人間居上凌下的持續可於現在恆常的努力革除所稱爲「命令式」的惡習見之。黨員的重登記，監察委員的檢查，以及黨對於黨員厲行紀律的措施其一部分的原因，卽在防止領導權之僭越與其命令的方式。當其他各機關及團體發生討論時，與對共產黨員的作用加以說明時，這個關於共產黨領導的性質問題，必須每次加重提及。

概言之，在實施的領導權時，時常宣稱黨必不可失卻民衆的聯繫而變成官僚的機關。此種事情發展的可能性大約在去年更明白表示出來。因怕批評將認作爲反對此種領導，民衆乃丟開理論不敢毅然對於這種傾向予以批評。茲有幾個顯著的實例，足以表示對黨內上級的專橫完全失掉了制馭。在一個例子中，凡有二年半時間，黨的官僚主義，武斷鄉曲，破壞了蘇維埃法律，並破壞了黨的一切規程。後經中央委員會成立了特種委員會纔將地

方的黨部非法的事情，予以清除。這不僅是必須予以經常打擊的「命令式」或「共產黨人傲慢」的即曲解領導權的一個例子；這是再壞的「流氓主義」(Hooliganism)，不過在黨的領導權掩飾之下行之耳。因之發生了訴苦的案件要將這些當時人處罪，即或這些人是黨員，這是表示黨裏的羣衆要試行黨內民主制。這些羣衆到不得已時則召集秘密會議，並邀當地政治警察蒞會，藉以免除政治陰謀的處分。這事是局部的，且在大體上是較小的事。但是如將此事件在本省或其他各省中心區作廣泛的探討，則對此領導權的曲解，黨紀律的破壞，及黨內民主制的失墮，並不歸咎於地方的特殊環境。要保持黨接近羣衆，地方的監察委員會接到命令，凡在工廠中與各機關中於假日與星期日須規定經常辦公的時間，以接受此種訴怨的事件，此種申訴可以口述不必用正式公文。

雖有反官僚主義，反「命令式」的領導方法，及反共產黨人的傲慢各種運動，而於領導權實施時護短的成分仍似乎不能避免的。護短的結果常成爲一個顯明的消極，且有時則成了積極的同盟不合作。同時有些分子則顧全紀律，用了間接的方法，以逃避共產黨人的護短罪。在選舉時或集會時之不出席主義(Absenteeism)即是消極的表現，因爲選舉的數數及集會次數的頻繁，到會人數的百分率在旁觀者表面上看來，似仍很高，但是從這機關或團體，是否適當運用來觀察，特別是從一切活動中他們領導權之實施來觀察，他們對於共產黨人領袖們頗致不滿。此種選舉，大會會議及集會——詳情再述於下幾章——當視爲常軌通路，由於這些常軌通路民衆裏活動的各種式樣得以發展，與在蘇維埃體制下之惟一合法的黨得以互爲作用。同時，共產黨人不可「隨波逐

流。」抱着「純粹住民」(mere inhabitant)的觀點是最嚴重地離開「列寧路線」之一。

自我批評是該黨在最初即已實行之一事。就自我批評到近來纔成通行的口號的事實看來，足知此事尚未得有效的實施。因為對於黨的威信及黨員間必存同志關係的顧慮，自我批評致受到挫折。但是自我批評已通令認為絕對不可缺的了，假使有人反對此種新口號，則被稱為「塗了顏色的共產黨人」，即是失掉了黨的精神。凡足以強固而不削弱蘇維埃制度的批評，黨裏規定為建設的批評與有用的自我批評，任何人在此批評的立場裏應用該黨所享的合法特權，亦是可能的。因為自我批評繼於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間的冬季成爲一種口號，須使其有真正廣大的，且具有組織模樣的發展，則要決定它的性質或它的真正效果爲何，爲時尚早呢。例如對於拒絕「一個純爲住民的申訴」已很小心地決定了。

黨的領導作用達到一切經濟生活的領域。各個黨組織必須對於經濟活動每一路線予以研究，指導及調查執行指令的成績。故各黨部應負穀類徵收，大規模建設，或農業合作各種計劃的適當執行之責任，這是舉其幾件重大的任務而言。各黨組織是權力機關之一，應接受工廠委員會的報告，例如工廠的管理部有排斥工人的行爲時。黨所規定的經濟領導權的全義，是當經濟的危難發展時，在使領袖們親切關注。在每個事件中所定的作業，均需要黨的指導；各種危難問題大部分是歸咎於領導權暫時的羸弱。例如黨員在黨內專從事於鬭爭，則不能實施其必需的領導。這不僅使「敵對」分子擡頭，即重要的經濟計劃亦遭着嚴重摧毀，馴至擾亂了整個的經濟生活。

共產黨人領導權的觀念對於一般經濟活動的關係之認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的一個重要的黨的會議上，布哈林解釋得很清楚，他說：「若比諸資本主義的國家，它的政客們雖然鬭爭，而托辣斯的大人先生們與政府的機關仍是繼續工作，至於我們，一個黨內的鬭爭，將使國家全部的經濟組織感受到很大「威脅。」」

黨員的特殊訓練與教育的設備，則有各種學校各大學各研究院及各學社的設立。「政治訓練班」這一類的特殊黨校之首要目的是爲候補黨員造成正式黨員的。其相似的學校之高級班也給黨員在領導方面與辦事方面以更進一步的實地訓練並給以較廣大的理論基礎。此種學校之目的又爲保持活動的共產黨人與習常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各問題發生接觸，使其克盡公民義務，在指導上更生實效。更高級的研究院是爲富有實際經驗的老黨員而設的，命名爲共產主義高等學院或大學。爲造就共產黨人爲大學教授的，則有特殊的學院。此外還有工科學院之設置，以供給各企業的共產主義的指導者，及紅軍裏的指揮官，再有共產大學及青年訓練的共產主義大學。又有較非正式的名爲馬克斯主義者列寧學社，而以灌輸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學說於共產黨人爲特殊的目的。

在一九二六年幾處地方，竟有百分之八十之黨員受登記並在這些教育機關裏學習；至在國內其他較落後地方，僅僅百分之三十的本地黨員，受這些機關訓練，以增進其黨員資格。測驗「政治訓練班」裏的團體或個人是各監察委員會工作之一部。黨的政綱與規程及其定期代表大會之決議案，是這些學校裏研究的主要題目。至

於此種政治學校及其他主要為黨員而設的教育機關，將在下面的專門題目下作詳盡的敘述。黨員資格受限制之一種原因，是注重每一個黨員必須有理論的基礎及對於列寧主義根本原則有明確的了解。入黨後黨員須繼續研究。因其計劃，本為繼續訓練用的，所以能受適當訓練的新黨員尚屬有限。

共產黨有他自己的出版物；各種機關報，及其他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由黨部刊行，其數量與重要實過於蘇維埃機關所刊行的，黨報及定期刊物是蘇維埃最良的出版物，並有最大的銷數，並在定期出版物的總題目下，時加研討。我們在此祇須指出：此種廣大的出版物有此成績，是因為黨員能一致，有紀律，有訓練，及受集中的指導的結果。在黨報內黨裏的工作人員及黨員羣衆不特得到他的消息及新聞，即他們的普通訓令亦在此得到。尤其在革命初期常有這種事。現在黨的組織已進至金字塔形的結構，所有一切報告與訓令得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地互相交換；而必要的會議與大會又時時補足其文字所寫的報告與訓令之所不及。省委會所出的日報，尤其是中央委員會所出的日報與各種刊物，時予黨員每日工作的暗示。且黨報又劃出一部分，或闢出一欄，名為「黨的生活」，將各監察委員會關於各地方組織的特性及活動，據調查所得的報告予以發表。在此欄中各黨員亦可發表其關於黨工作的感想與創議。

黨又印行許多小冊子，廣為播散。每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一串小冊子之所由生，大概是由著名的領袖或以史太林為首的秘書處委員所寫的。最後，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又出版黨史及黨的建設之教科書。合

紀念性質的黨史亦在編纂中，由老黨員組成的出版部已經成立了，各檔案正在搜集之中。按法律規定所有一切機關均須在其行政工作中連帶搜集，統計與其他的材料歸入黨的檔案中，以防萬一之損壞與散失，並特別使黨史尤得有詳盡的材料，以爲訓練未來的黨員之用，黨史的教本與其在各種教育機關的教學大綱中所站的位置，當於下幾章再行討論。

列寧是黨的創造者，是黨的領袖，前已扼要言及，但是此處必須申言的，是列寧的人格及其著作影響於共產黨人的力量，以及藉此對於一切思想與活動的影響。自從列寧死後，發生了對於這個爲該黨矢言進行的運動之公認的領袖作真正的崇拜。該黨時名爲「列寧黨」，且其他各種團體，如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主義兒童團等，將列寧的名字也排入其正式的全銜之內。革命發生的都城改名列寧格勒。黨的理論是根據馬克斯主義，但是列寧主義漸漸替代了「馬克斯主義」一詞。「列寧主義」又來逐漸替代革命初期之「布爾塞維克主義」一詞。這並不是言過其實的：在不論任何題目上，要招一個重要的陳述，而沒有引證「列寧同志」說幾句話語的，實是難事。在大約一千字左右的短文中，差不多有十次引證列寧關於所討論的問題曾說過的與曾寫過的話。最近黨裏的爭論大部分都是關於列寧著作正確的解釋問題，這種著作已視爲黨內的箴言了。這種箴言時被引證到與引用到的。要將這一個人的意見與判斷如何影響及一切黨員與候補黨員的政策與判斷詳加說明，則本書未免過於繁雜了。在「政治訓練班」學校之一級裏的教學綱要中，叫教師注意於尋找對於討論過程中所發問

題的答案應在列寧著作中或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中。列寧在世時，黨的決議案在事實上是由他起草的，自從他死後，黨裏沒有一個重要的決定，不從列寧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詳細審查的。

列寧的著作包括其許多演說詞有許多種版本發行。新的完全的版本正在印行中，這個版本當能完全搜集他所有的著作，其較小的版本，由他的論文及演說詞選集而成，足為各種教育機關之用。他的著作及公衆的演說的總集會以各種特別標題編集，譬如黨的組織就是一例。工人與農民閱讀的定期刊物時常按期留一部分或一頁將列寧的學說扼要地載下。初級小學的課本編入他的生活之故事及其學說之要略。「列寧學院」是一座形似工廠的大房子，是對此領袖所有著作的搜集與研究的中心。論列寧的詩文散在各國文字上已大足可見了，該學院亦加以集成。大小不等和語言不同的版本之編印，是這學院之一種職務。該處將為統制這領袖學說的銓解之中樞。在為共產黨人作辯護的場合上，列寧就即刻取得從前馬克斯所有的地位。

共產黨人自始即承認領袖個人作用的重要；並以此使他們的宣傳工作更得實效。領袖們的畫片與革命的事迹，在肖像上與在招紙上，廣為應用。在藥舖上通常都可找到「公衆衛生人民委員」的肖像。領袖們的肖像與半身像廣闊的分佈已視為常例，而其中列寧的畫像自始尤為特出。自從列寧死後國中真是揚溢着他的肖像、鏤像、印像，或為素描的，或為着色的——以及人體的大銅像，與大小不一的半身雕像；雖然他的夫人克露斯卡爺會發表談話說列寧寧願在建設上努力不在對他的紀念，但是仍是無效。在每個機關裏列寧的面容對人俯視着，在

農舍裏都可以找到他低廉的印象與神像排在一塊。

在各機關裏，列寧的全身肖像與半身雕像是「列寧紀念處」的主要裝飾物。「列寧紀念處」的設備是崇奉列寧最普通的現象。有幾個「列寧紀念處」含有歷史上的意味，用一種很精緻的方法設備。「列寧紀念處」能表示這個機關對於領袖在個人上與職務上的關係如何，有一個學校，列寧與其夫人曾在此度過一個短時間的假期，其夫人即是該校董事之一，以此該校學生就將他的私人有趣味的物件設置於「列寧紀念處」中。在一個工人俱樂部中，表示該俱樂部的工作性質的統計材料，同時亦能指出列寧對於此種特殊工作之重要性的觀察。又一個鄉村學校裏誰都見得到「列寧紀念處」是由該校學生得其教師之幫助所造成，其形式與在室內的位位置正好似教堂的神像所設置的情形。一切宗教上的徽號與儀式在政府的機關裏及學校裏均受禁止，所以在另一意義上說「列寧紀念處」就是以前的神像之代替物。拘留所與感化院中的「列寧紀念處」是由犯人設置的。在每一俱樂部中與鄉村讀書室中「列寧紀念處」是該團體裏政治活動的中心，故「列寧紀念處」的制度，利用之足以增進政治活動並是公民教育最普遍的方法之一。

現今「列寧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成一處，此種「列寧博物館」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中央的「列寧紀念處」。該館收集了領袖許多私人的所有物，如其衣服及黨員證、職工會會員證與蘇維埃的公民證等。在一玻璃箱內藏有一九一八年他被射擊的手鎗，已取出的子彈及醫生施手術後所附的報告亦陳列着。在另一

箱裏放着列寧於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化裝與隱藏時所穿的衣服。

列寧墓真是虔敬這領袖的中心區。一種暫時的簡單而稱心的建築設置於含有歷史性之莫斯科的紅場上。克來林宮牆之下。在「列寧墓」的後面並在克來林宮牆之下，有一狹小的花園路是其他著名的領袖埋葬的地方。美國的共產黨人約翰利特（John Reed）已死於莫斯科，也葬在此處。在克來林皇宮之內，正當列寧墓之後面，是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的地方，這是蘇維埃政府最高級的機關。一面紅旗在夜間照耀着探險燈，時常掛在圓穹屋頂的旗桿端上。在熱天晚上八點鐘時候，在寒天下午五點鐘時候，幾千人成行步入墓中，瞻謁列寧的遺骸。這行人兩兩並肩而入，降自一狹狹盤轉的階梯，到了一個凸出的平臺，在屋中心環行一匝，列寧的遺骸就是躺在其中，透過了非常潔淨的玻璃，誰都能俯視到舉世聞名異香薰裹的身體，至此已無憎惡的情感了。即是純粹的旅行者出來也深受感動。這個人的健堅的面貌，視之好似一個簡單的工人，其對於俄人的感動力似乎更大呢。在共產黨人看來，這是偉大的領袖，他的遺訓，他們正在遵循與實踐中。

莫斯科一切革命慶祝典禮均會集於「列寧墓」的週圍，這裏成爲演講者之演講臺，通過了揚聲器與播音器，對於這領袖誓言的申說遠達了無線電所能到的地方。故「列寧墓」是一政治的中心，亦是謁陵者之中心聖座。後來，永久的建築當來替代現在暫時的陵墓。

「列寧墓」是所謂「崇拜列寧」之最顯著的象徵。許多共產黨人無疑地不喜且反對這種對個人的態度。

的發展。共產黨人憤恨旁觀者與學生們常用「宗教」一字來描寫這種運動。革命的真實領袖實是惟實主義者，但是他們時用革命的熱忱來煽動與興奮活動分子作較大的活動。以此，這些活動分子得藉黨的作用以號召一切機關及團體。這種活動分子認列寧是其先導者，——研究之，遵從之，要把他的遺訓獲得忠實地實行。黨的實際領導權在已死領袖人格之下受到掩護，在此意義上，發生對領袖一種虔敬，即以此種虔敬得以將在組織中的後進分子統一起來，同化起來。爲了這些認識不甚清楚的羣衆計，在政治宣傳上利用列寧的人格實足以將他們推前一步。因爲他們尙未信服辯證法唯物論的原則，尙未曾表明具有入黨之應有的革命熱忱，則列寧虔敬是較爲直截了當的辦法。對於青年與兒童，列寧是個老同志，總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暗示。在共產黨人的大教育家勃朗斯基（Blansky）所編的初級讀本中，述列寧之死，凡有二種選品，第一種是敘述一個小孩走到車站上守候運載列寧遺骸到莫斯科去的火車的故事。這個小孩子要求一個工人當車經過時將他抱起，使他能從車窗中看到，並得向他說一聲再見。第二種是一首短詩，描寫在紅場上的葬儀。當喪殯隊悽然前進的時候，在北方寒冬的一個下午，天色陰沈，慘雲密布，但是恰當遺骸到達克來林皇宮時，紅日忽開，皎麗的光線直透層雲。

共產黨的組織與活動之關於蘇聯與蘇聯之內的情形，此地已予論述了。該黨是共產國際之最大的與最重要的部分，他在蘇聯之外也有其活動的場所；且其黨員時被引到注意於他們的國際革命家的義務與活動。因爲黨是「人們的集合體」，這些人們決意爲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而戰，奮鬥到底，不顧一切，而且絕無猶豫逡巡。

共產黨對於國際事情的注意與活動，將於討論蘇維埃體制中之其他機關及其他團體的國際性質之一章中再行論述。

第三章 共產青年團（康沙木爾）

在蘇聯裏，主要的政治組織是聯邦列寧主義共產主義者青年團（All-union Leninist Communist Union of Youth），團員總數超過二百萬人，約分爲二萬三千個細胞。這個組織的名稱通常省寫爲「康沙木爾」（Komsomol）——共產青年團，茲採用此種簡名。共產青年團概爲共產黨作訓練的場所，在名義上雖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但是受着共產黨的指導與實際的支配。它自謂是共產黨的首要後備軍，或爲「少年前衛」以備接替黨的「老前衛」。教育的與一般文化的工作在共產青年團的活動上固甚着重，然該組織亦有政治上的目的。其團員不僅努力於求政治的知識與政治覺悟的增進，而亦應積極參加公衆的生活。青年人在十四歲的時候得許加入，並到二十三歲止得留居於團中成爲活動的團員。所以許多團員都已爲公民，且大多數均已從事於生產。其有參政權及已爲獲取工資之較老團員，與共產黨員一般，均爲自覺負責的公民。共產青年團較年輕的團員，即在十八歲以下的男童與女童，亦自覺地作未來公民的準備了。

在青年中，此種政治運動的提創與發展，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共產黨人已在其政綱中載明。列寧從他握到黨的領導權之起首幾年，即以加重說明宣傳青年工人與農民的重要。他在一九〇三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

提出該黨在青年中工作的決議案。在舊統治裏所有經濟與政治的特點，實爲構成此種特別注意該國青年的提
示。俄國未成年者在工業界廣泛的雇用，使男童女童與年大的男工女工得獲密切的接觸。俄國的中學生與較高
級教育機關的大學生共同參加了政治的組織與活動。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大戰期間，未成年的工人廣
泛地雇用於工廠裏及礦業裏，代替了成年人的位置；據一般估計，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前夕，凡有五萬的兒童與
二十四萬三千未成年者發現於俄國產業工人階級中。

因爲與實際生活這樣的接觸，俄國青年的大部分便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第一次革命而發生了羣衆政治
的覺醒與活動。在各種組織的形成之幾個月中，青年們尤其大城市的工人階級，集成爲特種的集團。此種運動的
支配權成爲布爾塞維克與其他各社會主義黨激爭的問題。非社會主義者，如各自由黨，在其組織的努力上亦不
忽視青年分子在革命時期中之特殊重要。青年學生與青年工人在一九一七年的幾次革命參加示威運動與遊
行中均甚踴躍。這時期赤衛隊（Red Guard）的組織，亦足以吸引青年羣衆；以此布爾塞維克黨人得能籠絡許多
的青年組織，在他們一邊。在十月奪取政權以後，如初發矚的青年運動之大部分羣衆羣向赤衛隊，以此得直接參
加革命的鬭爭。

不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各地方的青年組織終於互相連絡。由莫斯科與彼得格勒各團體發起，召集一個代表
大會，出席各代表係代表約有二萬二千有組織的青年。在這個大會中，俄羅斯的共產青年團正式成立。此時內戰

正入劇烈的時期，參加革命鬪爭的路徑與方法是該會討論的要點。次年，有組織的青年分子在新成立的紅軍裏面佔了很多數目。偵探工作，在政治上與在軍事上，每有青年民衆擔當，且收得成效。一九二六年夏季有一通行的影片名爲小紅魔鬼，描寫一個俄國小孩與其姊妹的冒險事情，後來加入一小黑人，他們三人附入蒲仲尼（Butt）的紅色騎兵隊盡了有價值的服役如間諜偵探等。

一九一九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各代表係代表九萬六千的團員。軍事上的鬪爭與青年民衆在這鬪爭上的作用仍是時的論題。該會議決全體團員百分之三十由其自願動員到紅軍裏去。間有幾處地方的組織竟提高了此種比數而動員到百分之八十者。同時，新團員的劇進運動亦已開始，隔年所有登記者增加到了四倍以上。一九二〇年十月的第三次大會就代表到四十萬左右的團員。一九二〇年農民中的青年分子服役於紅軍中的，也參加此種運動，但是各處地方支部的領導權仍以工人階級的青年爲核心。

一九二〇年的代表大會，代表新時代的開始，在此共產青年團現出稍具不同的特性。在軍事與政治的陣線上已獲得了勝利，邇後的注意則轉移於經濟的復興與文化的推進之各問題上。列寧曾親臨這次大會，他對各代表的演說詞已成爲共產青年團方案之一部分。領袖給青年們的一個要語是：「學習，學習，保持繼續不斷的學習。」共產青年團的團員亦可稱爲青年共產黨員，必須學習以成爲共產主義者，他們必須學習，但是亦必須參加工人階級實際的鬪爭。列寧給青年們第二個的教語是提及參加生產的實際工作的需要。該會議決教育的方案，補之

以公民訓練的申述。在同一大會上，對於兒童特別訓練的問題亦曾議及。對兒童作共產主義的訓練是該會所探討的另一個議題。因舉出並分派共產青年團團員在兒童中擔任工作。訓練班與自修課程的設立，就是為這些團員準備擔任此種工作。因此曾認為此種運動之一個弱點之團員的「政治文盲」(political illiteracy)當能減少。這都是學習成與訓練成共產主義者之一部分工作。兒童運動發生較晚，即所謂「兒童先鋒」但在革命初期，共產黨諸領袖在諸項工作紛忙之中，尚抽出時間，認為不僅要在經濟危難之中關護兒童，且要給兒童們以共產主義的訓練。這些青年共產黨人被選出在兒童運動中擔任了重要與負責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年尾共產青年團，所採取政策的新路線之最具體成效是建設附於工廠的學校，使青年工人獲得政治的與技術的訓練。一九二一年一月「工廠學校」(factory school)的數目有二百四十九個，註冊的學生約有三萬人。這些學校就實行列寧所提議的兩種活動，即學習與參加生產之同時並進。這些學校正切中過了入學年齡不能入學校的一班青年工人的需要。青年工人亦正需要更切實用的教育。最後，與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所俱來之工業界的情形，使工人階級的青年之地位受到逆勢的影響。依據生產給資之施行，雇用人員的減少與國家合理化制度的廢除，使初被開除的青年工人實予以困難的物質的遭遇。同時，以全工資付給十八歲以下的童工從四時至六時的短日工作之辦法又不再繼續施行。所以技術的訓練須予力行，以便幫助年輕工人在工業界中獲得穩固的位置。再則，革命的「戰線」現是在經濟的領域，在生產的行程上技術的改進已成爲新

時期的各種任務之一種。

新經濟政策又引出各種制度，如咖啡館與別種娛樂所等，他方面又須發展學校與俱樂部以免除市塵影響及青年。

雖然有多種方法之採用以圖挽救青年由新經濟政策所造的情況，但是尙不能防止共產青年團團員人數顯著的低落。後經過一九二二年十月第五次代表大會，此種危機纔行過去；該會議決團員年限從十八歲擴張到二十三歲，此種運動就得到迅速與重要的發展。在一九二二年的大會裏，特別注意對國內青年作共產主義訓練的方案之詳細辦法。在俱樂部裏，與在戲院及電影場上的各種健全的娛樂方式，均包括入共產主義訓練方案以內。該會再討論到在後起青年中關於社會行爲的標準之建立與增進。在青年人中，關於酗酒與縱慾的情形應予以有系統的攻擊，青年人中此種情況由來已久。又有許多年紀較大的發言人主張應有階級的自尊心與共產青年團的操守規律。這個時候，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共產主義運動者，即所謂「共產兒童先鋒」(pioneers of communism)已開始形成各小集團。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關係更嚴格予以規定。最後，共產青年團在這時候承擔紅色艦隊的「扶護」與執役。此種在船員中的特殊工作成爲共產青年團各種重要公民活動之一種。

一九二三年沒有會議；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二四年召集，以前的團員資格重行確定，總數達到六十二萬三千三百人，內中五十二萬人是正式團員，十萬三千三百人係候補團員。在所有正式團員中，四十四萬二千人是

男青年，七萬八千人係女郎及少婦。因爲一般的政策注重到農村，青年農民參加這個運動的亦大形增多。次年這種迅速的增長益加顯著。一九二六年全體登記共有一百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人，內有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五人是正式團員；其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人是男孩及青年男子，二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六人是女郎及少婦。在階級上，此種全體團員的分配如下：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五·八；農業勞動者佔百分之七·八；農民佔百分之四十五·一；其他佔百分之十一·三，故知農民分子佔大多數。這自然因爲農民是較大的集團故有如此成數。至就一單純階級而言，最大比數仍屬工人階級，他是該項運動的創始者，並仍保持該項運動領導權。在一九二七年團員總數愈見繼續增長，達二百二十五萬人；邇後雖有退落，但在一九二八年人數尙超過二百萬人。蘇聯人口的統計在十四歲與二十三歲之間，一九二六年的數目如下：工人七十萬人；農民二千五百萬人；其他三百五十萬人。此種運動數量上的造詣可以想見了。

在第一次大會時，此種青年組織關於適當名稱的採用，曾經議及，引用「共產主義者」一字是否妥當，當時成了問題。有的主張以此字會嚇跑非黨員分子，尤其在農民方面；但是決議指出稱呼此種組織以「共產主義者」更爲確切，因爲該組織是密接於黨的。此項運動迅速的滋長就可以見出該組織具共產主義者的特性並不會嚇跑青年農民。後來就有一種提議：須組成一個純粹非黨籍的、較大的青年羣衆的組織，以輔助共產青年團，其中一個意見就是職工會中之青年男子組織。但主張共產青年團應有自己主張與生長的充分權力，且具備容易入團

的條件。在許多工業中心區，共產青年團關於領導方面在事實上已成爲羣衆的組織，吸收當地青年工人，人數之多竟到百分之九十。所以決定共產青年團在蘇維埃青年運動中應保持其專斷權。

進入共產青年團的條件比較容易。青年工人及青年農民不一定需要政治的訓練與經驗，這二階級中的青年要求加入亦不需要介紹。僅對於來自中農的青年，則多少予以注意，因爲中農不容易在「古拉克」或富農方面分別出來。非農民及非工人出身的青年要求加入，須有在團三年以上的團員二人及在黨二年以上的黨員一人的介紹。這些青年就是雇用於蘇維埃的機關裏或此類人的兒童，即所謂第三個主要範疇的分子是。由「資產階級」父母撫養的青年頗難加入。聽說有一個村莊的店主的兒子要求入團，曾被毅然拒絕。但其政策則對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之加入須經過介紹手續與候補時期。工人與農民出身的青年要求加入，則沒有候補時期。至對於其他一切分子要求加入者，可列席各種集會及參加該團的活動，惟沒有選舉權，並被監視且分配工作在公民活動上與普遍行爲上，這樣須經過六個月的時期。

階級原則的實施在共產青年團裏不比在共產黨裏那樣的嚴格。同時，工人分子數量上的優勢尙未達到。然「指導的核心」(directing kernel) 必須是工人階級的青年。此種工人領導權的獲得，一部分由於選到高級委員會充當委員與充當書記職務須有一定的資格。假使他是工人的話，在團裏與在黨裏只要一年就可以充當區委員會的書記；農民則必須二年在團與一年在黨的資格；至於勞動的智識分子的青年要得到書記位置，則

在團須三年在黨須二年纔爲合格。選到省委員會去的資格條件更高，但亦依照同樣的比例。黨齡的限制是使黨對於團的領導權怎樣發生實效之一種方法。黨員兼團員的用意，亦是顯然了。

團員可被與時被開除。從團裏開除出去比諸於黨更爲屢見，但其重要性則有不同。從團裏自動退出是很通常的事。我們往後可以看到退出幾個主要的理由。被開除的原因很多是同於黨的。不付會費，不出席會議，不參加團的活動，都是必然地弄到團員的革掉。破壞團的政綱、章程與紀律的事件，是開除的主要理由。團裏的紀律比諸用之於黨內的不甚嚴格。酣醉、胡鬧與「行爲失了團員的人格」時致開除。

共產青年一如共產黨人，務須有相當時間作公民的活動，但是此種義務的實施不比共產黨人一樣的嚴格。雖然，共產青年必須求學於特種學校與「政治學社」(Political Circle)使成爲具有政治常識者。此是一個例子。假使團員在團三年後尙不能得到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之知識，則被開除；而最低限度的公民活動亦須嚴格進行。在二十三歲時，該團員必然地成爲「不活動的團員」。假使在二十三歲時，一個團員經過共產青年團的訓練與活動尙不能進入黨裏，他必致失掉團員資格。

共產青年團的組織與黨一樣橫過一切民族的界線，是「全聯邦」單一的組織。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有一個「烏克蘭青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分離的組織，到這年纔併入較大的俄羅斯的組織單位中，而將它的名稱從「俄羅斯」改爲「全聯邦」。至共產青年團的印刷品則以蘇聯內多種的文字印行以便給各種民族的青年

閱讀。雖然宣傳上文字頗注重各地方的情形或風俗習慣，尤其在較落後的民族，但是在團的章程方面，各民族的集團都是同樣的。民族主義的傾向則力予攻擊，尤其對於俄羅斯一部分的團員，這部分人時常受到訓令，應以圓通的態度對待各個在舊時期時受到俄羅斯化政策的壓迫與限制之民族集團的青年。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間的冬季，共產青年團工作中應特別注意的任務列成一表，而將攻擊「反閃族」傾向，亦包括在內，此種傾向其時正明白地顯現出來。

在共產青年團內的女孩與少婦之比數比較地低小，此種現象在鄉區尤形顯著，現在費了很大的努力想增加此種比數。此點在後來討論增進婦女公民活動力的方法時再行論述。

共產青年團團員繳費的數目比較低微，應繳之費且係個人性質的。繳費的等級與所收入的比例較諸共產黨員更不易定。許多青年都不能自給或在經濟上不能自立。基本的比率是依照每月工費付百分之二分一，且很多得以免費。若團員同時是黨員則僅付黨費即足。

共產青年團在機構上類似於共產黨。在每個工廠裏或蘇維埃機關裏時常有一個團細胞，在每一鄉區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細胞。團細胞的數目是多於二倍黨細胞的數目，此種超過的情形在農村裏與在教育機關裏尤形顯著。在城裏，一個團員是隸屬於他或她所工作與學習的機關之細胞。各地方的委員會依照蘇聯的行政區以級遞升，正與黨的委員會一般，且中央委員會亦並列存立於莫斯科。其章程在主要方面亦與黨章相同。組織的原

則是統一性，民主集權制，紀律。細胞辦事處與一切委員會均成自選舉，凡下層的組織單位直接隸屬正在其上之一個。每年全聯邦代表大會按期召集，且先之以代表會議。最後，與共產黨具同一情形，團員在非黨員羣衆的機關裏或團體裏成一個「黨團」(fraction)在該機關與該團體所轄領域裏對當地團的委員會負責。

共產青年團有一種徽章，對於青年人得稍許採用象徵主義。這個簡單的徽章佩帶之以爲稍示識別。在另一方面，沒有入團的儀式，新團員的加入，在細胞常會中通過之，沒有特殊的手續與表示。

共產青年團與共產黨的聯系在其彼此幾種關聯上可以見之。此種聯系的組成是間接的表現出來的。有許多團員同時又爲黨員，在二十歲以下的一切黨員必須爲團員，且沒有一人在二十歲以下可以成爲黨員，除非他已是一個團員。以此，這些分子於二個組織中，一邊是黨員，一邊又是團員，故能將黨的強有力的影響及諸於團而得奏實效。以同一成員參加二個組織的會議，並在一個組織裏完成其一部分的公民活動的義務，即對另一方面完成了工作。此種聯鎖黨員主要的目的是在支配團的領導權。這個黨的核心之在團裏，原來人數的比例是超過百分之十，但是因團的總人數加速的增長，這個百分比降到約近百分之八。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有十五萬以上的黨員同時是團員，其在團中的活動可想而知。

在同一的機關與企業裏，若黨與團二者都有細胞，則二者更得密切的合作，甚至時有同一辦事處的。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是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同在一所的房子裏。最後，爲表示團對於黨的更正式關係起見，在黨

的全體大會上，團的工作總是要報告與討論，且通過「指導的」決議案。

此種對於統治的黨密切的聯系，實予共產青年以重要的意義。共產青年的組織時被稱為蘇維埃制度柱石之一。黨的威權與聲望與它至有關係；黨的光榮亦即是團的光榮。當黨的政策問題公開討論的時候，團的細胞對於這些問題可以討論及發表意見。共產青年團集會時或全體大會時，黨的領袖時常蒞會發表黨的政策。因為團主要是黨的訓練學校，但不希望共產青年團與黨的組織並列，同等行動，當團中發現有自主動作的傾向時，雖然其出發點在其時無關要旨，但是過於專斷的行動，時惹起黨的權力機關的譴責。在另一方面許多地方的共產青年團的團體會經驗到黨的過分支配，則會喪失其一切創制權，並限制其活動，而僅執行黨所分配的少量工作而已。至在黨員人數很少及黨員負擔過多蘇維埃職務與黨工作的鄉村裏，則黨的領導權較少有實效，共產青年纔有較大的獨立性與真正的權力。

共產青年團有其自己的報紙，其組織與黨的報紙很相似，不過規模較小耳。中央的機關報由團的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的委員會共同刊行，名為共產青年團真理報。在版樣上，它有些像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是一種與蘇維埃普通報紙同大小的日報。它與黨的真理報一樣，登載團所探的政策及其運動上的發展情形，使團員時時得到此等消息；同時它又是一種普通的報紙，很注意國外消息。關於重要的與投稿的各種評論，大都似為老資格的團員所撰擬，因此等文字與其他報紙的同類文章相較，在內容上稍無遜色。若就其為青年報紙的事實說

來，則其對於目前政治的與經濟的各項問題的探討所處進攻的態度洵足驚人。共產青年團真理報，在公共事務上負有很真實的責任。在共產青年團報紙中，亦可以找到如在一切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一樣的關於理論上與主義的許多論文。

其他通俗的定期刊物，亦由共產青年團中央機關報社正式刊行。各地方之省委員會則沒有其自己的日報，但是用該地方的黨報的篇幅另開一欄。有插畫的週報與月報，有些是技術的，有些是較普通的，使共產青年團的出版規模更爲宏大。此外，共產青年團的出版部，即所稱「少年前衛」更出了多種小冊子與書籍以便青年人閱讀；在性質上主要是屬政治的，但是亦有屬於專門技術的。共產青年團員「兒童先鋒運動」的出版的責任，團委員會編輯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這是爲此種兒童運動而印行的。

「通訊員」(correspondents)的制度，共產青年團的編輯者推行起來的。凡各條新聞消息或理論文章的投入，慫恿團員去做，並認此爲公民活動之一。有許多工人農民或紅軍各報紙的通信員都是團員。用同一的辦法，一個機關裏或一企業裏的團細胞亦時常共編「壁報」，此種壁報，我們可以看到是一種常用的溫和而有效果的公民活動方法之一。所謂「藍衫團」(Blue Blouses)的「活報」(Living Newspaper)運動實予青年分子以特殊的力量，並給以別種政治活動以道路。此種「通訊員」「壁報」與「活報」的組織下章將再予討論。

一切團員之應從事於某種公共的或公民的活動的義務，已在敘述蘇維埃青年運動的起源與共產青年團的機構與組織時略述其大要。至於共產青年團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學校及其他機關與團體中的作用，則在討論此種題目中將再予詳述。今將此種團員活動的範圍述其概要，以示這類公民一般的情狀，這類公民與共產黨人在任何集團與社會中同是傑出的政治勢力。因對於共產青年團所期望的是要它時常成爲一個武裝的政治組織。

在團裏，一如在黨裏的情形，亦有「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的區別。此種判別在該組織最近的迅速發展上視爲必要，不過僅是暫時的。在理論上，一切團員都須成爲「活動者」，且共產青年團具各種不同活動的組織，就是要引導各個單獨團員，使其作有效參加幾件公民的工作裏面。在團的歷史之初期，即在革命時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團員的任務是具體的。這些任務被稱爲「突擊」(attack)的任務，此種熱忱當時易爲煽動所引起，在那時有武裝的敵人須予之戰，有祕密機關的陰謀須予探出，有暴徒強盜須予截擊，又有簡單經濟的短工須於休息日以集團去做，如清潔街道與馬路等。在革命戰爭時期結束的時候，此種工作成爲較無趣味，有系統的計劃與宣傳乃用以保住青年的熱忱之存留。年紀較大的分子已予以吸收，自在團年限從十八歲擴張到二十三歲後，而要將從十四歲到二十三歲年限依次不等的團員形成有組織的活動實爲難事。如此廣泛的組織產生了權宜的工作方式。同時共產黨人對此運動的指導又傾入限制個人與集團的創造力；共產黨在團裏的

領導者，傾向於專斷與抑制的方式，以保障一切活動能嚴格遵循共產主義的路線。

團員與候補團員先須注意其政治意識的啓發，且此種政治的研究亦視之爲公民活動。有「政治訓練班」一類的特種共產青年團學校，此類學校在宗旨上與課程上很似黨的政治訓練學校，二者後來當合併討論。在非黨員的民衆機關裏，則如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等，在這些機關中之形形色色的「學社」中，亦時有政治學社。對於此種特殊活動的創始，參加與指導，是團員的義務；此即是共產青年表示他或她所負的公民或未來公民的責任，此種責任是跟團員資格而來的。團參加黨的政策之討論，上已言及，由於此種討論，青年即在有選舉權年齡以前，亦已將他引導到實際政治生活的路上了。一切團員均準備自己變成爲未來的黨員，每個團員大概都有這種志願吧。

青年時常參加一般的革命慶祝會與紀念會，或則自己來組織。共產青年團是負責籌備與處理工廠青年工人、青年公務員、青年農民或教育機關的學生與學童之各大集團的責任。一九二四年反宗教運動是由共產青年團發動、組織與指導的。際此機會，共產青年集團在準備小旗與標語布的工作裏表示出最大活動力與最活躍的想象力。雖此種活動含有娛樂與玩耍的成分，亦足以消耗工作與需費。革命慶祝典禮如此之多，一切又均儘量的與精密的佈置，此種預備與參預已成爲頗大的負擔了。

紅色艦隊的扶護制會由共產青年團擔任。此種扶護制度，即是一個較有政治意識的與有組織的集團，對於

以生活條件所限制而較少政治意識與組織的集團的扶護，在蘇維埃公民教育制度裏面用得很廣遍。在海軍裏長期的服役及在該處生活的條件需要彼等特殊努力，使紅色艦隊中的青年得接觸公民生活與自覺其在新制度中的地位。此種特殊關心於紅色艦隊的船員之物質幸福與文化發展之職責，因之整個負在共產青年團身上。印刷品的分配，組織政治研究會與討論會的幫助，旅行各集團的互相拜訪，以及船員給假的酬酢都是「扶護」制所應有之較通常的方式。

其具此種相似性質的，則為共產青年團在鞏固工人與農民的關係上所起的作用。此種工作太具一般性，難以包括所謂「扶護」制度之範圍以內。自從一九二一年以來，各種政績之一，即是「工人與農民的黏合。」在這種欲在工人領導之下保障工農聯合的努力中，主要成分就是這二種分子的共產青年團當然是極便利的工具。比諸「扶護」制更具特性的，則為共產青年團在十歲與十六歲兒童中所負的兒童先鋒運動的實際領導權。此種在兒童間之共產主義的運動，下一章將予以討論，在下一章裏將把共產青年團在其自己的「後備軍」(Reserve force)中之領導與訓練的作用予以說明。分派到兒童先鋒隊裏去做領導者亦是許多團員之必需的公民活動。這也是共產青年團之最實際的最具體的任務之一種。

在此後將加枚舉與討論的各種自動的組織中，共產青年團團員必須加入而成為該組織的成員，積極參加其定期的徵求會員工作，並散佈其宣傳品，此種自動組織概屬政治性質，如國際革命者「互助會」「中國自立

會」(Hands off China)或「航空化學協會」等，此其例也。會員有納費之義務，例如「國際革命者互助會」之主要目的即是籌款。共產青年團團員加入此種團體常認為是一種義務，因為一個集團裏的活動公民，必定不好意思推卻捐款的。雖然應出之捐款時為少數，但是集合起來，為數亦屬可觀。每一個會員至高限度的負擔亦有把它確定的必要。

許多共產青年團的團員，是中學大學或其他教育機關的學童或學生。在這些地方他們必須為模範學生，及負集團中的領導權。因為在兒童運動中的工作關係，共產青年甚至擴大其領導權，到低年級的小學生，在工廠學校中及在新近為青年農民所創設的學校中，所有學生大部分都是共產青年團團員。至在特種蘇維埃黨校裏面，團員得與黨員同享取錄。在一切這些教育機關裏，團員特種領導權的性質，將在討論蘇維埃學校制度的各章中再行討論。

一九二六年，在紅軍裏面，共有十萬個團體。許多人後來必須服軍役。所以兒童與青年人的一種義務是準備為蘇維埃軍事的服役。因此各種能力必予以保存而不可消失，體育的與初步軍事的訓練，亦加以有系統的實施。運動團體與運動場，近幾年來在蘇聯中有值人注意的發展，在這個場合上，大半都由於共產青年團的團體努力的結果。共產青年團的指導，以創造一個所謂蘇維埃式的體育為目的，此種體育在力求競技與運動成為有目的之行爲。在體育界創立相當的風氣，即是共產青年團的職責之一種。直待最近，正式軍事訓練尚未包括在共產青

年團活動裏面。在一九二六年蘇聯國際的關係發生傾軋之時，使蘇維埃軍事準備計劃日進具體與積極。操練，射擊的實習與救護的訓練，在團員的活動上均十分着重。女郎們與少婦們或學習看護或參加操練，得自由選擇。在保障反抗資本主義敵人的運動與示威中，共產青年團本其傳習主張與宗旨必然地是站在前面的。

反宗教宣傳是政治活動形態之一，這種活動，共產青年團的團員，必須對此有所表示。共產青年團裏的團員，一如共產黨裏的黨員應含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於任何宗教儀式參加的禁止，團員不如黨員限得那樣的嚴格；但是共產青年團應為反抗宗教的觀念與信仰而戰，尤其在於他自己的家庭裏面。從先共產青年在反宗教運動上所用的攻擊方法，現為領袖們所禁止了。但是在共產青年團的印刷品與公衆活動上，則時常力主應「推廣科學」以便取消「宗教的成見」。

共產青年團團員欲在各集團中成爲領袖，則必須在其私人的日常生活中，遵守普通一定的規律。當革命時期，會有許多報告，說一般青年的道德日趨敗壞。革命運動的領袖們曾用種種力量來挽救此種頹風，此種頹風不但屬於個人，甚至於整個地方的各集團亦犯着。團員在理論上是不得飲酒、吃煙及性的放佚的，因為這些會空耗青年的精力，此種精力在未來新制度的建設者之責任上在所必需的。共產青年團發出一種小冊子，根據這個革命的實利的觀點，激烈地反對飲酒、吸煙及性的放佚。

共產青年團團員宣稱他們做學童或學生，做工人或做職工會的會員及在其他非黨的羣衆組織裏，均不享

受任何特殊的待遇，並宣稱共產青年如同共產黨員，在理論上只有學習與工作的集團中負有領導者特殊的責任。但是居上凌下與命令式的領導方法在團內甚為顯著。因之領袖們如在黨裏一般，時常發表文字與演說攻擊這種傾向。胡鬧主義在團員間亦甚盛行，在俱樂部裏選舉會裏及在街頭上都可見到。此種胡鬧主義或「流氓行爲」有時或僅是團員之一種，不正確的而尚屬無害的活動方式。但團員參加頑惡青年的集團，來進攻與摧殘女性的事情，使團員間起了一種新運動，攻擊普通所稱的「流氓主義」。

在革命的初期，共產青年團與家庭發生很厲害的衝突。他們在民事務的活動上之勇往直前，致青年人在家裏紐帶的束縛之下脫離出來。又當革命的初期，家庭制度正被許多傑出的領袖們所攻擊，至少在學理方面如此。在這時期中，每個父母對於共產青年團的態度是消極的，尤其在農民家庭裏面，並有許多家庭的慘劇是由與共產青年團裏面的團員起了衝突發生出來。可是現在，父母與青年二方面的態度，在此運動較有建設性影響之下漸成融洽，團員現在爲其領袖勸導儘可能地來避免家庭的危亡；但若一個團員覺到欲保存於家庭氤氳和氣之中已不可能，則在此種環境之下，應勸這青年離開家庭。曾有人所共知的幾個事例，團員遇到父母或家屬有「反革命的」行動時，認爲報告當局是一種應爲之事。雖然他們的領袖沒有直接褒獎這些報告者，而反對者即根據這幾個事例來作概括的結論。階級鬭爭的原則，是共產青年訓練的一種基礎，這原則纔能在理論上解答此種事例呢。

公民活動的責任雖已確定，但是引導全體團員作實際工作的理想尙未實現。關於全體黨員在這方面的統計尙未見到，而在一特殊集團中的情況到時常可以得到報告。在一個工廠中共有八百十四個團員，僅有二百二十四人參加實際工作。這二百二十四人要負擔全部三百四十五件的單獨職務——內中有一百三十九人每人僅有一件職務，五十三人每個負擔兩種工作，二十七人每人有三種任務，其餘五人則每人分得四種不同的實際工作。在另一工廠中，看到八個團員每人擔任六件任務。

一般團員與特別團員負擔事務的繁劇曾爲人所承認。列席各種集會的無聊，或參加示威運動未能收得良果，均足標出興味的低減。團員於是紛紛自動辭職，有些以團員負責太重爲理由，有些是以各種活動不能予他興味爲理由。此種趨勢一部分是由於團員人數的增加太快或組織的容量擴張得太速，但是政策上的錯誤亦是此種傾向的明證。公民活動的負擔於是減少了。較少政治意味的新活動路徑於是產生。「政治訓練」如青年已覺過飽了，不必強予以講解；而在一般文化發展的興味上聽其自然表現。雖然共產黨領袖主張政治運動與文化啓發二者應錯綜而行，但是現在團員在其興味與活動上，得有較自由的選擇。共產黨人自己亦說，近幾年來許多共產青年團的集會專事「政治上的喋喋不休」，以致妨礙青年每天生活很關切要的實際問題的討論。如火如荼的集會與盛大的示威運動，不再如以前幾年能滿足青年的要求。後起青年明白表示出來的需要是教育與有用的實際的訓練。形成胡鬧主義的趨勢，就是表示出共產青年團不能滿足青年的需要，雖然該團有許多活動的範

團來指導團員，實是無補於事的。但是此種運動的領袖們仍堅持說這些劣點是組織發展的徵象，不是衰落的徵象，並修正方案與辦法以適合其現狀。

至於青年人對於社會與政治諸問題稍有漠視則不能予以允許的，祇是對「政治上的喋喋不休」，青年得作反抗而無錯誤，蓋在團的工作中，自來過於僅作政治煽動的事是在言論並予以承認的。政治的工作是應予繼續的，但必須密切聯繫於增進青年的經濟條件，置教育工作於更有組織的基礎上，與提高革命的後進青年文化的水準等切實的任務。再不會有人試其匯集青年多方面的興味於「政治訓練」的一端。在俱樂部與學校裏，在學社的組織裏，得允許少年人發洩其非政治活動的興趣而成立自然科學學社、手琴彈奏社等等。此種學社不是由上級規定，或受限制於固定的名表。實際的活動應受鼓勵，而「活動分子」一詞，不再只適用於坐在辦公室裏寫傳單發指令的團員。茲直接從會議公報中引下一段文字：「如共產青年團轉變其工作，而走上鼓勵青年創造力的自動路線越快，則為新生活及清除酗酒習慣與胡鬧主義而奮鬥之成就越多。」

一九二八年共產青年團全體大會時，不健全的情形存留於青年運動中仍覺很多。在新團員增加的比率上有顯著的減退，並有許多團員自動退出。這類事實曾指為因該國青年反政治態度有發展的傾向。於是發出各種測驗題，以期共產青年對於該團體的活動性質能自表其意見。各答案中有一個表示這青年對於共產青年團僅為政治的集會，而他的興趣則在研究數學。由共產黨人看來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有一個明顯的失敗，就是在青

中發生了宗教的興味與信仰。因為在這次大會上，發現共產青年團此種情形，有幾個發言人鄭重地指出這個普遍的事實：許多共產青年團的新團員，不曾親身經驗到「沙皇資本主義的」（Tsarist-Capitalistic）統治，也不會經過十月革命的烈火與內戰，這是誰都看到的。因此他們不能得到革命的鬪爭與新時代建設工作確當的透視。青年們，甚至於共產青年團團員，僅僅看着「向社會主義路上」過渡時期的矛盾與缺點，因此不能把握住恰當的布爾塞維克態度。他們又解釋說，反動的勢力正極力想籠絡青年的思想。

布哈林在這大會上曾有中肯的演說，他亦重視上面的事實，即以此種事實為根據，主張有着重政治教育之絕對需要。他認為理論的政治的研討，應當與文化及經濟領域的實際工作同一重視，並認為整個的革命程序，必須時常放在青年面前以為青年訓練的要素。他說：假使每天工作對於最後的目標沒有一個有系統的聯繫，則青年對所投效的建設程序不會得到有系統的觀念。所以必須時作完全無缺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宣傳，並對如何達到這目的的門路亦作宣傳，以使每個步驟與各個口號——例如工業合理化——發生充分力量。此等宣傳必須為共產青年團全部工作的樞紐。而其只有這樣，纔會在青年人中啓發一種熱忱。他並說到「能策勵建設努力的憤慨。」

布哈林並詳陳在其共產主義的訓練中及經濟的與文化的改造之日常工作中，應着重階級鬪爭的原則。再則他列舉共產主義的敵人，以便選為青年領袖的這個集團，更能認清他們的共產青年團所負的責任。「公開的

敵人」在其表面上即可看出的，是富農與私人企業家。次之，幾個「隱飾的敵人」則在合法的現存組織與思想的傾斜之形式下存在着。宗教的團體可以說是此種集團之最要者。第三組敵人則在受青年維護的種種民族主義的趨向中見之。舊時代「大俄羅斯國家主義」(Great-Russian Chauvinism)與「烏克蘭民族主義」(Ukrainian Nationalism)再行擡頭，「反閃族」即其表現的一例。布哈林並說及「我們內部的敵人」且指出這種敵人爲官僚主義與酗酒主義。共產青年團在組織裏如有官僚的習氣與行徑，則不能接近民衆，並損失自己、黨及蘇維埃制度的威信。酗酒主義在共產青年間必致弄成「胡鬧主義」或「流氓主義」，此種主義在青年農工中足以隔離許多最優秀的分子。因爲「小資產階級的環境」能釀成這許多不健全之趨勢，故亦必須重伸階級鬪爭的原理，及發展正確的階級意識與執行一切任務之正確的階級態度，以克服此種敵人。

蘇維埃青年運動於其發端時即與國際的運動發生聯繫。十月革命之前夕，青年國際邀請莫斯科青年團體來慶祝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以爲國際青年紀念日。那日莫斯科有數千青年羣衆整隊遊行。青年共產國際成立時，蘇俄代表曾出席在柏林所召集的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這個團體之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於莫斯科，該團體之執行委員會成立總機關於莫斯科，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開始工作。青年共產國際的組織與活動後來再行討論。此地應加注意的，即共產青年團在國際上的立場時加重視。對於他國青年的密接日益發展，俾蘇維埃運動所得較廣博的經驗可供他國之採用。同時對於他國青年的組織之聯繫日益增進，則蘇聯青年可以體驗到青年

工人與青年農民在「資本主義苦厄」下之條件與艱苦，而此種情形共產青年團大多數的團員所未親身經驗到的。

第四章 共產兒童先鋒

在蘇聯普通所稱的「兒童先鋒運動」(Pioneer Movement) 其全銜爲「列寧同志的少年先鋒的兒童共產主義的組織」(The Children's Communist Organization of Young Pioneers in The Name of Comrade Lenin) 在此，我們獲得第三種的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兒童先鋒與共產黨共產青年團相同，是一個政治的組織，代表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之第一個階段。這個在兒童間的共產主義運動要視爲整個革命運動之最重要與最基本的工作之一種。兒童先鋒是蘇維埃制度之一個產物，而亦是蘇維埃制度之一個特點；同時，兒童先鋒運動在蘇維埃公民教育體制裏，是一種最特異的制度。

列寧夫人克露潑斯卡爺在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方面，是一個最積極的工作人員，並特別注意兒童與青年的工作。關於兒童先鋒運動的特性與宗旨，她曾發表過以下的話：

「兒童先鋒運動之及於兒童，正當他個人的人格尙未完成的時候，它增進兒童的社會本能，助其發展公民習慣與社會意識。它以奇異的目標放在兒童面前，此種目標是其所處的時代提給他們的，此目標是全世界工人階級正在奮鬥的。此即是勞動者求解放的目標，亦即是達到無階級區別無壓迫無剝削與全人類生存於

圓滿和愉快的生活之新制度組織的目標。」

兒童先鋒運動雖在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而共產青年團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但是兒童先鋒運動在蘇維埃術詞裏，則稱之為一個「民衆」的組織，以十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兒童為活動之目標。雖然它是羣衆的性質，但階級原則，在此組織的機構裏與活動裏仍是存在的。現在農民的兒童雖佔據了大多數，可是工人階級的兒童是握着領導權；新資產階級的兒童甚至於牧師的兒童，亦可加入兒童先鋒隊 (pioneer brigade) 中。這運動的一個格言就是「後備軍的後備軍」(the reserves of reserves)；兒童先鋒是訓練他們自己以補充共產青年團而共產青年亦訓練他們自己以便繼負共產黨人的工作。所謂「階級性鍛鍊」一項，是此種訓練在共產青年團中所重視的。

在俄國革命以前，小規模的兒童運動業已開始。日俄戰爭後，曾有一個運動叫做「波塔雪耐」(Potashny)，此種運動很明顯地是一種軍事的性質，並在守舊派與國家主義派的分子指揮之下。它是着重於未來軍事服役的訓練，且「波塔雪耐」穿着通常的兵士軍服。此種運動壽命不長，在一九一〇年實際上即已消滅了。

同時歐美的童子軍介紹到俄國來，一部分是反抗「波塔雪耐」運動的。是時正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反動的時期，當局對於此種童子軍以受着自由派主持與推進，微示不滿。至於共產黨人，以最初的「童子軍制」(scoutism) 後來有影響於其自己的兒童運動，承認它有許多積極的特點，例如對於兒童勇敢的鼓勵，合作習慣性的

養成，有創始力，公民的精神與須實踐所指定的目標等。在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又視童子軍以爲資產階級的產物，因爲它注重愛國主義與宗教。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成立之臨時政府，曾給童子軍以充分組織的自由，並甚至積極地予以提創。及至十月革命的時候，此種運動成爲廣大的組織，隊員約有五萬人。工人的兒童加入俄國的童子軍，再沒有其他相似的或相競的組織以供他們參加。雖然，隊員的大部分都來自中層階級，故就共產黨人的立場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之頃，此種童子軍，卽或實情不是如此，也是一種資產階級制度的潛力，在革命的過程中應予以清除的事實上，在布爾塞維克統治前幾個月的衝突與混亂時期，童子軍的組織亦起分化；有一部分會合於布爾塞維克的青年運動，後來成爲共產青年團；另一部分參加反蘇維埃運動，後組織了所謂「白色警護隊」(White Guardists) 是。其中間一大部分，則取一種中立非政治的路線，企圖在內戰期間保存其運動之各種原則。

當革命的初期，對於兒童甚爲注意，一方面是爲了主義的關係，同時亦由於戰爭與革命產生了巨數的無保護與遊蕩兒童。兒童寄養所因此設立。對於基本教育採取了廣大的方針。在初期的學校裏，兒童時常喂以當時主要的食品，以此，此種學校有兒童寄養所許多種的特點。男工人與女工人充作學校裏的職員，在兒童養育所中更多，目的是防止受各教師的影響，因爲有許多教師不同情於十月革命的。級階與共產主義的訓練，以此引用到兒童寄養所裏及學校裏。在這時候，學校的數目大大地增加，且其增加的比率，似允許已屆入學年齡的一切兒童得

早日進入改組過的「統一的勞工學校」中。所以共產黨領袖視爲在兒童的各種機關與學校以外無需乎一種特殊的兒童組織。共產青年團在一九一九年，即正式組織之後一年，提起了分派團員到學校裏與兒童寄養所裏充當兒童政治訓練與活動之特種指導員與教師的問題。但是一個分立的兒童組織尙不曾想到。

際此之時，舊式的童子軍開始復活，單獨的，與任其自生自滅地存在着。在理論上，它是中立的與非政治的。按諸事實，根本是反革命主義的。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它得領導權無疑地是屬於「資產階級」，它誘惑「無產階級」的兒童，使歸其勢力範圍之下，致與共產青年團相頡頏。或者卽此之故，有幾省局部的共產黨人起始其「幼年的共產主義者」(youthful communist)的組織，或如後來所稱的「榮克斯」(Yules)，雖然這種也不過一般的政治活動之一部而已。此種「榮克斯」具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相似的組織，並任其發展，沒有加以指導。此種稍具獨立性的少數地方的共產黨人的活動，雖未擴大。但亦有列次的大會，在大會中童子軍各領袖的較激進分子亦來參加。時人民衛生委員會，在兒童間正轉注意於體育訓練的問題，並與教育委員會同派代表參加於此種大會中。以此得到一種妥協的辦法，「榮克斯」得蒙許可，在「榮克斯」的組織中，尙有許多童子軍制的特點，亦被採用。在戰爭期間存在着的童子軍諸領袖於此新運動得佔有位置；許多童子軍團僅換了名稱卽成爲「榮克斯」。此種運動的理想雖屬模糊不清，而童子軍的法則與訓練則諸多做效。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接受了這個妥協辦法，因爲他們沒有工作人員，可分派到此種爲他們所重視的場合。

但不久後，判定此種妥協辦法是錯誤的。共產青年團決定取消「犛克斯」運動，代以發展青年團體的工作，且以無產階級分子為其成員。加入共產青年團的年齡資格由十六歲減到十四歲。同時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共產青年團代表大會中議決一切運動會與運動團體應加以審查，假使發現到有「反革命」的性質，須予封閉。共產青年團所以特別注意體格的訓練，是由於這個非常時期軍事訓練的需要所招致。一九二〇年間，紅軍人數增加到很大的數目，超過了五百萬以上，此種隨軍事服役的準備而起的發達體格的計劃，就及到參加童子軍的青年們。

一九二一年，新時期來到，纔予兒童工作以新的發展。新經濟政策與其必須採取此種政策的經濟條件，為兒童們創造了新環境。各學校及兒童寄養所的數目大大地減少了。市區的生活條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兒童尤感困難。內戰、飢荒與家庭的破壞致成一大批的孤兒。後來共產黨人恐怕在經濟生活中「資產階級」的原則與方式之復現會影響及於兒童。當資產階級再擡頭的時候，兒童的「思想訓練」(ideological training)已被放至危急關頭。共產黨尤其是共產青年團在他們完善組織的隊伍中反抗新的敵對勢力的影響。共產青年團決定必須同時注意到兒童們，以便保障新環境中共產主義的訓練。

在以先共產青年團原不想發起兒童的羣衆組織，以其本身的力量與財力尚不夠此種組織的計劃。它就開始增強在各學校中與各兒童寄養所中之共產青年團的力量。為的要達到此目的，團員被分派去向兒童演說，為

他們主持討論會，及組織參觀隊演劇等。又引導兒童去慶祝革命紀念節與革命的事蹟；革命正在慶祝勝利與完成呢。「禮拜六作工」是這時期常例之一，用以強化共產黨人的理想與領導權，同時亦應用到兒童方面。體操與競技亦着手舉行。最後，又有各種報紙與各種小冊子爲兒童們而印發。這些活動就是表示此種計劃，在經濟條件與物質來源所允許範圍以內，予以最有效的提創。抵抗新經濟政策的「頹惡的」影響，是其直接的目標，但同時給兒童以積極的政治訓練，尤其是引導兒童以實際政治的活動與階級鬭爭的觀念，亦在此新的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兒童運動之最初的階段中存在着。

在莫斯科兒童間，循着這種路線的工作，慢慢地進展起來了。工作上零碎的研討，在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報紙上可以見到。後來，召集一個莫斯科當地的大會，對於共產青年團稍具同情的童子軍之代表，亦被邀到大會中。會中曾有決議：不論何種運動必以共產青年團爲始創與必在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但是共產青年團亦願採用幾種童子軍的理想與法則，這個會議又決定在工人區域中發起一種獨立的與在學校及兒童寄養所之外的兒童的組織。此種集團的人員叫作「兒童警探」(Young scout)，計有三隊成立起來。

「兒童警探」的章程與綱領，於遲緩與困難中產生出來；且在童子軍與共產青年團二種原則之間又生出另一個妥協的辦法。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組織之間應持嚴密合作的計劃，僅得童子軍左傾的領袖所贊同，而此種兒童的組織，尙不是成爲共產青年團的主要部分呢。再則，此種運動在性質上顯然是屬於政治的，與半黨的，總

之無論如何不會是「非黨」領導權是由共產青年團來承乏。有幾個反對由共產青年團領導此種運動的童子軍領袖欲召集一個獨立的會議。他們被逮捕了，同時這個會議之被禁止，似即為前次的童子軍作最後之清算，亦為反對共產青年團團員與共產黨在蘇聯獨霸兒童組織作最後之清算。不久，新名詞被採用了，用以代替「警探」(scout)之一字，而既成的各集團，從此更名為「兒童先鋒」。

在烏克蘭，當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很明顯的有其不同的地方。在該處的共產黨人於兒童工作中不用童子軍任何的理想與方法。他們對於兒童很機械地轉用了黨的機構與組織之體制，也有細胞辦事處與代表會議等。他們限制其實際活動範圍於各機關裏面，他們的努力終不會在兒童間成為羣衆組織的指導。再則，他們以政治的與一般的大問題為其興趣的中心，對待兒童好似他們對於共產青年團裏的青年甚至於對於黨裏成年的黨員一樣的辦法。一九二二年十月共產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反對烏克蘭的辦法，因為這是通常的兒童所難做到的。在另一方面，該會採取了莫斯科的方案，這方案就是在那時候詳細規定下來的，這個大會議乃作為蘇維埃兒童先鋒運動真正的開始。

一九二三年十月，約有四千個兒童先鋒，至一九二四年年端即增至一萬人。經過開端時不可避免的長期探索和究討及較常態的經濟條件恢復之後，此種運動開始擴大起來。政府當局看到此種運動迅速的高漲與該項工作內容的重要，乃儘量予以物質的幫助。一九二四年共產青年團與共產黨的全體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很長的決

議案，將該項運動的工作扼要舉出，黨對於團允許儘可能地予以幫助，現在，團已負擔正式指導的責任了。一九二五年年端隊員總數超過一百萬數目。此種組織正式的全名亦於是採用了列寧的名字。

一九二五年此種運動的範圍亦趨擴大。此種運動甚至於及到年齡最輕的兒童，年輕到八歲的亦可加入。兒童先鋒在其幼年的弟妹間予以工作的任務，而將他們組成爲「小十月革命兒」(Little Octobrists)的集團，用以紀念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塞維克的革命。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兒童先鋒隊的人數雖有一百八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小十月革命兒」的人數有二十七萬三千九百零九人，總數共有二百一十萬六千五百零六人，而隊員人數增加的比例在一九二五年年尾與一九二六年年端都有些減退。若較諸同時間共產青年團團員的人數則大得多。據一九二六年一月第一次的估計，參加此種運動的兒童之人數，約佔蘇聯裏合於先鋒年齡(十歲至十六歲)全數兒童百分之六〇，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所有隊員組成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隊，約有百分之六十三在於鄉村，在全部隊員中，百分之五十一·一，出自農民的兒童；百分之三十三·四出自工人階級；百分之十五·五出自其他分子，即是包括勞動的知識分子，公務工作人員及新資產階級等。在起始勞動知識分子的成數比較的大；供職於行政機關的共產黨員之兒童先引入此種運動。後則注意工人的兒童。最後兒童先鋒隊亦遵循共產黨人與蘇維埃當局人員在一九二五年所採用的「面向農民」(Face to The Peasants)的格言進行工作。在全數隊員中約有五分之二是女孩，不過女孩的成數在全體人數增加最高的兩年中都稍有減

退。

不少隊員退出的事亦曾有發現。此種事實將與其所表現的弱點同行討論。並認為其組織發展太迅速的一種結果。雖曾決定對於因學校地方不足，致未受到教育之工人農業勞動者與貧農的兒童須加以特別注意，使他們能加入此種組織，但是設計要想將隊員增加的比率取呆板減少的辦法之提議終遭拒絕了。將新隊員限定於一定的範疇——例如共產黨的兒童，或女孩，或農業勞動者的兒童等——的創議，洵失妥當，此一政策實是抵觸兒童先鋒是一個民衆組織的宗旨。

兒童先鋒運動的組織原則，是經過共產青年團的作用，由共產黨作最後的決定。在城市裏每一兒童先鋒隊在可能範圍以內應以一工廠為根據地。一個兒童寄養所或一個工人俱樂部，如要將它作為組織兒童集團的中心區，則僅當其不能用工廠作中心區的時候，因為工廠可受無產階級的影響。但是無論如何，學校或地域的單位，則終未被用。在鄉區因為沒有較好的根據地，則鄉村學校反要用到。在城市鎮裏對於不在學校的兒童，一個學校亦可以為組織的根據地。在此種實例中，可知隊的指導者必須為一個工人，不是學校裏之一個職員。

以此，組織的根據地儘可能地應為一個「生產」的地方，以便生產的原則得以早能引入兒童的生活中。無論如何，先鋒隊總是歸於共產青年團的細胞指導的，團細胞中之一員成為先鋒隊的指導者。許多共產青年團團員完成了他的公民活動的職責，即視為先鋒隊的指導者。共產青年團的地方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中有「兒童

先鋒股」(section on pioneers)，以便監察與指導各隊指導員的工作。以此，先鋒隊的領導權是在一個積極的體格上饒有動力的青年手中，他的生活圓滿，生涯愉悅，而且屬於無產階級的，這是引了一個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運動裏負責的工作人員所說的話。此種領導者雖未經師範的訓練，但確密接兒童的生活。有許多領導人員生經革命種種大事變，已在兒童時體驗到革命進程的意義。即此之故，他們纔能成爲兒童的每一集團中之實際工作的與負責的指導者。

各隊隊員限於從四十至五十，再分爲四「組」或五「組」，每「組」十人。每組亦有一指導者，由其本組內的隊員選出。組的指導員與隊指導員及隊所附屬之共產青年團細胞辦事處之代表成立「隊公會」或隊蘇維埃。每一隊是以革命領袖或團體的名字名之，而各組則以工作的工具或生產的領域名之，例如「鐵鎚」或「木匠」等。隊與組二者均有會議，如各種活動的討論與設計，負責者的選舉，新分子的進入及其他日常的事務等，均由該會解決。此種細小組織單位的採取，用以增進紀律而亦以之增進創造力，同時組織單位的細小，纔能防止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相背道的發展，因爲一切兒童先鋒組織的隊員，如共產青年團裏的團員一樣，必須爲活動的，這是可以置信的，此種組織方式之有收縮性，簡單、經濟、與容易明瞭，實給兒童爲其自身工作，發展自動的組織與表示活動能力之充分機會，但是同時亦必須有持常的與穩固的領導權的準備。

一個「小十月革命兒」集團的成員，則限於二十五人，分成五小組，每小組五人，而每個集團屬於一兒童先

鋒隊組織之下，並由一兒童先鋒隊予以組織。在每個小組中，有一兒童先鋒隊的指導者，而整個「小十月革命兒」集團，又在一個特殊的指導集團指導之下，指導者由兒童先鋒隊組織單位所附屬之共產青年團團細胞揀選出來。「十月革命兒」集團是兒童先鋒隊總體的構成部分。每一小組的成員並選出一個輔導者，與小組裏的兒童先鋒隊指導者及集團裏之共產青年團的指導互相合作。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人的黨齡限制與共產主義訓練團體的年齡限制是遞相疊置的。「小十月革命兒」由八歲到十一歲，兒童先鋒由十歲到十六歲，共產青年團團員由十四歲到二十三歲，而可以入黨的年齡則在十八歲。成了兒童先鋒的「小十月革命兒」在未及十一歲之前，則須仍爲「小十月革命兒」，非到滿了年限不可脫離。同樣的，雖然不是那樣的嚴格，共產青年團團員若不是滿了兒童先鋒的年限，則仍留在兒童先鋒隊中；共產黨員若不是滿了兒童先鋒的年限，則仍留在兒童先鋒隊中；共產黨員若不失了共產青年團團員在年齡上所限的資格，則必然地仍繼續爲活動的團員。如此，在每種組織中，都有其上一級的組織之核心，並有其領導的責任。

在兒童先鋒的指導書中說，此種組織對於勞苦者的兒童是開放的，尤其對於工人及農民的兒童。階級的原則比較不甚着重，然在加入的手續上卻未予以放棄。在實際上甚至更爲寬容，且其所定政策甚至使新資產階級與教士的兒童亦可進入，他們祇要能證明這些兒童亦會做成好的兒童先鋒。此隊員由「組」向隊蘇維埃提出，但必須得隊之全體大會的通過。新隊員加入至少須經過二個月的候補期間，在候補期間中，男孩或女孩必須學

習兒童先鋒的規律與慣例，並須表示他或她是時時遵守的。經過此種試驗——且時常補充以各種規律與慣例正式的試驗——以後，新隊員纔得行兒童先鋒的宣誓，並佩帶徽章與隊員證。隊員如違犯了兒童先鋒的規則與慣例或不服從兒童先鋒的紀律會被開除。

在兒童方面，共產黨人允許佩帶有用的與必需的裝飾標記。但是亦有幾個共產黨人對於此種方法曾表示反對的，不過大多數的見解，以為在外表裝飾上求適兒童的需要是必要的與合法的，即或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但是兒童總是兒童，他們喜歡緞帶並喜歡打扮，這就是立論之點。因此，除了正式加入為隊員的入隊儀式並以「宣誓」為儀式之一以外，特別的徽章，素樸的制服，致敬的禮節與象徵的方法均予以採用。對於兒童的想像力與其智力必須並重，是不可偏廢的。象徵主義須為具有充實內容的革命象徵主義。有一位作者寫道：「兒童先鋒的象徵主義的目的是在激動『對於壓迫者火一般的恨，對於被壓迫者熱烈的愛與同情，以此發展革命的熱忱與精神。』」

兒童先鋒的徽章是一面紅旗，在旗上是蘇維埃的象徵——斧與鐮刀及五塊木頭，燃燒着三道火燄的營火。旗徽上的格言是「時常準備着」。五塊木頭代表地球上的五洲，其意即是兒童先鋒必須時常想着是一個未來國際革命家。三道火燄代表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扼要寫於旗徽上的格言之全文係含有勸解的形式：「要為工人而鬪爭，準備呵！」與其答語「時常準備着。」「小十月革命兒」可不佩徽章，僅有一粒紅星綴於其襯衫之前，

覆蓋着他的心。兒童先鋒除了徽章以外，在頸上繞着一條紅巾，在胸打一個結。在放上之前，紅巾先摺成一個直角三角形；這三角代表三個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即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是。當巾結了時，兒童先鋒即去向着嚴肅的誓約，由此誓約，他或她必須緊守兒童先鋒的規則與慣例及列寧的遺訓。巾的紅色亦足提醒兒童先鋒放在他們面前之方策的爭鬪。在隊時所穿的制服大概係半式運動衣，男的下面着褲，女的穿裙。爲經濟起見，因而儘可能地採用最素樸的制服。在寒冬，制服外自然披以外套，關於此不能復作一律的企圖。每隊的各組各有其旗幟，繡以兒童先鋒的標記及其組名隊名，誓約點綴旗面，遊行與示威時，及參觀與旅行時，此種旗幟必須帶着。

致敬的禮節是舉手，各指緊合着，恰放在額前額上的位置，是一種很愉悅的與優雅的姿態。共產黨人極力否認此種敬禮是同於舊式軍隊的敬禮。五個指頭像營火之五塊木頭，代表五洲緊密結合在一個共同運動之中。把手放在頭上的部位，意爲兒童先鋒應放下他個人意志附屬於該運動之目標。關於象徵的解釋，雖然兒童先鋒隊預備了印刷品予以很詳盡的詮述，其主要意思不過如是而已。

要獲得佩徽章佩領巾與行敬禮的權利，必須於舉行兒童先鋒的「宣誓」之後。國際兒童紀念日時常用作舉行隊員宣誓儀式之時，凡受過特殊訓練而於八月間次學年開始前加入的兒童以此時爲宣誓的一個節期。在莫斯科此種儀式是在紅場「列寧墓」前面舉行，到有蘇維埃高級公務人員。普通此種儀式是舉行於隊全體大會，到有共產青年團的代表，共產黨在可能時亦有代表蒞臨。誓約簡短而精要：

我們是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兒童先鋒，在我的同志們面前，嚴守下列誓約：（1）我要站在工人階級穩固的立場，為全世界工人們農人們求解放而奮鬥；（2）我要忠誠地與恆久地實行「列寧」箴言，即兒童先鋒隊的規則與慣例。

參考列寧的意見，採用了農人所習用的略改祖名的命名慣例。列寧的箴言在兒童先鋒指導書中曾予扼要的敘述，內容如下：

共產黨人全部的任務，是知道如何纔能覺悟一班落後份子，如何纔能工作於這班人裏面，並如何纔不致將他們在這班人方面隔開。

學習工作——這是全部的任務，蘇維埃當局應把它放在人民之前，少尙熱烈的空言，多做每天切實的工作。

我們共和國的命運依最後的分析，是以農民羣衆是否與工人階級站在一道，是否尊重其與工人階級的同盟為斷。

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任務，恰在當今青年的面前了。

假使沒有生產的工作與實際的鬭爭，則從共產黨人的小冊子與宏著所得的共產主義之書本上的知識絕對值不了什麼。

假使你所作的結論以爲做共產黨人可以不必吸納人類智力業已積蓄的成績，則你犯了極大的錯誤。只有在與工人及農民一道的實際工作中，纔能做成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至於「規律」則有五種，而所謂「慣例」亦有五種。各種規律當訓爲所負道德上的責任，以此，兒童先鋒能將其個人生活歸屬該運動宗旨之下，這五種規律是：

- (1) 兒童先鋒應對於工人階級的主張忠實，與對於列寧的箴言忠實。
- (2) 兒童先鋒是共產青年與共產黨人的小兄弟及扶助者。
- (3) 兒童先鋒應把別的兒童組織起來，並與他們在生活上發生聯繫，兒童先鋒是一切兒童們的模範。
- (4) 兒童先鋒應與別的兒童敵愾同仇，且與全世界的工人及農民的兒童敵愾同仇。
- (5) 兒童先鋒應努力於求知識。知識與理解力在爲工人鬪爭上具有甚大的力量。

五種規律外復補益之以五種慣例：

- (1) 兒童先鋒保護其自己之健康與別人之健康，他是忍耐的愉暢的。他侵晨早起並做早操。
- (2) 兒童先鋒愛惜其自己之時間與別人之時間。他做他的工作迅速而敏捷。
- (3) 兒童先鋒是勤奮的與堅忍的，知道在一切與任何條件之下，如何去作正確無誤的工作，並在一切環境之下找出一個辦法。

(4) 兒童先鋒節省民衆的財產，愛護作工地方的書、衣服及器具。

(5) 兒童先鋒不咒罵，不吸煙，不飲酒。

「小十月革命兒」亦有其規律與慣例。他們的規律是：

(1) 「小十月革命兒」應幫助兒童先鋒、共產青年、共產黨人、工人與農民。

(2) 「小十月革命兒」應努力做成兒童先鋒。

他們的慣例爲數亦有二，是同樣簡單的：

(1) 「小十月革命兒」在身體上與衣服上應注意修雅與清潔。

(2) 「小十月革命兒」愛作工。

此種特有的行爲規律是爲兒童而設的，並構成兒童先鋒一種特殊的法典。這些規律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的章程與綱領相當。只因其用在兒童，故對於社會行爲表之以形式，組之以規律，也屬妥當與容許的。

所謂兒童先鋒的工作，得按兒童參加此種運動的活動種數以類別之，一切這些活動的共同宗旨，就是在特殊路線上去訓練兒童。茲從兒童先鋒隊工作內容的一個很好報告辭中看到一個定義，足以反覆說明，在關於此問題的書本中，到處都可以找到的一般公式。

「我們知道兒童的訓練，是爲未來公民活動而準備的。蘇俄兒童未來的公民活動，以及其他一切各國無

產階級兒童未來的公民活動，主要是在於繼續列寧所創始的偉大的鬪爭，反抗一切壓迫者，為全世界勞苦者謀解放，為共產主義的社會謀建設。準備這類人民，即共產主義者，實是對他們作共產主義的訓練。」

先鋒隊的活動每週均有計劃。計劃的決定，由於三個每星期一次的會議，一個是全隊的會議，兩個是組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須作工作報告。此種報告的責任視為十分重要，而且必須一致厲行的。以下規則當為活動之至鵠：一切隊員務使其去做有力量的與有用的工作。在兒童先鋒間，無所謂活動的與不活動的區分；一切隊員必須為活動的。兒童先鋒假手於報告的責任，對於每個組員或隊員行集體管束。彼此互助以履行其義務，我們已知為兒童先鋒規律之一種；而時間、精力與金錢的經濟亦時予重視。此種方法深信其確能發展創造力、自動力、堅忍力、以及對於環境與各種任務之適應力。

先鋒隊的活動有一部分是在於隊裏，而且限於隊裏的。如參加各種活動與各種紀念會，是其例也。每項遊行或紀念會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意義，由共產青年團指導員以簡單辭句報告之。兒童政治的知識以此得獲啓發。隊的集會亦舉行實際問題的討論，此是隊員的隊外各種工作問題，如在兒童寄養所裏、工廠裏、或鄉村裏之各種工作。他如世界及宗教的起源之各大問題，若事實上可以辦到亦時予討論。據說兒童在討論此種大論題，表示出特別敏銳的興味呢。兒童先鋒的規律與慣例時予研討與分析，尤其在於新隊員的加入與不良分子的開除的時候。在一切研討的時候，關於設問與答案的演習時被用到，而且適用的範圍似頗廣泛。參觀與旅行，藉以證實其所

研討的實題，在特種機會裏，非隊員、閑遊者、父母或隊根據地的工廠之工人，都被邀至參加隊的集會。此種大集會固然免不了討論，卻是變為表示（由於報告）其所成就之工作的會了。

兒童先鋒隊組織各隊員的學社，以為學習或手工訓練之用。例如有些學社為研究外國語而設，有些則設於頗小的工場裏之工作學習團。此種小工時予特別的設計，以便供給先鋒隊以簡單器具，得成立辦事處，並供給以小旗標語等。有些學社對於各種工具與機器的研究饒有趣味。但是一切這種隊內的教育工作必須與該隊之社會的與政治的活動發生聯繫；產生的原則，即做社會上有用的事物的原則，亦時加重視。在大城市裏設立兒童先鋒俱樂部，以供各隊的兒童共同享用，學社的工作在此沒有較完善的設備而得規模較大的發展。

每隊應有它的「壁報」，在兒童通訊社指導之下。一切學社都以自動原則來組織，兒童通訊社尤為其最佳者。兒童們可在此了解報紙的一般意義與其自己的兒童先鋒報之特殊的意義。通訊員的制度——此層後當再論——亦廣佈於兒童間；兒童先鋒隊的報紙與雜誌，大部分都是由兒童通訊員投稿。為了指導通訊社起見，一個受過新聞學的理論與實際訓練的共產青年團團員，被派為一個特殊工作的主持者與指導者，這些通訊社視為尤關重要，因為他們建立與他國兒童或在蘇聯裏遙遠部分與不同部分的兒童各種聯繫與互通信札。

在隊的「辦事處」裏，每組各有其「紀念處」，對於該處的設備與整理是其工作之一。各組以其所採用的特殊名稱為「紀念處」裝潢的主要動機。組與組間舉行競賽，以提高此種工作的興味，這種競賽的實際意義，那

在對於太不修飾的各處起較大的吸引力。若組名取自政治與經濟的領域，如我們所見的那樣，則此種活動之目的，又在增進政治的與經濟的各問題之研究。在一個兒童先鋒俱樂部中，「列寧隊」負有裝置「列寧紀念處」之各種肖像、標語、格言及其他所應具有的物件。

附屬於一個兒童先鋒隊的「小十月革命兒」，要使之導入兒童先鋒的活動。但是，需一個醫士或一個教師加以監督。特殊的討論會時為這班年少的兒童召集，他們並將允許參加隊裏的大會及參觀。「小十月革命兒」的活動最多的時間，規定每星期只能從三時至四時。

兒童先鋒在隊外最重要的活動是在學校裏。一個學校的兒童常編入不同的兒童先鋒隊中，全校兒童成立一個「先鋒隊前哨」(pioneer forepost)，此「先鋒隊前哨」為學校行政組織之一部。在蘇聯勞工學校裏的自治體制之探討中，將對此「前哨」的地位，作更詳盡的敘述。以其為前哨的隊員，故該兒童先鋒關於學習方面必須示其他兒童以模範。至於一般學校的活動，其作用多誘諸兒童運動。克露潑斯卡爺這樣寫着「學校協助兒童運動的深入，同時兒童運動是建立學校新模範的要素。」兒童運動於一九二三年由共產黨人提倡，一部分原因是想將他們的公民教育的觀念介紹到學校中。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人民教育委員會密切合作，以規定兒童先鋒在學校中的任務。

發展學校裏一切兒童的社會政治的活動是兒童先鋒的特殊責任。他們在學童所維護的與組織的一切場

合裏，必須爲很活動的分子，兒童先鋒必須勸說與推進別個兒童去研究學問與求得知識。總之，「先鋒隊前哨」是保障共產黨人在學校裏的勢力之核心。兒童先鋒應留心全校之參加遊行，示威運動與革命的紀念會各種事情。他們引導別的學童來做一些簡單工作，這些工作是兒童先鋒爲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及職工會所做的。他們建立學校與工廠間或與其他生產集團間的聯繫。兒童先鋒對於編刊學校的壁報與學校中的學童所成立之學社都是很積極的，每種學社之每一個概有一個隊員在於其中。他們組織演講會、討論會，並設立與配置各種紀念處，尤其是學校裏的「列寧紀念處」。他們爲其自己的運動作宣傳，並爲共產青年團作宣傳。兒童先鋒在學童「自治」方面應爲超羣拔萃的，努力於各種學童委員會領導位置的獲得。他們翼助「進步的」教師，同時攻擊尙在實施的舊式教學方法。最後，他們在其他學童間繼續進行反「宗教偏見」的運動。至於在兒童先鋒運動中之乾脆無神論的，反宗教的成分，當再論於後。

對於每個「前哨」都有一個共產青年團團員與之發生關係，他每星期到學校裏來一次，大概是爲隊員們計劃星期六或星期日的參觀與旅行。這個共產青年的分派如屬可能，應是一個工人。他在許多地方雖常與教師磋商與合作，但是對於學校行政應站在外面與不作干預。以整天不懈負兒童專責的青年領袖，實有很大的影響於兒童的可能。曾有聽到幾個教師對於這些訓練未馴而事本良心的共產青年團領袖的稱揚。在另一方面，關於把兒童託付於此種領袖，是否得計亦有表示疑慮的。兒童先鋒以外的學童亦可加入參觀隊中，此種參觀有一般

教育的，尤其有政治教育的目的。以政治訓練爲目的而參觀之廣大與機變的應用，已經自成一個單獨的問題了。在一般說來，參觀是以引導兒童密接現代生活與時事爲目的。參觀或僅是一種郊遊，其最習常的是參觀博物院，而工廠、農村與兵房亦爲籌劃參觀時所重視。

兒童先鋒在學校裏一切的活動，必不可以成爲有特權的集團，即成爲脫離羣衆的一種派頭。兒童先鋒正與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的情形相似，負有特殊的責任，卻不享有特權。自全體觀之，事實似與理論相符合，在少數零散的實例上，當兒童先鋒之作用的問題，與教師同作研討時，教師的態度總是贊助此種運動的。同一個學校裏的「前哨」的少年領袖作幾次談話後，所得的印象是：兒童先鋒的位置已達到負責的真義，而無傲慢的成分了。

在兒童寄養所裏，兒童先鋒的作用在性質上頗多與在學校裏相同。在兒童寄養所之一個較小的集團裏，會有兒童先鋒較大的比數，因爲是種寄養所，從起始時即集中注意兒童政治的訓練。此處已不是大約十二人組成的前哨，而時常是一整個的兒童先鋒隊。兒童在這些機關裏，普通都是屬於一階級——工人階級。再則，共同的生活，足以助成集體主義的活動，團結的意識，與密切的同志關係的發展。在某一意義上，兒童寄養所的自身，就是共產主義訓練的兒童先鋒之機關；在兒童寄養所中，可以見到兒童先鋒運動特別強固與發展。

至於住家與家庭的生活，兒童先鋒須有積極的作用；兒童先鋒活動之在於家庭集團裏有使命性質的。因爲家庭裏與家庭生活的條件，普通不能與其他例如在學校一般的——場所之革命運動保持同等的發展，故由

兒童先鋒隊而獲得新觀念的兒童，是成爲介紹新原理到家庭裏去之一種主力。最先兒童先鋒應成爲清潔運動的戰員，尤其是空氣新鮮。他或她監督小孩食前的洗手與洗臉。以蘇俄工人農民生活標準的低微，此種家庭的任務實爲重要。再則，遇着家庭有病的時候，兒童先鋒力主去請醫生。若父母給小孩喝酒，兒童先鋒必須反對。

當助母親處理家政的時候，兒童先鋒須談些如 *Circle*，公共洗衣處與公共食堂等制度，此種制度他是由於隊的討論會與參觀時學來的。若父母是不識字的，則助之使讀書與寫字。他又教他的小兄弟與小姊妹讀書，並不時帶他們到兒童先鋒俱樂部去，或引導他們加入「小十月革命兒」運動。兒童先鋒帶新聞報紙與小冊子到家中，以鼓勵按期定閱報紙與購買書籍。兒童先鋒試說其父母捐助各種自動的公民團體。最後兒童勸其父母時常參加革命慶祝會及紀念日。爲發揚此種活動起見，兒童先鋒須於其家內設立一個小小政治紀念處，備有新聞報紙、小冊子、標語及格言等。如屬可能，兒童先鋒應放一個列寧肖像於神像旁邊的壁上，兒童先鋒藉這個辦法，與藉着重革命的紀念日來反抗宗教的節目，以在家庭生活裏應攻擊「宗教的偏見。」

在隊裏的集會上關於一切活動，尤其家庭裏的活動，兒童先鋒應作經常的報告，隊指導員必須熟悉每個隊員的家庭生活，以便予以較好的扶助與忠告。如一個兒童先鋒遇到反抗，尤其遇到一個喝酒的父親之反抗，而需要保護與援助時，此種事件可以提交雇用其父母的機關之工廠委員會。此種手續用以避免引起父母之惡感。在家庭裏及在學校裏，對於兒童體罰的施用，應注重絕對禁止的。俄國鞭撻妻兒的習慣，即是這個法律所由生之背

景，而兒童先鋒則受督促與輔助，以便厲行此種法律。父母們，尤其是農民的父母，曾對此法律訴不平。但從能找到的證據看來，他們在事實上已被逼必須遵守了。在另一方面，兒童先鋒以及共產青年亦受命須承認其對家庭所負的責任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僅當生活在家庭裏確成爲十分難受時，則兒童先鋒得擺脫與拋卻家庭的關係。我們以後隨處可以看到家庭影響正在如何探索與使其作有組織的表現。但對兒童先鋒所希望的，則是藉他們以發展家庭中的新生活。

兒童先鋒隊在隊裏，在學校裏與在家庭裏，所做的工作均有實際社會的與政治的成分。由很實際的工作，引導兒童常常參加其環境的生活，是共產主義訓練的要素。兒童且在其極幼稚的時期即自行準備以作實際參加新制度的建設。所以，兒童先鋒「幫助他們較年長的同志——共產青年與共產黨人。」例如他們幫助裝潢工廠委員會的辦事處。在準備與舉行遊行或紀念會時，他們分散印刷品，並奔走接洽。他們替自己發起自動的團體募捐，並爲此種募捐運動而準備標語。他們分售工人俱樂部的入場券。他們服務於俱樂部的嬰兒寄留處中，因爲女工人蒞臨俱樂部的集會，將她們的小孩寄留在那邊。他幫助工人俱樂部圖書館館員登記，並拿出書籍與雜誌，這些工作固不是單分給兒童先鋒做的，而兒童先鋒必須自告奮勇以任其事。

兒童先鋒應特別參加工廠俱樂部或共產青年團委員會之扶護委員會，或扶護部的工作。此種扶護委員會或扶護部是代表工廠或工人俱樂部擔負幫助特別的鄉村或鄉村的集團之責任。組織參觀隊的作用，或爲分散

印刷品，或爲參加革命紀念日的慶祝會，或僅爲與外界普通的接觸。兒童先鋒隊又去教農民的兒童遊戲，並將城市兒童先鋒隊在組織上與活動上較進步的優點，補益鄉村兒童先鋒隊。城市的兒童先鋒隊對於鄉村的兒童先鋒隊，實已施行了一般的扶護制，此種扶護制之切實的形態，即爲各參加其所屬之工廠的扶護工作，與舉行他們的夏天露營，關於露營方面，後當再論。

這些兒童都帶去參加其年較長的同志之集會及討論，如工廠委員會，或工人俱樂部，或甚至黨或團細胞的集會，以使兒童在實際上能自動幫助其年較長的同志。凡地方上表現一個遊藝會，常爲這些兒童佈置一排座位。這當可回憶到：兒童先鋒隊的根據地是一個工廠或作坊或其他生產中心區，故其所附屬的兒童先鋒隊之加入遊藝會或集會是很自然的。至於年較長的工人，藉允許兒童於會場上詢問各種問題，甚至於允其參加討論，以使這些兒童做成工人階級真正的「家屬」之政策，採到如何程度，洵爲難事作恰當的判斷。工人分宜鼓勵此種聯席會，並利用此種集會對於兒童說明生活行程的經濟原理，合作社的組織，或俱樂部的原理與機構。共產青年團第六次全體代表大會所取的兒童青年團工作方案，對於爲其年較長的同志工作，與同其年較長的同志共同工作之種種活動甚爲重視，其論據則爲他們

「啓發無產階級的意識，輸送兒童以若干確實的知識，俾其得以領悟現在社會生活基本的事實，並給予兒童以評價此種事實的方法，與對於眼前現實的根本事實，養成一種判斷的能力，教導兒童關懷共同目標，

啓發共同的無產階級的全世界休戚相關的精神，鼓舞與發揚其集體主義的創造的才能。」

很多的城市兒童先鋒隊，或於夏季到鄉間去露營，或時去其鄰近的農莊參觀。此種旅行原在使兒童獲得新鮮空氣、運動與休養，而兒童先鋒亦必須做一些有限的公民職務。在按時實行的工作日程中，大約有二時或三時應作社會政治的活動。城市的兒童先鋒在露營時或在參觀時，認識農村的兒童並與之玩耍。他們在父母與兒童間作有利於學校之煽動。他們裝飾鄉村的校舍，或甚至於助其添設幾件簡單的校具。爲要獲得鄉村父老的敬重與好意，他們助之以鄉村間小小的任務。藉與農民兒童組織討論會或談話會，在營裏的兒童先鋒隊能助落後的鄉村之文化發展。革命的概念，農民與工人運動的概念，尤其是農工同盟的概念，亦同時予以提示與解釋。他們必須助農民與工人的同盟，城市集團與鄉村集團的同盟之增強。他們切不可對於文化較低的農民兒童表示自大的態度。

城市兒童先鋒，如其年較長的共產黨人一樣，受到提示：改造農民本性的訓練過程是一個悠久的過程，其常爲最先的與比較簡單的任務則爲識字運動。同時希望來自城裏的兒童先鋒會「與由不懂自然律而產生的成見作鬭爭」，並在此種口號之下，不僅向迷信宣戰，並實行積極作反宗教的宣傳。最後，城市的兒童先鋒隊又須發起與引導農民兒童到城市裏參觀工廠與博物院，或參觀按集體主義之原則實行的鄰近蘇維埃農場。據說此種參觀的意旨，在使城市兒童授予其較覺悟與較不活動的鄉村同伴之新概念，得更切實的了解。

因此，城市對於鄉村的領導，亦可成爲兒童先鋒運動的要旨。種種條件說明此種領導之得體。俄國鄉村的兒童，是著名的不活動的與落後的。我們前已看見兒童先鋒運動是起自城市，但在運動迅速高漲的年頭，在鄉村亦有特異的成就。在農民兒童中，微導之以愉樂與興趣，確是重要不過的。運動伸展到鄉村大衆，對於城市兒童先鋒隊，實予以實際社會的與政治的活動之場所。兒童先鋒在指導與激動鄉村間成年農民與農民兒童的政治思想與活動上，所發生的影響已是很大。

鄉村兒童先鋒隊的活動必須適應鄉村的條件。在某種場合上，因爲鄉村生活的簡單與穩定，此種活動較易組織起來。鄉村兒童先鋒幫助裝飾蘇維埃的房屋、學校與鄉村讀書室。他們如在城市的學校裏一般，必須爲在校內校外的兒童中之活動的分子，並幫助與在兒童某種意義上監督教師。在家中，他們必須攻擊把酒給兒童喝的通行習慣，同時又反對「宗教的鴉片」的應用。他們與其城市的兄弟姐妹們相同，鼓勵定閱報紙，並以政治宣傳爲宗旨，鼓勵各種社團定閱。鄉村兒童先鋒隊循着實際生活的路線，要有其小花園或植物園，組織看養動物競賽會，或設立小工場做農家所要用的簡單物件。他們實行協助其防護疫害或修理不好的道路。由於此種活動，兒童先鋒理應獲得社會的敬仰與維護，並足克服老年保守的農民對此運動之非友誼的態度。

兒童先鋒的活動不是「只有工作沒有玩耍」。遊戲與競技於共產主義的兒童運動上，站在很重要的位置。共產黨人承認在體質訓練上必須有頑耍的成分，他們堅決主張要使競技與遊戲，成爲實用與有利而不傷他們

的興趣是可能的。紀律與團體動作的增進是競技與遊戲之特點，蘇維埃領袖對此當然是歡迎的。但是共產黨人亦注重插入政治的與社會的宗旨，與純粹健身的辦法並重，並試作將特種問題的準備，寓於遊戲中，此種問題為蘇維埃公民後來會碰到的，並試作設立幾種規則，這些規則會適用於新社會制度的。

各種遊戲的內容必須根據環境的配置，並須符合無產階級的理想。假使玩戰爭的遊戲，則必不可為民族與民族間的戰爭，而應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戰爭，或紅軍與白軍的戰爭。在一個兒童先鋒省報裏，其國際兒童日到臨之專號，曾為蘇聯兒童創有一種新遊戲，此種遊戲有些像美國的「捉迷藏」(prisoners base)，但它卻是名之為「踰界獲取革命的羽書」。在另一邊設防謹慎的邊界裏，有一個秘密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是此種遊戲的特徵。

兒童先鋒運動會進行到解決遊蕩兒童的問題。在兒童先鋒隊的進展中，對於有些兒童以其父母出外作工遺置街頭任其遊嬉的，曾予以特別的注意；因為此種兒童是小無賴隊的新補充者，這種小無賴雖有種種方法予以挽救與遏止，但仍有在城市馬路上亂跳的。兒童先鋒急於組織遊戲隊的，或即為此種兒童而非為那些習以為常的小無賴。兒童先鋒必須聯合此種兒童，並助他們玩建設的遊戲，藉以代替僅會引至打架的遊戲。同時這些有無賴潛性的兒童，應以來賓資格邀來參加兒童先鋒隊所召集的公開集會。

兒童先鋒運動有其自己的報紙與書籍。各種報紙與雜誌均由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刊

行。此種報紙，載有關於一般政治經濟各題目的論文，其題旨大概都是根據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報紙信箱。對於「中國的進展」，「英國的罷工」，「波蘭的現狀」或其他世界各大事件均甚注意的。兒童先鋒時聽取黨內討論事項與當今主要政治問題的報告。以此，他們的報紙應引導兒童作現在政治的討論，並注重以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分析其他各國政治的趨勢。報紙上給政治問題尤其是國際的時事所佔的篇幅與注意洵為可觀。兒童運動本身問題的討論，則另佔報紙其他主要的部分。藉兒童通訊員的作用，在此有真正的討論，並在這方面，兒童先鋒的報紙時覺成績斐然。報紙與雜誌，尤其是雜誌，給兒童先鋒隊各種活動路線以切實的提示，新遊戲的介紹，上面已曾說過了。正如蘇維埃與共產黨一切的定期出版物一般，兒童先鋒報紙與雜誌，留出許多空白以披露各種書籍與小冊子。

含有理論與實用二方面性質的書籍與小冊子，均為兒童先鋒而印行，許多書是討論政治的姿態，此種印刷品由中央兒童先鋒處予以分類，並備有介紹書籍的目錄一種，是為兒童先鋒隊自己的圖書館用的，另一種是為共產青年團的隊指導員用的。其饒有奇趣的則為年少兒童先鋒之許多種指導書。茲將各種指導書中之一種予以扼要的敘述。該書的封面冠以如下格言：「要為工人而鬪爭，準備啊！」並在第一頁上，列以別種格言：「第二隊後備軍來替第一隊後備軍調班了！」以俄文表之，則是這三個短字：Smena, Smene, Idyot。這第一頁並由兒童先鋒自己去補空白，把姓名、年齡、隊名、體重、身高填入，並由隊指導員簽字。繼之，則為列寧肖像，並寫有「我們的道

路就是列寧的道路」等字，接以他的傳略。以後纔將列寧的八條箴言寫上。以少數的辭句將其他共產黨領袖，起自馬克斯與恩格斯描寫其特性，並示以其肖像，再則主要的無產階級的週年紀念日與例假節扼要寫上。在「我們的朋友遍世界」的標語之下，略述其他各國共產兒童運動的情形。例如挪威說「現在有五千兒童實行革命的鬪爭。」美國說亦有五千兒童在「兒童先鋒大同盟」中，具有月刊流行到八千分。

指導書中後以短章述「我們的兄弟，共產青年團團員」與「我們的前輩同志，共產黨人。」下一章略述兒童先鋒在軍團裏、學校裏與鄉村裏活動的情形。章程與各種細則的提要，隊裏的標識與敬禮的敘述，以規律、慣例與誓約的全文均被載入。另有一節關於雜記的，附有兒童先鋒的日曆，將各種紀念日舉出，例如列寧的生日與死日，「巴黎公社」五月一日等等。對於兒童通訊員的提示，亦列入其中，又有健身規則與運動規則等。在此節之末尾，略述蘇聯的特質，即組織與人口。另有幾種簡表，將近幾年來關於工業上農業上的生產扼要表出。並有「國際歌」與最普通的各種兒童先鋒歌，例如「少年先鋒歌」的全文。最後幾頁以記錄別的隊員的姓名、住址及應做的與報告的工作，介紹的與已讀的書，以及每時與每日的學校工作時間表。

兒童先鋒運動與共產青年團一樣是全聯邦的組織，經過共產青年團各委員會的作用，二者事實上是互生聯繫。其章程與綱領，對於全蘇聯之各獨立的自主的組織單位均一致適用。民族性的成分僅在方言的應用上，及在地方區域對兒童先鋒的活動方案的研究上，纔注意及之，否則，民族性是隸屬於國際全貌以內的。兒童是共產

主義的兒童先鋒，並不是俄國的兒童先鋒。蘇聯兒童先鋒之參加國際的運動，是非常重視的。例如「國際青年週」利用爲新隊員加入時舉行儀式的機會。與其他各國在共產黨人或左翼社會主義者組織下之兒童通訊，亦是兒童先鋒活動工作之一種。兒童先鋒參加第一次政治運動是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這時候正是德國革命運動進展之時。蘇聯兒童先鋒開始給德國兒童以精神的與物質的幫助，兒童先鋒的集團，通常都參加歡迎從他國來的工作人代表之遊行。

兒童先鋒是蘇維埃兒童的活動分子。當戰爭與革命的期間，在兒童間，尤其在農民兒童間，會有較大的活動，此種事情正是那時俄國所缺少而且切要的。但此種活動的劣點，共產黨人自己亦有看到。對兒童與對青年一樣，一種繁重的公民活動放在兒童的身上。繁多的正式會議及固定的與希望做的各種工作，都使消耗隊裏的時間，弄得兒童的心力兩相交瘁。兒童到隊裏有固定的時間，並視如一種義務，同時當他們在那邊的時候，必須遵從一種慣例的與嚴格的綱紀。以此曾有人提議：集會的形式，在次數上應予減少，隊員之蒞會是由他們願意與當他們願意之時。兒童參加革命紀念會節整隊遊行亦受限制。總之，注重政治問題已予減輕了，因爲兒童顯然爲這些討論弄煩了。在該運動中有一個積極的工作人員，說出他們的訓練方法失敗的事例。有一個十二歲的兒童先鋒，被選出列席於一個工人集會，作激怒的演說，其要旨是「我們工人被剝削得厭倦了。」

負着先鋒隊的責任之共產青年，他所表現的工作，時常不能與分配於他的任務相等。他們已經弄成「命令

式」的習慣，並對於兒童運用其護短的毒素。又可看到兒童先鋒自己，對於其他兒童望其來作領導的，亦趨向到傲慢的表現。客觀的條件增加了指導者的問題。該項運動迅速的進展，使其房屋設備，尤其是指導者，遇着難題。年齡限度從十歲擴大到十六歲，而其活動則不能按年齡大小予以適當的區分與組織。自從一九二六年以來，隊員人數增加的比例似漸漸減小了，而隊員更成爲遊離不定，許多兒童相繼脫離。今者，對於加入此種運動者至少暫予以限制之一切提議，終遭否決了，蓋兒童先鋒應爲一個「羣衆」的組織。同時該項運動的增長是必要的，因爲兒童運動的增長足以表示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在工人農民間的威力之增長，表示工人農民願望付託其兒童之公民教育於共產黨人。

第五章 蘇維埃之定期出版物

革命前俄國的定期刊物，一方面大概是官廳的刊物，另一方面是黨的刊物。有幾種新聞報紙或定期刊物，是由政府的各部處刊行的；另有幾種則常稱爲特殊政治部分之「非官廳的」機關報。凡較重要的政黨都有它的機關報，通常悉以政黨機關報稱之。至在莫斯科所印行之最大新聞報紙，則有其顯著之例外；該報無一定的政治淵源，且內容的記載主要是新聞消息，不大注意社論或政治的探討。以其較諸該國其他的報紙，具有特性與版子大及銷數多，此種莫斯科的報紙，時被稱爲俄國的「美國報」。各種最重要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係在莫斯科與彼得堡二城印行，讀閱者大概是屬於城市的人，與各知識分子，及官吏階級。合作運動的報紙與雜誌，已開始及到工人甚至深入農村，但是一切新聞報紙銷行的總數，在超過一萬七千萬的人口，尚不到三百萬。各種省方的新聞報紙，除了基輔（Kiev）華沙（Warsaw）或敖得薩（Odesa）幾個大城市以外，其刊行大概是規模很小，且無色彩的。

在革命以前，一切出版物受不同程度地檢查。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出版的條件，尤其是各種定期出版物，在刑罰的檢查制度之下，有些地方後較自由。初步的防範的檢查，僅在間接方面仍被用到，且主要的是對於書籍。一

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檢查法復呈嚴格，尤其正當戰爭的第一年，反抗運動高漲的時候。此時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之行到工人與農民方面去的，都嚴加防範，且有許多種被罰款與受防範的檢查法懲治。在軍事檢查掩護之下，最嚴格的總檢查予以厲行。不過，革命以前的出版界，對於政府政策，表示批評的態度是可以的。同時它可以很坦白地討論經濟與社會制度之顯著的弱點。國會設立了一個講演台，得以自由發表意見，在這地方的出版物，得免檢查。但在國會中包括社會民主黨之布爾塞維克派的一切政治派別，都有發言人參加的演說與辯論，檢查當局不許在報紙上發表，此事不過不大多見而已。

出版之絕對的與無限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得以達到。在舊統治崩潰以後，當前幾個月的大混亂時期，即軍事檢查亦停止施行，以前官辦的與半官性質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以失卻維持隨舊統治而消滅，以此，實際上沒有各種政治報紙與新統治站在敵對位置的。在革命時，於民衆間所顯現出來的與負領導位置的新制度——蘇維埃，時常承辦了從前官辦的與半官性質印刷物，同時守舊黨與守舊人物所有新聞報紙印刷機亦同承收，並用此以印刷其自己的機關報。蘇維埃第一種機關報是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屬於彼得格勒的工人與兵士代表的蘇維埃。各社會主義的政黨，亦得到各大印刷所的管理權，有時由於排字工人或管理機器者用簡單手續估領之，故對於出版完全自由，得有實際的便利。當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之間，及各不相同的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相互的鬭爭日益發展的時候，每種特殊的報紙之黨的性質隨之益形顯著。

一九一七年中夏，以革命運動中各黨相互的傾軋，致臨時政府方面，試予言論界以某種的限制。代表溫和社會主義黨與非社會主義黨的克倫斯基政府，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反對繼續戰爭，與主張推翻臨時政府，封閉了好幾個布爾塞維克黨的報紙。但是幾個日裏，這些報紙復行發現，並因為臨時政府的薄弱無能，與工人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採取了直接行動的方法，這些報紙得能繼續刊行。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初期，出版的完全自由實際上是盛行的。再則，各社會主義黨以民衆的名義，在各蘇維埃中亦能得有國內好幾個最大的印刷所，並此使他們在實際上得以利用此種新自由。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差不多立刻引起出版界新條件的產生。蘇維埃政府首先頒佈的命令之一即是出版法，此種出版法實是正式檢查之重立。新統治之收歸國有政策，直進入出版界；工人與農民要得最重要的「生產工具」，以便保障他們所奪取的政權。一切廣告事業歸國家管理，是出版與一切印刷企業國有化的先聲。各種非社會主義的與非布爾塞維克社會主義的報紙，在起初幾個月間得能維持刊行者，由於屢更其名，與屢易其編輯及得黨委員會與私人特種經濟的幫助。但是到一九一八年夏季，一切反對黨的出版工作，與即屬於純粹商業性質的，在蘇維埃政治管轄的區域內，均被禁止活動。其非社會主義與反對社會主義之各黨，正式摒諸法律以外，作為「民衆的仇敵」。這時候共產黨在政治組織的場合裏，已建立合法的特權，且此種特權伸展到出版界裏。同時，蘇維埃政府國有化的計劃迅速進展，對於出版物實際上已完全達到實現，甚至於及到一切印刷物之分散方面。

在革命激烈衝突的時期，共產黨人視統制印刷物是鬭爭最重要的目標，並在此，得以先成其勝利。其淨得的效果是：政治印刷品之國家的或共產黨的壟斷權之建立，對於一般出版界行實際上的壟斷權的國家出版部之組織，與檢查機關之設立。在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之時，出版界之組織雖有若干變化，但在初期的革命鬭爭佔着重要的各種原則，仍視爲現行的「革命原則」。

革命的出版物要特別重視宣傳。當激烈鬭爭的初期，此理尤爲真確。按革命的領袖們之見解，革命仍在繼續進行印刷品的宣傳作用，共產黨人絲毫不肯放鬆。報紙上於純粹消息的記載，雖佔了很大的篇幅，但是對於評述的與理論的探討，依然十分注意。分散的方法視爲革命行程上之要素，而特別加以注意。此種出版物之作用，不僅足以增進革命的熱忱與意識，而且是政治活動之得能具體的與實際的表現之媒介物。在蘇維埃公民訓練之總計劃與大綱中，對出版物有特殊的任務規定出來。在此有幾種新奇的現象發生以應付目前的情況，同時亦爲革命運動之要素。各種「活報」、「壁報」、「與工人農民及紅軍兵士的「通訊員」之饒有興味的制度，均是蘇維埃報紙的特色，且爲一般蘇維埃體制的特色。這些特種的報紙，與由閱讀者經常通訊之有系統的組織，將加以詳細敘述，因爲這些都是以公民訓練爲宗旨的報紙之有意的與直接的利用。各種小冊子與傳單均得廣泛應用，以補報紙雜誌等之不及。上述幾種出版物形式的發展，是由於各種情況所招致，例如不識字的衆多與交通工具的不良，亦有由於他門便於宣傳之故。

蘇聯各種新聞報紙得分爲很確定的範疇，這些範疇可以一一規定出來，首先是蘇維埃機關的出版物或爲每天的與普通的，例如伊里斯維斯太意即「消息報」或爲每週的或爲每月的，例如政府對各部處之較專門的出版物。有幾個人民委員會，亦以新聞報紙形式發行日報或週報，這些報紙都是政府的各部處的機關報紙。這類中最重要的新聞報紙，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消息報。每省的地方執行委員會亦間有其消息報。他類最重要的新聞報紙，則是真理報（Pravda），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行。黨的省委員會或有其地方性的報紙，而亦稱爲真理報的。共產黨採用這個名字以名其機關報，是早在當它僅爲較大的黨組織以內之一個集團的時候，後即保留此名以爲一種商標（俄文義爲真理）。在省城裏時常僅有一種報紙，合蘇維埃與黨二方面而爲一種的。政府機關報與黨部機關報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且黨報總館是在政府裏佔統治地位的黨之機關報。除了黨的真理報以外，還有共產青年團的真理報，由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發行。最後，共產主義者第三種組織，在兒童間之兒童先鋒運動，亦有它的真理報，其形式與編製雖同新聞報紙，但是一種週報。

這些蘇維埃的與黨的機關報，被稱爲蘇維埃體制中之「指導」的報紙。經過這些報紙的指導作用，「共產主義路線」得行於其他一切蘇維埃的或黨的報紙。此種報紙有很大的銷數，只有一個例外，現在得能見到黨的真理報銷數超過六十萬分，多於蘇維埃主要的機關報在莫斯科印行之消息報的銷數。因爲黨在蘇維埃裏所站的位置，則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在事實上是蘇聯裏最重要的政治出版物呢。

第二種大範疇是「羣衆」的新聞報紙，並可按工人與農民二階級再分爲二類。此類新聞報紙同時又是黨的出版物。但是這些報紙不稱爲黨的「機關報」(Organ)而稱爲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的「新聞報紙」(Newspapers)。這類的新聞報紙時附署爲「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行」。這類新聞報紙的名字，通常是表示其所擬定之特殊刊印的門類。這類最重要的標準報，是工人新聞 (Workman Newspaper) 與農民新聞 (Peasant Newspaper) 二種。

莫斯科的工人新聞較黨的指導機關報，篇幅較小，而編法較爲通俗化。對於革命的理論與主義的文章所佔的部分較小，而各項新聞的記載較多。工人通訊員的通信，是刊印於或摘印於此種報中。此種指導的大報之閱讀者，概爲各俱樂部與各委員會一類之各機關中的工人或爲黨員的工人。此種較通俗化的報紙，是以由私人定閱達到工人民衆爲目的。莫斯科的農民新聞亦稱爲「新聞報」，但是每星期纔刊行一次。該報在每個定期出版物中爲銷數最大者，其通訊員的設置收到甚好的成績。通訊員的組織，將於討論「工訊」(Trudkor)與「農訊」(Solkor)中再行細述，這二字是工人通訊員與農民通訊員二字的縮寫。有一種新聞報紙叫做極窮的農民 (Poorest Peasantry)，由莫斯科的真理報館印行，是共產黨人所依託的這部分農民之具地方性的省報。在最重要的省區裏，爲工人與農民而刊行的地方的報紙，與中央的機關報時而頡頏或時而輔翼。莫斯科中央的報紙與省方的報紙的關係現在將予以探討。

職工會所印行的各種新聞報紙，似可包括在指導的報紙與羣衆的報紙二個範疇之內。有一個著作家將這些報紙歸於「職業的」一類，而事實上這些報紙對於自己的一羣閱者之職業的利益確予以注重。我們的新聞報 (Our Newspaper) 係職工會的全聯邦中央蘇維埃在莫斯科印行，就是這機關的機關報，且是這類報紙最重要標準報。教師的新聞報係教育工作人員的職工會之中央機關印行，是另一種職業的報紙。這兩種報紙廣有銷路，並包括一切政治大問題，故對於某種職業團體，能供給一般的消息。

「合作社的」新聞報紙，係合作運動的中央或地方的團體印行，它自己成一範疇。供紅軍兵士閱讀的新聞報紙，係軍事人民委員會設立專門機關編印與發行。莫斯科的紅星 (Red Star) 就是軍隊中最大而最重要的報紙，同時如工人的農民的新聞報紙一樣，對於兵士通訊的披進與利用亦特予注意。

僅有少數的定期出版物不能歸入上述任何範疇。此類的大報顯然是沒有的。莫斯科晚報 (Evening Moscow) 是近似西方各國的一類報紙。此是莫斯科惟一的晚報，而比諸各種晨報紙張為小，共產黨人鄙之為「路畔的報紙」 (Boulevard Sheet) 在政治理論上與消息記載上都不甚重要。再有一種微妙性質的，幽默的週報與月報。這些都是針對政治問題的，並大部分是插畫。最後，所謂「無神」的運動也有它的出版物，其最重要的是一種諷諷畫的與廣告的圖畫週刊，文字很少。供青年與兒童閱讀的印刷品，是一種「羣衆」的印刷品，且與工人的與農民的新聞紙及週刊一樣，也是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印行的。

關於技術與政治各命題之單本與成組小冊子的應用，曾大規模地特別進展於農民中間。由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黨或團的委員會、兒童先隊處、職工會或合作社所刊行的各種小冊子，都可歸入上面關於新聞報紙所指示的幾個大範疇。在各種報紙與書籍剛着手行到的地方，各種小冊子較容易散佈。流行的政治諸問題，均以小冊子的形式予以說明與研討。所以有幾種成組的小冊子，亦是屬於定期刊物之一類，以便廣大羣衆得予消納。

在莫斯科所印行的新聞報紙佔有優勢，前已言及。從前列寧格勒的出版物與莫斯科的出版物本具同等的威權，但是後來因為政治勢力集中於莫斯科，並鎮壓列寧格勒黨組織之反對運動，致形成在列寧格勒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漸漸失卻重要的地位。在蘇聯裏，其獨立組織單位之政府出版物，例如烏克蘭，甚爲着重，以便尊重蘇聯裏其聯邦的特質。在提創小民族文字的應用總政策之下，所謂「民族的出版物」業已發展。許多地方性質的新聞報紙，曾以該地主要民族的文字印行。一九二五年年尾，在蘇聯五百九十七種新聞報紙中發現有一百七十種是以非俄羅斯的文字的。雖然莫斯科的新聞報紙，尤其是真理報視爲蘇維埃黨、職工會或合作社之全聯邦的機關報，具有最大的權力，但是民族的出版物，亦有其自己指導的新聞報紙。

地方的與省方的出版物，在大體上是柔弱的且時爲無色彩的，雖比在革命以前好些。爲的力求地方的新聞報紙質量的提昇，例如有政府所辦的「塔斯」(Tass)電訊社，爲之廣播各種消息。「塔斯」每天約貢獻二千字，由無線電發出，將當日莫斯科各新聞報紙的內容扼要摘出。因爲是政府所特有，故「塔斯」得以無線電供傳

播作用。關於國外消息，由郵件送遞到省方的新聞報紙，亦由「塔斯」予以主持。聯邦裏每個共和國裏消息的輸送，有其自己的通訊社，此種通訊社供給中央指導的機關報以地方的消息。但以地方新聞報紙技術上設備的缺乏，不足以任其調遣，致他們與莫斯科新聞報紙的爭競成爲不可能。莫斯科一切範疇之中央機關報，所以得與地方的報紙爭競者，大半由於其具最大的威權，精良的排印，與最有效地握住敏捷散佈的問題。政治上的顧慮，亦使莫斯科的報紙得從容進展，而地方的出版物則受損失。有些共產黨員竟主張用最積極集中出版事項的政策，以便更明顯地厲行「共產主義的路線。」關於技術上的與政治上的最重要週刊與月刊，都編印與發行於莫斯科或列寧格勒。

不論那類性質的一切出版物均須受檢查。至於各種書籍，須經過初步的檢查，且該出版物在其封面上須標出許可證的號碼，以此，該出版物得以付印與出售。同時又須標出冊數若干，經檢查認可以後得以印行。此種檢查制之所以繼續施行者，其所持的理由，以爲革命的鬪爭，在蘇聯裏與在其他各國裏尚在進展之中，並以爲受內部的檢查可以防備「敵人」階級，使其藉印刷品以爲有力的武器，付之徒然。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予這些敵對勢力以讓步。但是此種讓步是屬於經濟的，並不是有同樣的政治讓步。對於各種定期刊物，檢查權是藉選擇的方式與各編輯及其他館中人員之支配而實施。沒有未經登記過的印刷所得許存在的，並一切印刷機關之出品，須加謹慎的與詳細的查照。在共產黨內，檢查權是藉黨報或其他出版物之編輯部而實施，該部是由高級黨部之選定與

支配的。最近二年來（按係指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反對派的領袖，以黨報報欄受黨檢查不許供彼等之用，曾組織一細小祕密的印刷所。此種破壞黨的紀律是嚴厲處罰該派著名領袖如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主要原因之一種。

一切指導的機關報之編輯都是共產黨人，並由蘇維埃或黨部任命。由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印行的新聞報紙與週報，其編輯人員是由黨所選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黨的支配，保障任命共產黨人爲政府的機關報之編輯。地方的黨報之編輯部，則由該地的黨委員會所選立，但須經過中央委員會核准。羣衆的新聞報紙與技術的出版物，有幾個負責的編輯，得以在黨外的人來充任，因其具有技術上的資格。在此處，正與在他處相同，在舊制度所訓練成的專門家，其引用洵屬必要，直待新專門家養成之時。加之共產黨人亦有在編輯部裏，故這些出版物亦是在共產黨人指導與支配之下的。

在消息報與真理報一類新聞報紙中，由非黨員所投的稿件很少發現。有一個前消息報的編輯說道：假使採取此種辦法，則欲保持這些領導的機關報適當的論調成爲不可能。至在科學或技術性質的定期刊物中，非黨員的投稿是接受的，且有時該刊物內容的大部分充滿這種稿件。非共產黨員的經濟家或教育家，不能發表意見直接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之經濟或教育政策所根據的原則；這是一個例子而已。這些政策實際工作的批評必須限於「機械主義的缺點」之討論以內。以此，在非政治性質的各種出版物——包括技術的與科學

的定期刊物——共產黨人亦有指導力量的運用。關於文字方面，共產黨人得受有與保留超過固定最高額酬金的規定，一部分理由是希望對於出版物能保障與增強一些共產黨人的力量。

一黨壟斷政治的出版物，許多共產黨人承認爲有相當的缺點，例如反對派有用的刺激被其謝絕。在討論此點時曾有人辯護說，國外「資本主義的」世界之出版物支持着這種反對派。蘇聯各新聞報紙之共產主義的編輯者，明顯地很仔細接閱俄羅斯羅政治連亡客所辦的新聞報紙。革命以前俄羅斯之一切政黨，曾於西歐各首都組織有中央委員會或國外代表團，並刊行機關日報與週報。蘇維埃新聞報紙對於這些「僑民」出版物之評述與記載，時予以收集與答覆。

大家公認：蘇維埃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之公辦性質，實予其真正統制的影響與力量。特種法規規定此種統制之如何運用。蘇維埃機關不論爲行政的或經濟的，必須注意報紙上關於它之記載，即或該項記載僅由於一個通訊員的通訊亦不可疏忽，在此種記載中所含的批評必須在同一報紙之報欄裏，予以答覆。最近，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訓令一切國家各工商業大機關：注意並答覆各種出版物上代表蘇維埃公共意見的批評，不必待中央當局再度的訓令，應即對該報紙上置疑各點致函予以答覆與解釋。如要將這種形式上規定的通則之實施的實際情形，予以研究與分析，卻是不可能。莫斯科真理報幾乎每天都有一欄，標題爲「真理報所得的幫助。」在這地方報告從前有人在本欄提出抗議的政策或實施，那些修正了，那些完全廢止了，有幾天標題改爲「真理報尚未

得到幫助，「再在此欄披露反對特殊弊端的申訴。

蘇維埃出版物的公辦性質，義指該出版物不是純為商業性質的。但是編輯的技術問題引起專業的新聞記者發生。同時各編輯的揀選方法及其約束的規定，使他們成為蘇維埃機關的或黨的一種公務員。為要打擊公務的新聞記者集團裏官僚化的傾向，與要利用出版物以為公民訓練之一種工具，出自工人與農民的「通訊員」，因予以錄用與加以組織。同時對於「壁報」正在積極提倡，以為補足與某種意義上以為補救正式印刷的新聞報紙之所不及，並且供給任何人以容易發表其公民活動興趣的機會。個人參加其所屬之機關的「壁報」之編輯與推進，當視為公民活動最先的表徵。

壁報與通訊員在其宗旨上與組織上是密切聯絡的。參與壁報時能表示出與訓練成一個通訊員的活動。「工農訊員」(Rabbelko)——工人農民通訊員——的全聯邦會議，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召集，該會報告經常刊佈的壁報數目全聯邦達到四萬，在這個數目中，約有一半是在於農村裏。通訊員的總數約二十五萬人，其中農民約有十五萬人，工人約有六萬人，紅軍兵士約有四萬人。在一九二八年通訊員的人數，增加到超過三十萬人。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亦起始從其閱讀者來組織通訊員。這些數字，表示羣衆參加新聞界的這兩種形式之廣播，而「工農訊員」運動，堪稱在蘇維埃之下正當發展之一種「勞工的民主主義」(Workers' democracy) 的表現。

壁報在一切現實的蘇維埃制度裏面自成爲一種制度，最少在政治最活動的市區裏是如此。例如一入進一個銀行裏，委員會裏，工廠裏或俱樂部裏即能在其走廊之下或同樣顯著的地方，找到該機關集合的壁報。在鄉村裏壁報亦甚盛行，於鄉蘇維埃辦事處，或鄉讀書室與甚至於鄉村學校中，也會看到這種壁報。有幾個壁報在編排上堪稱精構，即其最遜者在表面上亦修潔而能動人的。有些是以手寫成印體字，但是大多數是用打字機的；用印刷機的則沒有。標題與框格概用彩色；剪選的或原畫的插圖亦時常是着色的。莫斯科農民新聞報發出具彩飾的欄邊的大張報紙，以備人作壁報之用。這大張大部分都由該報編輯部準備好，以便易於黏貼。大的壁報廣有五呎或過於五呎，高有三呎或四呎。其最大的報紙須加懸掛，且尤其笨大得難以閱讀。有時壁報稱爲特殊機關之共產黨之細胞，或共產青年團之細胞之機關報，或一學校之兒童先鋒前哨之機關報。這三級「活動分子」均被望在壁報上能站在主動與領導的地位，時常成爲編輯部的當然參加者。但是，壁報應作爲其全集團的機關報，不是共產黨人，共產青年團團員或兒童先鋒在該集團內各分子之機關報。對共產黨員所期望的領導權的實施問題，及避免對於羣衆實行護短的問題，即在此蘇維埃公民活動的雛形亦是存在的。

壁報不受正式的檢查，但是小地方的共產黨與蘇維埃當局者，對於壁報施行檢查的事例則時有之。此種事情受了禁止，且似有漸漸減少的情形，雖然現在尚有壁報題着「查訖」之事例的。壁報報欄的投稿者，得享有完全的自由與受黨完全的保護，但是報紙又載稱投稿者，有被發現或至少被懷疑行使這種自由而被機關解雇的

事例。這些事例會予公揭明佈，以爲力防此種事情之效尤的一部分工作，蓋此種事例洵足減低壁報之效能。在這些平凡的報紙中，亦足以見出蘇維埃各實驗制度實際工作之原委。由於這些報紙的評論，負責的領袖們得定下他們「蘇維埃機關合理化」的計劃。

壁報在其批評上是非常坦白的。有時它是所批評的機關一般精神之所在。各個人將予以指名，而他們的態度或行爲將予以探討；書記則將攻訐其裝假病，主任或各部處之主腦則將攻訐其凌弱或錯誤。所以共產黨人主張不僅允許而予以鼓勵的自我批評之自由，得在這些被雇用且在內部工作的人員，對於一個機關日常工作之不受檢查與不需簽署的批評中，予以極充分的實現。要防壁報不致於成爲暴露私人的憤懣與發洩個人的怨恨，則是編輯部的責任。編輯同時應受忠告，不可在壁報中關出一定地方，作一般政治的討論以代替印刷的報紙。壁報所涉的範圍是其所代表的機關與團體的生活與工作。凡特殊集團參加到各種大活動如扶護運動或政治慶祝會等，則由壁報予以討論與若干的指導。所以這種壁報的制度之政治作用亦是很大的。黨人與團員的參加決定了應予遵循的政治路線。此種事實是自由批評的限制，務須注意。

此種壁報笨大的紙張，拿動雖甚困難，但是夾訂成帙普通仍予以保存的。有一個新聞報近來組織一種壁報展覽會，用以對此饒有趣味的報紙作詳細分析的標準。縮小珍本編印出來，以對壁報的編輯與裝飾的技術問題作實際的提示。共產黨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甚至於兒童先鋒，在其固定責任上負有維持與推進壁報的義務，

學校的教師，尤其在鄉村以內，受令幫助其當地的編輯部以此種工作。代表農業人民委員會的地方農業專門家，同樣地受命與這個密接的與宣傳的重要工具合作，且應用此種工具於其工作之中。壁報在廣大羣衆閱讀報紙剛剛開始的地方，實是一種報告消息之重要工具。壁報不僅爲代替通常印行的報紙，它並提創與表現公民活動。壁報之饒有興味與輝煌揚麗，外來參觀者對之當一目了然，此種人的注意時常爲該制度活動方面所喚起。壁報最大的功用有在於能鼓勵與訓練寫作一端。學文學的學生正轉移其注意於這方面，並說壁報正產生許多表現其真文學天才的作家呢。壁報常置人員的平均數從五個到十個。上面所估計的四萬種壁報，通常每二星期發現一次，是巨數作家大衆之一個簡單的公民活動的方式。

爲分散於小集團中用的以複寫版印成的報紙，也有刊行，不過爲數不多。若着手進行此種事情，該集團則設立一出版部，不過其負責的編輯是由黨細胞任命的。以此，這種出版物也受相當的檢查；因爲複寫的報紙有似通常印刷的新聞報紙，不比那些壁報，則對於這種報紙規定統制方法尙屬妥當。

工人通訊員與農民通訊員的制度，齊諾維夫在該運動一個全體會議上釋爲「實踐的列寧主義」(Practical Leninism)。這種制度實是革命的產物，它大概是自然生長的，雖然早到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派已發展其自己的報紙，列寧主張應努力使工人實際參加於黨的新聞報紙方面。另一領袖在描寫特別注意鄉村通訊員的提創與利用的首要農民新聞報紙之成績時，對該報紙的閱讀者述稱他們是「在人類史上初次以

其自己的手來設立自己的報紙的勞工們。」通訊員制度之開始提創與組織，初由於中央黨報真理報的編輯機關。在一九二三年，此種運動纔真正具活動的與有組織的性質。及一九二五年，這些通訊社曾成立有一千個以上，而以合作與自己訓練爲目的。

通訊員的組織是以編輯人員爲中心與由於編輯的人員來組織，尤其是在於民衆新聞報紙方面。在鄉區，學校的教師與醫生可作通訊員，但是大部分是工人與農民。且厲行階級的原則，富農不可以作通訊員。並特別努力要鼓勵貧農來作通訊員。這些通訊員不受報館的正式任命，即稱他們爲代表該報的卡片亦所不受。此點之被重視，以示這些通訊員在其原來的社團中，不致再有別種的「權威」，而仍以原社團的代表資格與其他各機關來往，其與報館來往也是一樣的。通訊員對於蘇維埃機關，黨與報館，都要成爲「敏銳的試探者」(Pulse-takers)。全體通訊員之半數大約是黨員或團員。雖然黨員與團員受命須幫助與促進此種運動，同時他們又受命不可把通訊員隸屬其地方的組織。地方通訊員集團之活動中心當爲地方的壁報，但是又主張該運動所具組織的性質，祇能是繞着另一新聞報紙的編輯機關以爲中心。黨的力量設施必須爲因地適宜的方法，不能有任何行政上的壓力，且各通訊員成爲黨員與非黨員羣衆之間另一種聯繫的方式，共產黨人利用這種聯繫來左右與引導非黨員羣衆之活動分子。

「工農通訊員」運動，在加重個人工作負擔的鬪爭的大氣壓之下業已發展，有許多農民通訊員，曾發現了他

們的活動惹起身體上的危險。一九二六年在革命藝術家聯合會的展覽會中，有一張畫名為新戰線，引起特殊的注意。該畫表示一個中等農家，他的家主死於地板上，他的寫作的材料零散着。當子彈正從窗口射入時，這個農民的通訊員正從事於預備他的報告。當一九二五年間，曾有二十四個農民通訊員遭暗殺，有十件截擊未遂。報紙對於此種事件十分注意，且是年在各種付諸審判的案件中，農民通訊員的兇殺案成爲一種。當截擊通訊員在幾個地方幾成爲流行病時，司法人民委員會通令其檢察機關，凡此種一切的截擊當歸入反革命行爲一類，在刑法條文之下應處死刑。通訊員遭遇着二個敵對的集團。因爲暴露了地方蘇維埃當局與黨部工作人員腐敗與專斷的事實，這班通訊員成爲這些分子截擊的對象，而這些分子黨方向未予以廓清的。通訊員又要報告其敵對之富農分子，尤其是當他們在合作社中，甚至於地方蘇維埃裏，得能獲到立足地時，於是便有報復的事情。

共產主義者的敵人，解釋此種對鄉村通訊員的截擊是整個農民的抗議，他們視通訊員，以爲一種很好險的新權威的代表，扮演其偵探的伎倆。通訊員所表的特性，據共產黨人自己所給予解釋的根據，以爲是蘇維埃政府的「眼線」(Eye)他們以爲通訊員的功用主要是偵探與報告的功用。黨的監察委員會與工業監察委員會廣泛地利用通訊員以報告當地的情形，且此種慣例使通訊員是偵探的意見益加明顯。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通訊員的地位較少危險，但是，即屬現在，幾處地方，地方的通訊員覺得公開工作洵非妥策，乃小心翼翼地隱藏其活動的事實。他的通訊不簽名，且報紙欄內與他通信是用暗碼。但是農民通訊員日見其承認對於某一新聞報紙的關

保；他們的主任編輯要求如在公開工作可能的地方，應公開工作。一九二六年秋間，在一個鄉村社會裏，有一個記者得以悉心研究，而鄉村通訊員仍是「在掩飾之下」來工作。所以要與該運動真正的代表談話是不可能的；同時，若試作恰當推斷，在社會裏那種成分，以致通信員必須隱飾其表裏一致，亦似乎無濟於事的。通訊員現受報紙的編輯之勸告，他們在寫稿時少注重於暴露個人的弊端，而關於制度上之功用之積極的提議，應多注重。此種勸告或可以希為減少通訊員之必遇的危險吧。

通訊員時常召集會議的習例正具組織化。在莫斯科，工人通訊員按例召集晚上討論會。一九二六年五月，該運動第三次全聯邦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真理報與其特種雜誌工人通訊創導之下，召集起來。這些集會稱之為「代表會議」(conferences)，不是「代表大會」(congresses)，因為他們沒有強迫的威權，而僅有磋商與報告。同時此種會議的參加者，黨員沒有高於非黨員的權力。這些會議之慎重限制的性質，是按已揭示的政治路線，要使通訊員運動不致變成太機關化與附從於黨。

為通訊人員而編的特種刊物，由各報刊行，這些報紙對於推進此種運動是最積極的。此種定期刊物大概有二十種，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真理報的工人通訊與莫斯科農民新聞報的編輯機關所印行的鄉村通訊。這些刊物列論一般的政治大問題，作為各通訊員的指導，但是對於該運動的理想與原則特予着重，並在工作方式上，予以實際的提示。再則，一般的通訊之特種指導，亦刊出以為通訊員的應用。這些刊物與指導書，與其代表會議一樣，以

給通訊員特種訓練爲目的，視這些通訊員爲一種已表現出具體的公民意識之集團，各通訊員研究組的設立，是以工廠委員裏或工人俱樂部裏的壁報爲中心，這是僅述其較重要的幾個地方，而其主要目的在於訓練其社員以成爲公民的通訊員，論出版事項之歷史與組織的教本，曾備以爲此等研究組之用。更專門的共產主義的訓練，則得之進入「政治訓練班」一類學校，或做馬克斯——列寧學校的社員。在這些學校裏，通訊員不可以分成爲一個特殊的有特權的集團。這是希望該運動會，有裨於蘇聯出版界職業新聞記者人材的養成。要加入最高共產主義教育機關，以養成新聞界之黨工作人員，則得有活動的通訊員的證明之工人或農民較爲容易。

大號的農民新聞報在莫斯科由黨部印行，在握住地方之廣大通訊員上，特著成績。據說銷數超過一百萬，這個週報具新聞報紙同樣編排，銷行遍於全蘇聯。在作者訪問過與查考過的鄉區裏，此種莫斯科機關報，比諸農民所刊行之地方的新聞報紙，流行更廣。據編輯員的報告，每月約有五萬封信從其農民通訊員間接到。這個大量的材料分發於十個編輯來整理，他們除了審閱及類次由農民所寄的信件外，沒有其他的責任；前充省報的編輯時被選來擔任此種工作。因爲他們熟悉鄉村間的情形，每件收到的信都承認有效。從農民所發的通信函件，有許多是屬於個人訴不平的，該信件乃轉遞於訴不平者，所屬之裁判機關。假使該信件是討論一般的情形，與表示作者方面自覺的「社會的」態度，則該信件的作者，受邀爲一位通訊員。送給他通訊員的工作與責任的說明書。以此經常通信人員的幹部得以造成；在一九二六年有五千人以上農民不時送發通訊稿件，並編入地方的通信學社。

特別完善的信，表示出公民意識之最高度，與把握到農民生活主要問題，乃選出登載於新聞報紙上。此種材料若被採用，則該通信員以固定篇幅的比率而受酬金；平常支付大概從三盧布至五盧布，這個數目在俄國的農民看來已是不少了。其不合於發表的信件，則用作標準的論文材料，而原稿作者也受報酬。在審閱程序上，各種信件均按題旨仔細加以類別，一月凡一次從這些信件中，將農民的「意見」提綱歸納起來，並送給政府各部處與黨部，此種按月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而僅為行政上的目的。曾有一種批評，以為這樣運用通信稿，使報館變成另一政府的團體，而非公共意見的喉舌。這些信件作各種利用以後，則予以編次，以為特種研究及未來查考之用。這些信稿多多益善，據說當時編訂成帙的冊子含有一百五十萬以上信件。

雖然活報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的文化與政治活動的題目下論之較為妥當，但是此處亦必予提及。這些機關的各方面團體，在叫做「藍衫團」的專門家團體指導之下，按當時流行的題目，表演諷刺戲文，混合音樂、舞蹈、演劇與一種體操技術的表演等。雖其佈景與服裝力主簡樸，以求排演的便利，但是在該運動裏的專門職業家，時被人批評為傾向於「資產階級消閑」(bourgeois cabaret)的方法。「藍衫團」的諷刺戲文雖受檢查，但其描寫實際情形是很諷刺的，且時常調笑革命的根本原則。他們馴致將革命初期的口號作笑話。「活報」所應具的開玩笑部分，對政策與實施時常作可驚異地直率的批評。青年工人、工士與農民的串演集團所表演的「活報晚會」，是由於該運動的專家分子所激引，且有時為其所訓練。這些串演的表演者，缺乏「藍衫團」所能做

到之雍容的優美與藝術，此種表演之不雅馴，足以減低效能，且有時弄到所希望者適成相反的印像，致招共產黨領袖的抗議。但是活報是公民教育最有力量的工具，尤其是在農民裏，該處讀物仍是有限，而戲劇的意識則加強發展。此種表演有傾向到刻板化的趨勢，而如一個批評家說：要成了一種雜誌不成一種報紙了。其題材變為普及的，而非當日切近的時事。理想上，地方串演集團每星期須有二種或三種不同的表演，使活報在事實上成爲煽動與宣傳的有力武器。參加表演者，於表演的準備中須有特種的政治教育，這當認爲是該報制度之重要形態。同時由活報裏，在革命初期不能看見的幽默意義，得以自己表現出來。

新聞報紙分散的方法，曾予以特別的注意；且關於銷行問題，具饒有興味的試驗。在革命的初期，當新理想須作極廣大宣傳，與共產主義的原則正當更予廣泛應用的時候，印刷物的分散成爲國家服務之一種。在那時，一切印刷物由政府或黨部各機關印行，完全沒有商業的成分。當時正屆設立的新機關與團體，接受新聞報紙與其他印刷品須視爲例行的事。付價一項在機關與機關之間，僅以貸與負方存記。乃以紙張的缺少與印刷器具的窮乏，致產額減少，不能達到此種方法所屬望的廣大分散的標準點。另一種理由使在分散上遭受初次試驗之失敗的，則爲政府各機關證明其不是善於分散者。各種印刷品積堆於蘇維埃或其他團體之金字塔結構之上層，而不能及到下層或以此不能再進展到廣大的羣衆。

新聞報紙與出版物的活動，隨着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在大體上被放在商業的基礎上。此卽是付定閱費原則

之重立。在現時，中央各大報正在商業的基礎上進行，由定閱費來維持；雖然這些報紙因是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能享不少的特權。有許多機關必須備有此種報紙，視此為當然之事。廣告事業重新採用，大抵是登國有化企業的廣告，這是各報館收入之最重要的來源。省報在經費上所處的情形較壞，而大多數地方的新聞報紙，概受地方蘇維埃機關或黨部的津貼。與各個人相對的是各機關，他們是各報的大多數定閱者。再則有所謂「集體定閱」制，此制是一羣人定閱一分，有時每個分子各定閱一分。在此集體定閱中，無疑地是含有強迫的成分；集體定閱是在公開集會中提出與表決。但是個人定閱現正予以優待；蘇維埃與黨的工作人員，在出版界裏所得的結論是：個人定閱畢竟是分散最效力的方法。

因為採用個人定閱的政策，新聞報紙的銷數業已迅速的增加，且已因此使定閱的價格得到相當的減低。據蘇維埃統計上之所示，新聞報紙的數目，在革命以前於印行八百種中，總銷數約有三百萬分。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有新新聞報紙五百十七種，內有幾種是週報性質的，銷行數有三百七十六萬九千一百七十分。一九二五年八月，新聞報紙數目增加到五百九十五種，而銷數幾有倍之，達到七百二十八萬四千二百四十九分，當這短期間中，農民的、共產青年的、紅軍的各種新聞報紙的發達，是總銷數增加的最大來源，雖然中央指導的機關報的銷數亦有很顯著的增加。現在，日報與至少每週出版一次的新聞報紙總銷數，據一般估計，超過八百萬分。工人俱樂部、圖書館、市鎮讀書室、鄉村讀書室及蘇維埃與黨的各機關，仍為大多數的工農閱讀各種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以及各

種小冊子各種書籍的中心，但新聞報紙又正起手在個人家庭裏面找出路。據云莫斯科的工人過半數都各定閱一種報紙。十個或十個以上的家庭共同定閱的辦法，在農民社會裏仍屬有用的。

在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各學社中，「新聞報紙友誼會」或「圖書館友誼會」是非正式的懇求定閱者。因為這些學社是政治教育的園地，希望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團員能在此主動與領導。兒童先鋒之一種公民職責是在其家庭中，在一般工人中，與特別在鄉村裏，來推進新聞報紙的銷行。自動的公民團體，例如「打倒文盲協會」甚至於如「國際革命家互濟會」是印刷品間接的宣傳機關，他們自己也有印刷品與宣傳品。蘇維埃與黨的團體對於定購有簡便的辦法。個人受委託的要求定購辦法亦在應用。在大城市裏，販報兒童與新聞報紙零賣處，零賣各種重要報紙及其他許多種週報與月報，而城市裏的許多看報者，以此按日購買報紙，這在定閱的遞送費上可以稍省一些。

以其各種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毫無例外地是由於蘇維埃或黨各機關印行或在其指導之下，所以彼此之間少有競爭。每種出版物預先在心裏定有其特種閱讀者的集團或有其特殊的地盤。在共產黨人支配與領導及蘇維埃檢查之下，一切出版物必須遵從同一的政治路線，國家出版部在普通出版界裏（定期刊物的出版亦包括在內）所得的領導地位，是蘇維埃體制另一種的特徵。此種連絡使銷行問題得能簡單化。含一切定期刊物之名稱與內容的公報是由國家出版部印發，在新聞報紙上與雜誌上之出版物的廣告，亦能助讀者以選擇最適合

其特殊興味之報紙與雜誌。共產黨以其特種出版部介紹每一類讀者以特殊的出版物。此種介紹在黨員方面似乎等諸於正式的訓令，在理論上每個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必須閱讀新聞報紙。兒童先鋒亦望其成爲閱讀者，且我們已看到爲兒童而編的特種刊物業已發展。這三個黨的集團在其各自的集羣與「集體」中，對於非黨員民衆應示模範與指導，同時羣衆新聞報紙之閱讀，正無疑地迅速發展起來。此種進步一部分是歸諸所採的分散事項之特種方法。

各種小冊子與傳單，歸於定期出版物一類中較諸歸於書籍中爲妥，在報紙零賣處中與書店中均有零賣。一種小冊子的大部分是分散於各俱樂部或各讀書室的書桌上。電影院的前廳是觀衆在此等候下次開演的，時常備有讀書室。但是閱讀者選擇他們的小冊子，是在小舖子及較大書舖的陳列架框上與櫃檯上。報紙零賣處不但在街上的側隅可以找到，即在一切機關，各種人民委員會，人民法庭及戲臺前廳的走廊裏亦可找到，書店開設於大城市裏，於一切省分的市鎮裏，與甚至於農村裏之一切區處。鐵路小站之報紙零售處通常亦是該地的書店。

書店與報紙零賣處大部分是政府各部處，黨或其他團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公開的分散代理處。私人的書籍銷售所不在此列，假使將分列於各都市與大城市之道旁與空地的書攤不算在內的話；這些私人書籍銷售所大都是經售革命以前出版的書籍。蘇維埃出版物之非賣品，亦在書市場中由小販們發賣。國家出版部的書店值得特別提出來說。這些書店的招牌與房子的外表都是一致，可於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到處找到。這些書店頗能引

人注意，而櫃檯內部的陳列能誘人進入，並使其徘徊而不忍去。新書與小冊子陳列於櫃檯之上，以使人們容易審閱。掌櫃的不懇求客人購買，雖然這是國家管理之缺點的特徵。書籍與小冊子陳列的方式是一好廣告，並在這些書店中，時常看到許多人在審閱與甚至誦讀新的出版物呢。

共產黨人並不隱諱其以出版物爲宣傳及煽動之工具的政策。新聞報紙日復一日的碰撞着每天與味的事情，故被視爲比諸書籍與小冊子更有效力。閱者鮮覺其容籌詳計的心力以創造某種「思想的」環境，這種環境的創造是共產黨人坦白地把它作他們的任務的。新聞報紙在由一集團明晰計劃支配之下，能藉鼓動，藉以下擊中民衆與味所在之這問題，另一下則擊中其與味所在之那問題而起作用。如此藉每天與持續的宣傳，特種的活動形式得以增進。在共產黨人的支配之下，全部出版物着重一個論點與一切歸於獨一無二的解釋是可能的。指導的機關報逐日給出有權威的解釋，等於給黨員以訓令，得以輔助與厲行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或黨的中央機關發出定期正式的訓令。黨的委員會爲工農所印行的新聞報紙，使此等訓令得以普及於大眾。

再則在積極階級鬭爭的時期，新聞報紙在性質上原視爲政治的；按共產黨人主張，非政治的出版物不能存在。這不是說，按共產黨人的觀念，新聞報紙不能同時作爲記載消息的。這是說：通知消息是宣傳、鼓勵及政治活動的基礎。由於記載消息，得引起閱者注意。但是，蘇聯各報紙的一切消息，必須「通過共產黨人的析光鏡。」一個會做莫斯科消息報的負責編輯者，在其編蘇聯報紙編輯之職務的小冊子中，說道：一隻狗被街上一輛車撞死的事

實，可作「君主專制的」描寫亦可作「無產階級的」描寫。以此之故，國內外的各種消息與新聞，不僅予以選擇，而且應完全合於共產主義宣傳與訓練的宗旨之用。這就是時常固守着「共產主義的路線」，「列寧主義的原則」或「馬克斯的解釋」，以為編輯政策及一切報紙新聞部分之基礎的意義。

雖然，這可以斷言，共產黨的支配、檢查，與蘇聯各機關出版物之擴大活動，保障工人與農民獲得為其自身利益而組織與應用的出版物。再則，工人與農民得藉通訊以獲實際參加所印行的發表公共意見的機關報之機會。由於特種訓練的組織，使這種參加收得實效，通訊員學社與壁報等就是這些特種訓練的例子，這是加重說明的，保全出版界之影響力，對於勞苦羣衆的參加具有真正意義。從公民教育的觀點上，通訊員的組織，壁報之廣為應用，與所謂「活報」的設置，其所代表類異的與有興趣的特點，一部分是由於俄羅斯特種情境所招致，一部分則是革命之一種產品。一切新聞報紙之公家性質，使各編輯身上負了一種特殊的責任。這堪致信的，此種責任足以促進坦白的自我批評，這種的自我批評實是在出版物上所作的各種討論之特質，且表現於各種弊端之經常揭發與各種失敗的認受。另一方面，在蘇維埃與黨的各報上所揚溢着之公然樂觀主義，實足對許多共產黨人提示公家報紙之弱點。

第六章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與其蘇維埃的政府形式，素為革命最重要制度的產物。由於這種蘇維埃政治的機構，發展為所謂「蘇維埃民主政權」。蘇維埃的政府形式之一種顯著的功績，依據其創造的與維護的人們說法，是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化為至低限度，雖事實上此種政府形式，同時能給予很切實的與有力的政府威權。在另一方面，反對在蘇維埃體制下的官僚習氣與官僚方式的鬭爭，是蘇聯近幾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之一，並仍為未來若干時應繼續進行與警誡的事項。列寧曾有一次說，剷除在蘇維埃裏的所謂「官僚主義」需要一世代的期間。用以打擊官僚主義與強化蘇維埃民主政權的方法，是本諸更自覺的與積極的公民精神，要設法使這種公民精神發生實際的效力，據說，選舉的原則與蘇維埃政府的立法行政與司法各種機關的機構，亦足以使公民對此發生與表示積極的興趣。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在這方面有一種領導權，這領導權在許多點上是蘇維埃體制所特有的。稍具顯異的各機關制度業見發展，以構成蘇維埃民主政權的器械之要素了。

一切蘇維埃制度是以階級原則為根據，因為蘇維埃原以階級制度而起的。蘇維埃的雛形是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這第一個蘇維埃當一九〇五年十月大罷工時，尚不失為一個都城工

廠工人代表的集會。它擅有此種廣大力量，在其時竟能表示出建立馬克斯綱領的「無產階級獨裁」的努力。在別處城市與工業中心區，雖有相似的團體成立，但是未曾達到聖彼得堡蘇維埃的優勢與權力。雖然「蘇維埃」一字，通常是用以名一切屬性的會議，自這時候以後，則應用於俄羅斯社會黨人間，義為革命工人的會議。是以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局面再行開展的時候，蘇維埃的觀念立即復現。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革命的情況中，都城兵士與工人的組織同成為可能。「聖彼得堡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躍然而為革命第一階段的指導勢力之一種了。

一九一七年夏間，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與擴大」，工人兵士的蘇維埃擴張到一切城市中心區。在前線的軍隊裏，亦組織了蘇維埃。各委員會與各會議雖在一切機關裏面與為一切宗旨方面成立起來，但是「蘇維埃」之字，則限用於工人與兵士的會議。當革命的幾個月間，農民的組織比較地是欠明確與鮮然一致的，但是嚴格的各農民代表大會與該時期的委員會，是與各蘇維埃合作的，並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六月之間，由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立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得派有代表。屆於二月革命與十月布爾塞維克革命之時期的蘇維埃，監視臨時政府的「警犬」。他們之言與行，以「革命的民主政權」為名義，自稱為代表工人與農民的。

或認為這時期蘇維埃大多數的領袖是非布爾塞維克社會主義者，他們企圖在以普通與平等的參政權召集國民會議時，撤消這種蘇維埃制度的政治活動。一九一七年夏季，各蘇維埃並代表工人及一些農民的經濟利

益。所以該計劃似爲在職掌一切政治權力之國民會議召集以後，各蘇維埃僅保留爲各種經濟的組織，與職工會一類的組織相合併，至少與之發生聯繫。雖然布爾塞維克之一個口號，確爲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其各領袖尤其是列寧，在這個同一的時期中最初原不信利用那時所組織的蘇維埃，有實行無產階級獨裁策略之可能性。在這時候布爾塞維克是擁護國民會議的原則，即是無階級性的民族團體的原則；同時他們希望蘇維埃職掌全部的權能僅在於到了國民會議能夠產生與召集爲止。以此，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在布爾塞維克的主動的領導之下得到成功的時候，其所成立的政府僅爲臨時性質的，不過是「工農的臨時政府」而已。

一九一八年一月隨國民會議解散，而採用蘇維埃政府的形式以爲永久的權力機關的時候，各蘇維埃實已成立而遍及全國了。城市的蘇維埃仍爲「工人兵士的蘇維埃」；在鄉村區域，貧農的委員會變爲村的或鄉的蘇維埃機關，由農民中半無產階級分子構成，以此，在小鄉村社會裏，階級原則已在應用。蘇維埃稜錐體最高並列的組織單位，爲「工人、農民與紅軍兵士代表的蘇維埃」之各代表大會。後來，由於哥薩克人有些分子，採納了新制度，在哥薩克人團體所在的區域裏之農民集團，亦派有代表參加。某階級某階級的代表，迺後漸漸不再一一標出，因爲這樣的全銜未免過於煩瑣了。即在機關上與外交上的公文，「蘇維埃政府」一詞亦予採用，其同義之詞是爲「工農政府」。在最初時期，「貧農」一詞時常作一切公事上的應用，但是當決定中農與貧農同被爭取與引入蘇維埃裏的時候，這個「貧」字的形容詞廢而不用了。

「工農政府」與「無產階級獨裁」二詞的關係，在俄羅斯曾爲共產黨人與其反對派社會黨人間及共產黨人自己的內部，所探討及所爭論的問題。採用那個比較廣泛的名詞，是爲便利起見，大部分是爲宣傳用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確是一個誠實的名詞，因爲農民就以農民的資格，在一切蘇維埃機關以內——從高級而至於最低級——得派代表參加。但是農民必須接受工人的領導。這二階級是同盟的，但是並不是平等的同盟。其關係有時分析之如下：全部分，或一部分從事於農業生產之農民羣衆的貧苦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同盟的；不曾僱傭別的勞工之個別中農，是屬於同情的階級，沒有他們的維護，蘇維埃的制度不能得到盛行的。所以無產階級的獨裁，至少在理論上，是其基本的原則。在最近共產黨的內部的爭論中，托洛斯基堅稱蘇維埃政府已漸漸成爲「遠離無產階級政府」，因爲政權太自由地擴張到全體的農民，且甚至於及到農民中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種爭辯的詳情與各對立領袖集團正反二方面之是非曲直，此地毋待細敘。但是這種探討，使蘇維埃政府之重要特徵，很顯著地標出。整個的工人階級，是獲得特殊的代表權與領導權的。在農民裏面根據經濟的畛域再予以分別的看待。一切資產階級分子均被放棄與排斥於參政權之外。假使知識分子或公務工作人員，在工農的利益上做着社會上有用的工作，則許其有政治權。要防止這些分子在事實上變成統治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府曾發生了饒有趣味的實施方法，此層本章的次一部分再行討論；因爲蘇維埃政府是「工農的政府」，而工人同農民必須覺到在事實上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除了行選舉制的蘇維埃會議以外，其他的機關亦帶有階級的銜頭，以便取證於廣大的民衆。蘇聯的軍隊以「工農紅軍」組織成之。惟有反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分子之工人與農民纔許其武裝，其他階級固在服務之中，但是無須乎訓練之以爲使用軍器。通常的警務隊是「工農的軍警」(Workman-peasant Militia)，由於這兩階級中招募之。對於一切機關實施監督與管理的廣大權力之重要政府部分，是「工農檢查團」(Workman-peasant Inspection)。這種團體的人員選舉非常謹慎，這是反對機關的庸弱無能與官僚方式的鬪爭之一種主要的武器。「人民」一字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活中，用爲指稱農民與工人的，已逾一世代之久了。此字現在用之於「人民委員」或「人民審判所」或「人民裁判員」一類的名稱上，亦卽具此特別的意義。

各種選舉真正的手續與蘇維埃各機關的功用，其目的在於使工人與農民真正覺悟到這些都是他們的機關，爲其自己供驅策，爲其自己利益而工作的。至於要斷定其所成就的計劃到了那一種程度，是不在本書範圍以內的；而共產黨在蘇維埃裏面所負領導的作用，則是一種原動力，此種原動力曾予表示出來，並必須予以提及之。但是，這可穩妥地說，一再增加之工人與農民，已在積極參加到各種選舉與蘇維埃立法的與行政的各團體之實際工作了。此種增進政治活動無足置疑的事實——特別是在俄人生活，常爲很被動的與呆拙的農民分子中，——似足以證明固執階級原則，在蘇維埃的政府形式裏具有實效。

雖然，這須牢記心中的，階級的原則，在革命前俄國的各機關裏已予厲行了。各地方省議會與市議會選舉制，

是根據經濟的與社會的集團之人口的區分，並在鄉間保障地主階級各團體，與在城市保障財產所有主即「資
本家」的優勢。國會，即國民選立的會議，同樣以階級選立，對於有資產的階級，優予差別的待遇。再則，舊統治農村
民選的行政機關，是單階級的農會，其作用又是確定該社會之階級分類。舊統治各制度之階級性，主要是重於保
障有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反對工人與農民的政治權。列寧曾說道：「布爾塞維克主義與俄羅斯十月革命之主要
的根本的東西，就是引導在資本主義之下最受壓迫的人們，作政治行動。」

蘇維埃的領袖們都是共產黨人，一向堅決主張民族的情緒，是舊統治另一種的遺產，此種遺產他們作最後
的清算，但是在現在，民族性的要素予以考慮了。地方語言的應用不但受允許，而且在一切的公務機關裏成爲不
可少的，因爲在蘇聯之東南及亞西亞區域，有若干很落後的種族集團，故按其地方語言創立文字。地方區域的研
究，在無俄人孳聚的地方尤加重視。蘇聯是獨立各政治單位，根據民族性之一種「自由的聯盟」其最大的政治
組織單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以二十二個自治民族組織單位構成的聯邦。各獨立的民
族組織單位有其自己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該會的代表又遣派至「全聯邦」代表大會；且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
會的選舉中，委員人數是根據人口多寡在各民族集團裏分配的。每一個獨立的或自治的單位之最高蘇維埃機
關，各指定五員參加「民族蘇維埃」(Soviet of Nationalities)，但這種指定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選
舉時，經過「全聯邦代表大會」批准。

所以民族性的成分不僅予以承認而且予以重視，雖然這成分最後的分析應附屬於階級原則之下。烏克蘭蘇維埃大會是全烏克蘭的代表大會，但是屬於烏克蘭工人與農民的，而韃靼或啓耳基茲蘇維埃共和國（The Tatar or the Kirghiz Soviet Republic）亦是如此。據說，蘇維埃體制已畢竟發現其解決小民族問題的途徑。事實上，民族情緒似覺滿足，至少關於民族言語的應用，民族文學的提倡與民族習慣和文化的注重各方面。在另一方面，政治的統一與經濟的統一已有保障，致在事實上布爾塞維克的敵人有「蘇維埃帝國主義」（Soviet imperialism）一詞的採用。不管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所應用之自治的和自主的原則與聯盟的原則，所形成之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其目前直接的結果則是發展公民的興趣與活動，甚至於幾個最落後的較小種族集團，亦能獲到如此結果。

使蘇維埃做成工農羣衆之有效的治國工具，此卽是所謂「蘇維埃民主政權」或「無產階級民主政權」的目標。這二名詞於近來纔成爲通俗化，而這二個名詞的應用，並未改變其最初所重用的「無產階級獨裁」的術語。各種方法與各種制度，對於政府各部分之用以發展蘇維埃民主政權者，原意在於打擊官僚的習氣與武斷的行徑。蘇維埃的選舉制，共產黨在蘇維埃裏面的作用，以及例如「工農檢查團」或「人民檢察員」之各種制度，將以這常受重視的對象爲着眼點，作初步的探討。晚近幾年來，有一種有系統的宣傳運動，以「助活」（*onli-*
yon）蘇維埃，因其屬望於蘇維埃的政府形式之許多結果，不能得到實體化的緣故。

蘇維埃選舉制的探討受着嚴格的限制，雖然該選舉制之普通原則，於革命初起的時候，在其詳盡的選舉法上已予發表出來，但是初期選舉的報告，在文字如是大意，即最膚淺的研究亦付缺如。以後在激烈內戰的期間，各種選舉實已停止，祇在幾個大城市裏，蘇維埃的機關尚為強固與有組織不在此例。那時中央各蘇維埃是僅由其下一級的組織單位之執行委員會選出的代表構成之，而下級的改選則被延期。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以後，一切蘇維埃從最低的單位起，已有定期的與完全的改選。在前幾年由下級送上候選人，由上級加以指定的例規繼續施行着。選舉的原則，尤其在鄉村區域裏，實被這種例規把它取消了。其結果，致有一九二四年秋季之各選舉會中，很多抱不出席主義，拿這種態度對付選舉，是有意不合作之全部表現。這種選舉在第一時期未完結時就遭毀棄了，而上述之「助活蘇維埃」運動，即已着手進行了。

爲了第二期的選舉，對於地方蘇維埃各機關，與特別是地方的各黨部，發佈了法令，凡壓迫與強迫的方法均予禁止，採取真正的選舉運動，並嚴格地尊重選舉原則。所以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的選舉，在蘇維埃體制下之第一次真正的普選，（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大城市中，選舉的原則尤拘謹地遵從，甚至於過去在內戰與外戰的期間亦是如此。）且在這時候，其選舉法，對於蘇聯一切構成之單位均已一致。選舉的結果都完全記錄下來並報告出來，創空前未有之記錄。下次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之選舉之結果，在茲寫作之頃尚未予以全部的分析。以此，探討蘇維埃選舉制各原則的應用所根據之材料，仍甚感窮乏。

蘇維埃選舉制，據一個共產黨人的著作說，它是「保障勞工有組織的集團，得時常有積極影響於其遣送到各代表團去的各代表之可能。」依據同一的作者，一切蘇維埃選舉法之詳細規定，是由於一個簡單原則所指示，即是該項法規必須「有裨於社會革命之克有奏效的實施。」這第二個要點，使蘇維埃法律與他國選舉制不易互相比較；因為它是一種暫時性質之革命的選舉方式。不過，該法律保證有較責任性與拘束力的代表權，這種效能可予探討，因為蘇維埃的選舉制，不僅應付政治上積極羣衆的需要，而且有助於公民活動的發展，並在某種意義上與某種範圍裏，各國的選舉制對於這方面均不能做到的。

蘇維埃選舉制之一個基石，是選舉權限於「勞動者」；「資產階級」分子無投票權。在每個選舉單位或區域裏，將這些分子個個列成表單，並必須公開揭示以作選舉的準備。這些被剝奪選舉者的人數，實在是少數的，而且有減無增，因為前資產階級分子，已成爲蘇維埃的雇員得許有選舉權了。在鄉村區域，此種剝奪公權者的成數，約佔有選舉年齡者之百分之一；在較大的城市裏，此種無選舉權的成數，於十八歲以上者要達到百分之六。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選舉的結果，指示地方的選舉委員會，對於一切被剝奪公權之剝削分子，不曾厲行憲法上的規定。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冬季之選舉，曾發出訓令，由其最詳密的規定，選舉權的實施較諸往年受到更進一步的限制。

不得參加選舉的根據，是剝削他人的勞力。農民或小工匠在規定限制以內或在特殊條件之下，得雇傭勞力

而不剝奪公權。同時農民耕作家得出售由勞力所得的生產品而未成爲「商人」，所以不合「資產階級」分子的資格。但是鄉村裏之農民企業者或私人店主，則不許參加任何各蘇維埃及蘇維埃各選舉。在城市裏之一切「納不滿」，即或他們在製造裏或商業裏，得受有特許與得經營合法的事業，都是被剝奪公權的。

剝奪公權之另一種的根據，是在舊官僚政治裏面站着高崇的位置，或在舊式警察隊裏，或在階級的爵位裏站有任何位置的人，則即或該員現是被引用於社會上有用的工作，亦須剝奪公權的。「自由職業」的成員，應以其現在「社會效用」的活動，予以謹慎的鑒別。一切前資產階級分子如要以現在的身分來投票，則必須給出忠實於蘇維埃統治積極的證據。任何宗派的牧師在憲法上均不許有選舉權。在關於選舉的演說與報紙的記載上，對於摒除資產階級分子於蘇維埃之外多所論列，以便對工人與農民申說蘇維埃是他們真正的機關，由他們選立起來，並只有它纔代表他們的利益。工人與農民必須把其應列在無公民權表上的鄰人名字，報告給選舉委員。以此，各選舉之必經的手續，乃構成階級鬭爭之一種要素。

蘇維埃選舉另一種基本的特點，是爲一個聚合集團的代表制，組織於該集團工作的地方。工人在他們所工作的工廠投票，公務機關工作人員的投票，是在他們所隸屬的機關裏；學生則在於他們所學習的教育機關裏，小工廠或小機關，若其所雇用人員的人數，在該投票人之特殊階級得派代表的組織單位之下，則合開一個公共的選舉會；這種投票者分爲二個集團，一是職工會會員，一是不屬於職工會的人們。後者的選舉手續所以採用，爲的

是至少要使這些「混合」的選舉會具了較有組織的性質。農民則按村莊來投票，如遇大村莊，則分爲幾個選舉區。同時，在大工廠裏，一個企業之各工場或部門分別投票的辦法，正在實施。僅僅家主婦的投票是以住所爲根據。其他一切代表的選舉都是按職業的。現役紅軍兵士的投票，以團爲單位。此種代表制的方式，着重於在「生產中的公民。」必使此種選舉制能使代表受其所代表的集團之經常的與有組織地積極的影響。同時選舉人對於其工友之在個人關係上與生活上的接近，必較諸與僅僅做鄰居的人爲密切，並因此在代表選擇時能運用較理智的判斷；這就是此種選舉制的論據。

蘇維埃選舉的間接性質，使真正的選舉僅限於從投票人所屬而得在其中活動的小集團裏選其所欲選的人。例如農民在農村裏，當他選出地方蘇維埃時，則選舉的參加就算完了。地方蘇維埃從它自己的成員中選出代表到鄉蘇維埃；鄉蘇維埃從它的成員中選出代表到區蘇維埃；以此類推，經過省與特別區以及全俄羅斯或全烏克蘭代表大會，以至於全聯邦代表大會。在大城市裏有坊蘇維埃，由此選立市蘇維埃。市蘇維埃直接選出代表到全俄羅斯或全烏克蘭代表大會，而同時又選到以該市爲省城的省分之省代表大會。較小的城市之市蘇維埃選舉代表到此種代表大會裏去，須經過區「全聯邦代表大會」選立「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選立「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

不論在其他方面或有缺點，而此種間接的選舉制，着投票人得親身密接於其所選舉的人之意義。同時在